

## 学术研究

- 《管子》教育思想浅析 何金钱 李赐平 03
- 营丘考 郑杰文 05
- 周至汉时期中国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临淄 姜 健 09
- 淳于髡诸墓考 于靖怀 11
- 齐桓公苑囿——申池考 王 毅 12

## 谈古论今

- 孙武治军之道与现代企业管理谋略 薛国安 14

## 人物春秋

- 齐国名儒公羊高 李 俊 19
- 节彼南山 维石岩岩——深切缅怀路元祥先生 路金川 20
- 天南地北临淄人——当代著名书画家——王宁 王内祥 22

## 稷下漫谈

- 《管子·轻重篇》断代问题之管见 郭小文 23
- 战国诸子思辩之风述略 吴宪贞 25
- 牺音一考 正 一 28
- 从齐国博士官到秦汉博士制度 王景甫 29
- 学学范蠡的经营理念 裴培科 31
- 由打造“印象齐都”想到的 李哲文 32

## 蹴鞠文化

- 中国足球的历史发展——兼谈齐都临淄在足球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 赵明奇 刘秉果 曹大伟 33

## 图说成语

- 泱泱大风 邵 杰 朱代训 37

## 遗址巡礼

- 齐风韶韵绕劈山 孟姜情泪成涌泉——山东涌泉孟姜女故居纪念馆巡礼 周雁翔 38
- 齐鲁会盟台 姚继平 41
- 寻觅千乘城遗址 赵永伟 42

抢救史料 综合研究  
普及知识 服务现实

中共淄博市委宣传部 主管  
中共临淄区委 主办  
双月刊  
2013年第5期  
(总第62期)

### 特邀顾问

李学勤 葛剑雄  
刘庆柱 纪连海

### 顾 问

王志民 张建国  
周清利 徐景颜  
岳长志 郭利民  
齐秀生 陈庆照  
解维俊 唐福泉

### 编 委 会

主 任 毕荣青  
副 主 任 宋振波 王秀荣  
曹丕祯  
委 员 刘素梅 王克林  
苗 玉 宣兆琦  
高广举 张士友  
孙林涛 毕国鹏  
宋爱国 张龙海  
郑德新 苏向东  
刘学军 苏宏伟  
杨 健

### 编 辑 部

主 编 曹丕祯  
副 主 编 苏宏伟 王金智  
责任编辑 韩宏博  
编 辑 姜 健 姚素娟  
编辑出版 中共临淄区委宣传部  
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

### 刊 号

鲁淄文广新准字(2013)ZBL232号

### 地 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东路1号

### 邮 政 编 码

255400

### 电 话

(0533)7218186 7218187

### 传 真

(0533)7218187

### 电 子 信 箱

qwhyjzx@126.com

### 网 址

www.qidu.net

### 印 制

淄博临福激光印刷有限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本刊所登文章及图片,版权属本刊所有,未经同意,不得转载刊用,违者必究。



文化遗产

临淄八景 苏媚莲 43

韩姓渊源 闫树学 44

文博之窗

文物保护标准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何流 45

对基层文物部门考古人才缺乏的一点认识 罗胜强 47

填漆工艺青铜鼎的保护修复 杨爱民 47

故事长廊

康公的传说 谢家海 49

晏婴谏景公罢宴 王泽 50

范睢历险记 耿宇伟 50

烽火诸侯

芮国 刘敏 54

齐都艺苑

赞第十届国际齐文化旅游节 陈晓伟 30

齐刀币 周丽华 30

齐国历史博物馆 朱刚 46

雨后探秘马莲台 楚春霞 60

一个人的壮烈 徐丽兰 61

一次难忘的比赛 刘洋 62

一次难忘的赛事——参加齐文化知识电视竞答有感 赵秋茹 62

澠水 路永国 62

游晏婴公园 冯旭卫 62

小泥湾的树 边成江 63

金秋牛山民俗庙会 魏乐明 64

七律·姜太公 崔景舜 64

忆故城临淄 孙子科 64

绿地,城市生命的活力 刘善勇 65

齐国城垣遗址 罗伟 66

水调歌头·齐桓公小白 张福信 66

本刊理事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有江 淄博东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于少华 临淄区金岭回族镇党委书记

于亦刚 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国家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云明 临淄区稷下街道党工委书记

王立义 山东兔巴哥集团董事长

王俊涛 临淄区齐都镇党委书记

石建新 淄博市王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钢昌 临淄区辛店街道党工委书记

刘洪志 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

李家刚 临淄区朱台镇党委书记

刘恩惠 临淄区皇城镇党委书记

张成刚 临淄区齐陵街道党工委书记

杨晓军 临淄区凤凰镇党委书记

宋爱国 临淄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罗建 临淄区金山镇党委书记

周恒学 临淄区雪宫街道党工委书记

国爱梅 临淄区闻韶街道党工委书记

郑家晴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郑德敬 山东蓝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天勇 齐都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

路德芝 临淄区敬仲镇党委书记

翟智 淄博市公路管理局临淄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



# 《管子》教育思想浅析

何金钱 李赐平

《管子》教育思想集各家之大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接受性,同时具有创新与互补的特色。探究《管子》教育思想,对于创立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纵观《管子》一书,其教育思想大致分为大教育观、德育、“四民分业”、“弟子”四部分。

## 一、大教育观

从现代科学的系统论观点来看,《管子》把治国作为母系统,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则列为子系统,它在论述其教育思想时,紧紧围绕富国强民来展开,这一目标贯穿于《管子》的整个教育思想中,从而形成一个涉及面广,结构复杂而又比较协调的教育思想体系。稷下学者将道家的天道观和法家的法制思想,与儒家的德治论揉合为一体,充分显示了兼容并包的特点。

其中,《牧民》篇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又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四维,体现道德教育“内外兼求”的特点,稷下先生将其视作国家安危之所系,并极力劝导统治者予以高度重视,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由此可以看出,《管子》从政治的角度对教育的重视。《牧民》篇中还有“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足以看出《管子》对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辩证诠释;《权修》篇中又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它不仅强调了“树人”的长期性及其意义,而且还充分肯定“树人”带来的社会效应,其目光之深邃长远,令人诚服。

## 二、德育

《管子》作为先秦时期的一部奇书,在其后的推崇者和研究者眼中,历来把它作为齐法家的创派之作,故总是高扬其中的法制思想,而忽略对其德治思想的研究。事实上,《管子》对德治思想也是比较重视的。

其中,《管子》的民本思想是其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君臣下》篇曰:“民体以为国”,说民是立国之

本。《霸形》篇进一步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故君主要善待民众,并且君主要做到《牧民》中所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除此之外,《牧民》篇中有“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日如月,唯君之节。”《宙合》篇进一步说:“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即只有具备无私之心,才能得民心,得人才,从而才有资本建功立业。另:《君臣上》篇中还有“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在《立政》篇中进一步强调:“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可以说,这些唯才是举的任人思想对中国古代官僚制的发展和完善有着重大推动作用。

其次,《管子》认为臣下之德更应成为必然。《形势解》曰:“忠者,臣之高行也。”“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四称》篇曰:“君若有过,进谏不疑。”这些要求在后来历代忠臣良将身上多有体现。可以说正是这种辩证之“忠”催生了中华民族的代代脊梁。对于为官,提到要有“经臣”之德。《重令》篇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另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管子》一书对当位之德也作出了类似的陈述。《立政》篇曰:“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总的来说,《管子》一书的德育思想比较丰富,主要包括礼、义、廉、耻、孝、悌、慈、惠、仁、信等道德规范。而礼、义、廉、耻又是其中中心的道德教育内容。《管子》将礼义作为其道德教育的最基本内容,主张用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个人道德行为规范,影响甚为深远。礼、义、廉、耻四德,经稷下先生的提倡,两千余年几乎相沿不断,成为我国重要的国民公德。在《管子》一书中,涉及到了道德教育的一



些本质范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德教育的某些规律。也正如上文《管子》所说的那样,对道德风尚加以制度约束,进行合理的引导,我们才可以使公民道德体系稳步发展,并使之顺利地向共产主义的道德目标前进。

### 三、“四民分业”

所谓“四民分业”是指国家的基本成员“士、农、工、商”四类,按照职业分区居住、生活、劳作。《小匡》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分业而居则能克服“其言咙”“其事乱”的弊病,产生许多优点。如工人的“四民分业”,它说:“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教,不劳而能。”这是我国最早关于职业教育原则的论述。“四民分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先秦时期的社会实际,是当时职业教育基本经验的总结。其教育思想具体如下:

#### 1. “士”教育

在《管子》中,士为四民之首,分为文士和军士。对文士的教育,《小匡》篇说:“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经常对“士”及其子弟实施“义”“孝”“敬”“弟”等方面的教育,要求他们“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大匡》),从而提高他们的伦理道德水平,使这部分士成为知情达理,有一定素养的文明阶层。对军士的教育,主要包括“政教”与“服习”,即管理与思想教育、军事训练两方面内容。前者主要是由将帅对士兵经常进行爱国、爱家乡爱父老乡亲的教育。后者具体内容如《幼官》篇所规定的:“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九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如此,便可守则固,战则胜,无敌于天下。

#### 2. “农”教育

《管子》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本”。因此,它极力规劝吏民重视并大力发展农业。首先它劝导农民“务在四时”,精耕细作,辛勤劳动,然后是做好粮食的贮藏工作。为有效地向百姓推行农事教育,发展农业生产,《管子》还主张设立“虞师”“司空”“司田”“乡师”等官职,由他们常年分别负责向农民实施农事教育,视察农业生产状况,及时为农民解决困难。这种包含农技指导和教育的“农政”制度一直沿

袭到两汉。

#### 3. “工”教育

“工”教育即手工业者或工匠的教育。《小匡》篇中有:“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要求工匠选造出种类齐全,工艺精致的手工业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稷下先生继承发扬了管仲提倡的“群居相染”的社会教化原则,后来齐国的统治者运用它来发展“耕战”,既进行法家的“地利之教”,又进行兵家的军事教育。而且,寓兵于家,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发展了农业生产,充分显示了这一社会教育原则的正确性。

#### 4. “商”教育

对于商人的教育,它也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小匡》篇曰:“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促进商品交流和市场繁荣。

《管子》“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思想固然意义重大,对后世影响深远,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其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先进经验的传播与推广。但从总体来说,“四民分业”的社会职业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并为之服务的,尽管如此,仍不失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并具有自身的特色。

### 四、“弟子”

《弟子职》一篇,归属存在些许争议,但因其为稷下学宫学则,郭沫若等即把它归入《管子》一书,其内容涉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以及古代对“礼”之阐述在现实中的反映。《弟子职》记弟子事师、受业、饌馈、洒扫、执烛坐作、进退之礼,类近今之“学生守则”。清代洪亮吉认为“乃古塾师相传以教弟子者”,清代庄述祖也认为是“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具体内容有:“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少者之事,夜寐蚤作”“受业之纪,必由长始”“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假衽则请,有常则否。”

《弟子职》作为稷下学宫的学规,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个较为完备的学生守则,并成为后世官学、私学、书院制定学规、学则的范本。④



# 营丘考

郑杰文



营丘故城遗址碑

营丘,是姜尚始受封地。关于营丘的地点,由于史书无明确记载,所以古来多有争论。本文就此问题提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古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汉末人应劭曰:“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北海郡·营陵”引应劭《地理风俗记》)主张营陵(在今山东省昌乐境内)即姜尚始受封之营丘。

魏晋人臣瓚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亦见《汉书·地理志》师古注“营陵”引)主张营丘即临淄(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境内)。

晋人郭璞曰:“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尔雅·释丘》注)以地形特点解营丘,认为营丘在临淄。

北魏人酈道元力主营丘在临淄:“淄水又北,径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曰临淄。……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水经·淄水注》)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在临淄县系下著录说:“古营丘之地,吕望所封之都也。……营丘在县北百步外城中”。《尔雅》曰,淄水出其前,经其左曰营邱。今临淄城中有邱,淄水出其前,经其左,故曰营邱。

唐孔颖达曰:“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于营丘,今临淄是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三,颜师古态度较暧昧,他在注《汉书·地理志》“临淄”条时,赞同臣瓚之说:“瓚说是也。”然在“营陵”条下,又异引应劭、臣瓚两说,而曰:“临淄、营陵皆曰营丘也。”莫衷一是。

延至清代,持论者较多。栖霞人郝懿行力主“营丘即临淄说”,征引《毛诗正义》、《史记集解》、《檀弓正义》等书证之,并驳斥应劭“营陵即营丘说”。俞樾亦持是说:“齐都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诸子平议》)。昌乐人阎愉则力主“营陵即营丘说”,从地貌特征、地理位置、传统习俗、经济特点、开国之道诸方面,论证昌乐营陵古城即太公始封之营丘(见清·嘉庆《昌乐县志·艺文考》)。《诗·齐谱》“都营丘”唐孔颖达疏:“以丘临水,谓之临淄,与营丘一地也。”

至今,这一笔墨官司仍无定论,故《辞源(修订本)》、《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皆两说并存。

但从有关记载和地理形势等方面看,营丘当在临淄。

我们再来看一下史书的有关记载。

《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营丘在齐地内,故言“封师尚父于齐营丘”。齐的得名,与临淄南部牛山西的天齐渊有关。酈道元《水经·淄水注》云:“《地理风俗记》曰:齐所以为齐者,即天齐,渊名也。”另从司马迁的话还可看出:营丘为军事重地,故周王封姜尚于此以镇东方。当时,山东半岛的莱国十分富强。《汉书·地理志》曰:“莱夷作牧,厥丝”,可见蚕丝业和畜牧业是很发达的。若营丘在昌乐的话,距莱统治中心较近。那早为莱国吞占了。而从距离上来讲,营丘应在临淄。临淄距莱国统治中心较远,又有淄水作为屏障。所以莱侯与太公争营丘,才没有取胜。太公才得以“至国,修其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才得以“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史记·齐太公世家》)。

关于姜尚的受封,还有另一说。《汉书·地理志》云:“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薄姑氏及四国作乱被灭,将其地封姜尚太公,意在使太公镇之,这同武王在殷旧地封管叔、蔡叔、霍叔的用意是一样的。那么封地必在薄姑附近。薄姑,在今博兴县境内。临淄距薄姑只有数十里,而昌乐距薄姑数百里。

按营丘古属青州,商时为逢伯陵方国所辖,周时为齐国都城,这在我国史书和地图上都是这样著录。例如蒋廷赐:《尚书地理今释》说:“史记武王封尚父于齐,都营邱。正义云,营邱在青州临淄北百步”



外城中。今山东省青州府临淄县西北三里，有营邱城是也。”清和州鲍东里古村编辑：《史鉴节要便读》卷一：“齐封太公（齐今山东青州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号尚父），国于营丘”（地在今临淄县）。

可见，从史书关于姜太公受封的记载来看，营丘应在临淄而不在昌乐。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史书关于姜齐两次迁都的有关记载。

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后，“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



姜太公封齐建国

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可见姜齐原建都于营丘。后来，周夷王时，齐国发生了两次迁都。由于齐国邻国的纪侯的诋毁，周夷王烹死了齐哀公，而立姜静为齐胡公，胡公迁都薄姑（今博兴）。“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史记·齐太公世家》），古人作战是兵车步卒，远袭最难。秦国老臣蹇叔曰：“劳师以远袭，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假若营丘在昌乐，昌乐距薄姑数百里，战车步卒数日才能到薄姑，袭杀必难成功。假若营丘在临淄，临淄距薄姑数十里，几小时便可到达，所以才能一袭而杀胡公。

齐胡公时，薄姑东邻纪国。纪，姜姓侯国，都城在今寿光县南。临淄齐故城东北。齐襄公八年（公元前690年）始为齐所灭（见《左传·庄公四年》）。纪国 邑，在临淄齐故城正东十八里，齐襄公7年（公元前六九一年）才有“纪季以入于齐”一事（见《左传·庄公三年》）。纪国鄆邑，在今临淄县东南（见《春秋·庄公元年》杜注），齐都城东南方，齐襄公五年始被齐迁其民而并其地（见《春秋·庄公元年》）。可见，齐胡公

时，纪国城邑在薄姑东的淄河东畔，南接鲁中丘陵，北到渤海之滨，像一条屏障横于营陵与薄姑之间。若营丘在昌乐的话，姜山袭击胡公时，必定要向纪侯借路。不向纪侯借路，战车是不能来到薄姑的。况且薄姑和营陵（昌乐）又隔泲水、淄水等大河。若营丘在临，便正在薄姑东面而纪国西边的淄河西畔，袭击薄姑时才不用借路，取得袭杀成功。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胡公为什么从营丘迁到薄姑，献公为什么又从薄姑迁到临淄，临淄和营丘是什么关系。我们说，这两次迁都的主要原因，都在各自的势力所在地不同，迁都是为了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司马迁叙述这事时说：“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尽逐”，是怕胡公党羽作乱。逐后还不放心，所以才“因徙薄姑都”。可见薄姑是胡公的势力所在地。事实也正是如此。后来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时，也是以薄姑为跳板的（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我们再来讨论齐献公迁都到哪里呢？他也必然效法胡公，从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迁到自己的势力所在地。他的势力所在地在哪里呢？当然是营丘了。“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便是最好的证明。可见，献公迁回的地方仍是原国都营丘，只是迁都回来后，将营丘改名为临淄。郦道元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见解：“献公之徙，其犹晋氏深翼名绛，非谓自营陵而之也”（《水经·淄水注》）。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说：“献公复都营丘，拓大其城，更名临淄”。

以上，从史书中关于齐国两次迁都的记载中，可看出营丘当在临淄。

下边，我们再来看几种零星的历史记载。

据《左传》、《战国策》、《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东莱统治中心在今黄县，莱有棠（今即墨县）、夷维等城邑。夷维地名，刘敦愿先生考曰：“夷维的维，疑是潍字，此邑属莱夷而在潍水附近，所以称夷维”。以此推之，营陵应属古夷维地名。这是营陵非营丘的又一佐证。

齐桓公时，“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陶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国语·齐语》）。桓公任用管仲，国富兵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为五伯之首，即反侵地，疆土向东才到邑（今临淄齐故城东十八里），远距邑数百里的营陵，在太公时不可能是齐地。

《左传·僖公十四年》载：“春，诸侯城缘陵（营陵



旧称——笔者注)而迁杞焉”。杜注“缘陵,杞邑。辟淮夷,迁都于缘陵”。此为齐桓公四十年事,正值齐强盛之时,若缘陵为太公始受封地,必不容忍此为“杞邑”,更何况建都呢?又,周敬王时,孔子弟子后处封于缘陵,唐时追封为营陵伯(据《昌乐县志》)。周敬王时,齐国是景公在位,用晏婴为相,齐二次复盛。此时诸侯并起,周室衰微,位同诸侯,若营陵为齐地,怎容周王封给别人?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与齐景公在临淄齐城外讨论古乐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那么太公封地怎能不在临淄,而远在几百里外的昌乐?

从以上有关历史记载可见:营陵非营丘,营丘不在昌乐而在临淄。

下面,我们从地理形势考查一下。

在冷兵器战争的初期,地形地势的便利与否,对战争的胜败具有重要作用。前面说过,关于太公受封的记载有两说。一是《史记》:“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依此说,周王封吕尚的目的在于藩卫王室。当时,“周初定,未能集远方”(《史记·齐太公世家》)。莱夷是东方强国,周之劲敌。其封地必是进可出击,更重要的是退可固守的军事重地,姜尚才能在没有周王朝援助的情况下,完成藩卫王室的任务。另一记载是《汉书》:“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依此说,其目的在于弹压薄姑一带。《竹书纪年》云:非功臣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这样,其封地也必须利出击便固守。可见,不管是哪一说,营丘都必须可攻可守,特别是利于固守,姜尚才能完成周王朝的使命。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姜尚“夜衣而行,黎明至国”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仓促应战的姜太公所以能保住营丘,营丘的利于固守是重要原因,那么,下边我们就先看一下昌乐和临淄,哪里能具有这种固守的地理条件。

古临淄,东有淄水向北注入济水(小清河);北有济水;西有濊水(乌河)经麻大湖注入济水;南面是鲁中丘陵,有牛山、稷山、黄山等天然屏障。淄水从鲁中丘陵中流出。濊水源头(今临淄矮槐树村东)距鲁中丘陵的北缘——黄山五里,但“山西有涧,下道(导)于时,非经雨潦则涸,故名乾时”(见民国九年《临淄县志》)。乾时,即今辛店发电厂东边大武水库上下的河道。雨季,潦水从山谷中冲出,切开坚硬的棕红土,劈成一条深几十米,宽二十几米

的陡立的河沟,极易防守,前685年,齐国和鲁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大战:“夏,公伐齐,纳公子纠。桓公自莒先入。师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左传·庄公九年》)。新即位的桓公不但没被鲁师攻入国都,反而能大败鲁师,乾时的地势是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临淄基本是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天固之地。更加上在这块天固之地内,临淄齐故城北,济水南,有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游幸过的巨淀湖这一古代大湖。齐故城西,是一片低洼的河网密布(有画水、澠水、系水等)的沼泽地,即《水经注》所说的“九里十八湾”之处。山、河、沼泽地,对临淄的固守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地势,姜太公才据此在迎击莱夷的战斗中获胜。

另外,莱夷是东方强国,是姜太公最重要的敌手。营丘必须首先具备防东莱的最有利的地势。临淄东面紧傍淄水,淄水源出原山之阴,沟通九条大山谷,有十数条河流注入。《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淮淄其道”。足见淄水古为大河。淄水北出鲁中丘陵,经古天然水库天齐渊,紧傍稷山、牛山入鲁北平原。平原处河道窄处也达里余,宽处竟达数里,两岸陡立,皆十余米高,今河底已积存七、八米厚的砂石,可想见当时浩大的水势。《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景公登东门防,民单服然后上。公曰:‘此大伤牛马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对曰:‘……蚤岁溜(卢文绍谕曰:溜,淄字之误)水至,即下六尺耳,向者防下六尺,则无齐矣……’。”元于钦《齐乘》引《齐记补》一书说:“(齐)故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门。”雨季如此,旱季则有天齐渊调剂。这样的大河巨川,足以防东来之敌。

临淄古城东墙,打破西周时城墙直修的惯例,紧压淄水西岸,曲折修筑,呈十二处拐角,既不美观,又费工。可想见筑城者怕留下缓冲地带,为东来之敌攻城时所利用,而有意为之。筑城尚如此用心良苦,选地则更应“陟则在,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覲于京”(《诗经·公刘》),四处相看,八方求索了。天固之地临淄被太公选中,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从地理形势看,营丘在临淄是合适的。

我们确定了营丘是在临淄,那么在临淄什么地方呢?臣瓚云:“今齐之城中有丘,即营丘也。”(《汉书》师古注引)郦道元言:“今齐之城之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房玄龄(临淄南马坊村人)等撰的《晋书·慕容德载记》也。”云:



“明年，德如齐城，登营丘，望晏婴冢，顾谓左右曰：……”考其地，皆指今临淄齐故城小城内的桓公台，但桓公台是人工所筑，《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说：“小城的北部偏西，有一座夯土台——‘桓公台’，台高十四米，基呈椭圆形，南北八十六米，建于生土之上”（《文物》1972年第5期），这与《尔雅》“非人为之丘”不合。此台可能是齐襄公时所筑，《国语·齐语》载：“（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韦昭注：“居高位而自尊也。”再者此台东距淄水五里，南距淄水东西拐角处近二十里，所以此说早有怀疑（《昌乐县志·艺文考》载清代阎愉《营丘辨》即驳过此说）。

桓公台非营丘，如今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那么营丘到底在临淄的什么地方呢？确定这个地点以前，我们不妨先来考查一下“丘”的本义。

《周礼·大司徒》云：“土高曰丘”。《说文》云：“丘，土之高者也，非人所为也。”“丘”古文为“丛”，似人群居于地上之形。所以《山海经》把古代部族所居之处称为“丘”，如“陶唐之丘”“昆吾之丘”“神民之丘”等。《离骚》云：“哀高丘之无女”。《汉书·地理志》注古“十二州”时云：“洪水汎大，各就高陆，人之所居，凡十二处”。盖古代雨水丰，地气湿，人须择高处居住，故《周礼·小司徒》云：“四邑为丘，方四里”。

所以，“丘”的本义是指古代人群居住的自然形成的高地，并非指什么人为的大土堆。

据古书记载，古临淄一带，高地是很多的。有齐襄公狩猎逐豕而坠车伤足的“贝丘”（《史记》称“沛贝”），有连称、管至父戍守过的葵丘，有齐大夫邕廩之邑渠丘等。这些高地，虽因诗书的记载流传下来，但却随时间推移的“沧海桑田”之变，现在多数已看不出高多少了。所以，现在只凭地面标高去考查是很难的。据《水经注》、《史记集解》、《檀弓正义》等所引，古本《尔雅》释营丘时是“水出其前左”，清代考据家王念孙对此作过肯定。《元和郡县志》引《尔雅》时亦有“前”字。可见，“水出其前左”是较为可信的。

今淄水出鲁中丘陵后向北。经古天齐渊，折而东行，至牛山脚下，又直向北流去，经临淄齐古城东。与《水经》所云：“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过临淄县东”一致。淄水不是地上河，河床迁运不大。据此考查，营丘当指南自古天齐渊（牛山西）至时水源头（矮槐树村东）一线，北至古巨淀湖南（今临淄、广饶交界处），东自淄河，西至古濰水、画水、系水等低洼地东沿，这块至今仍可看出地势较高的

古代高地，即今临淄的东北部。此高地亦正合《管子·乘马》所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可见，此高地当是古营丘。

所以说，姜太公始受封的营丘，当在临淄而不在昌乐，它是指临淄齐故城所在的这块淄水半绕的高地而不是指古营陵。

明确了这点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姜太公的建都地点，我们不妨称它为“营丘古城”，在营丘的什么地方。

《水经·淄水注》云：太公所筑之城是指桓公台的小城，“其外郭，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也。”此说已被发掘出的实物所驳倒。临淄齐故城分大小两城，并套筑在一起。这样，若大城晚筑于小城，那么在大小城交接处，大城必压筑在小城墙上。但如今大城西南有与小城套筑处，已掘出土层清晰可辨，十分清楚的看出：却是小城城墙压筑在大城城墙上。小城晚筑于大城，并非营丘古城，是十分明白的了。

那么营丘古城到底在哪里呢？《临淄齐国古城勘探纪要》指出：“大城地形以西部南北河道以东地区较高，其中尤以大城东北部地势最高。……尤其是河崖头村西南和阚家寨村东北一带的‘韩信岭’高地，文化堆积特别厚，一般为三至四米左右，往往有四、五层堆积，是故城文化堆积最厚最复杂之处”。“据‘韩信岭’高地探掘的资料，铜渣、炉渣、烧结土等发现于二、三层之间（这一带地层堆积有四层，其中第三层是灰绿土，质地坚实，从试掘中认定属于春秋前期的地层）。”另根据“临淄齐国故城钻探实测图”，在齐故城内文化堆积厚的高地有14处，其中12处在“韩信岭”一带（以上见《文物》1972年第5期）。

据此可见：营丘古城在齐故城大城东北部韩信岭一带较为可信。

下边，我们再追寻一下“韩信岭”附近地名地势的蛛丝马迹。

汉初，这一带有一城名营城。《水经·淄水注》：“汉景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营城，澠水西。刘肥子信都封营侯，筑城而居，谓以营城。……崔道南谓在柴家疃，形制甚小。”柴家疃在韩信岭高地西里余。刘信都为何被封为营侯呢？晏子曾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水经注》引，《汉书·地理志》注亦引。）可见，古临淄早有一称“营”之地，远非自刘信都受封始。

同时，“韩信岭”高地北部，柴家疃有东西两古城村，此外又为何称“古城”呢？考临淄一带地名，好多与古地



# 周至汉时期中国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 ——临淄

姜健

以临淄为中心的齐地纺织业,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自远古时代就异常发达。

《尚书·高贡》载,早在夏商时期,齐地青州上交中央政府的贡赋里就有“絺”(chī),即夏布,用葛草纤维织成,质地细薄;还提到今天胶东地区的莱夷人“厥筐屨丝”(筐,fěi,竹筐。意思是用竹筐装盛柞蚕丝),已开始大规模种植屨桑(屨,yǎn,山桑),饲养柞蚕(柞,zuò,柞树,也称栎树、橡树)。

西周时期,姜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动员妇女种桑养蚕,纺织刺绣,并积极组织对外丝织品贸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齐国成为大国、富国,彻底改变了周初齐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后来,姜太公大力发展丝织业、努力开展丝织品外贸的举措,作为基本国策,为后世齐国执政者一以贯之、继承发展。

春秋时期,丝织业已成为齐国主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据《管子》书记载,当时齐国统治者对丝织业高度重视,《管子·问》、《管子·山国轨》中有对各乡女织工人数、产量、产值的调查统计要求,可见当时齐国政府已将丝织业状况纳入国家统计并进行了宏观管理。当时齐国统治者不但重视丝织业,还出台多项政策,对从业者奖励、优惠、扶植。据《管子·山权数》记载,当时齐国政府对养蚕能手、蚕病防治专家给予黄金一斤或粮食八石的物质奖励,还免除他们的兵役;《管子·国蓄》里,则有齐国政府春天给予桑农贷款,双方签订预购合同,秋天计价收购桑农丝织品的具体优惠措施。

在齐桓公、管仲的大力倡导下,春秋时期齐国的丝织业繁荣发展,已位列全国之冠。别的诸侯国把丝绸当成奢侈品,轻易不穿、不用,而齐国却将高档丝绸作为书写材料,在上面写字,最早使用帛书

名有关。接应齐桓公回国的高傒的封地,今名白兔丘(高傒字白兔),孝公墓附近有吕家孝陵、高家孝陵,遥台(又名歌马台、戏马台)相传是齐国战马集结地,或传为是齐威王赛马之处,其东南有村名南马坊,齐侯行宫雪宫附近有薛家官庄……。那么,这里所称“古城”,可能与营丘古城有关。

(见《晏子春秋·外篇上二四》);别的诸侯用素绸来敬献齐国,齐国则用花锦(即“文锦”,一种用彩色丝线织成有各种图案花纹的高级丝织品)回礼,诸侯以出使齐国得到花锦为幸为荣(见《管子·小匡》)。

春秋时期齐国丝织业的高度发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桑园大量出现。《管子·山国轨》规定,百姓住宅周围必须种植桑树,禁止种其他树种,否则算违法并被惩处。在《左传》和《国语》中的晋国公子重耳故事中,重耳随从在桑园里密谋,结果被重耳家的养蚕女工在桑树上偷听的情节,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贵族家庭桑园的桑树之多,规模之大。二是染织业的发达。据春秋时期齐国官书《考工记》记载,当时齐国专门设立“慌(左巾右荒)人”负责煮练丝帛,设立“染人”负责丝织品的染色,设立“画绩(就是画花纹)”负责在丝织品上画花、绣花。另外,此书还详细记述了染练丝织品的复杂工艺流程,足证司马迁关于齐国“人民文采布帛”(《史记·货殖列传》)、丝织业高度发达的记述,是真实的。此外,《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齐桓公喜欢穿紫衣服,上行下效”的故事、《晏子春秋·内篇谏下》齐景公“一衣而五采具”(一件绸衣上有五种颜色)的事例,也可作为旁证。

战国时期,齐国的丝织品更是“冠带衣履天下”,所产纺织品数量多、质量好,据史载齐国的纺织品有冰纨,绮绣(即薄绢)、缙绸、絺、阿锡、绋等近20个品种。其中最精良的丝织品当属“齐纨”和“阿锡”;齐纨是临淄出产的细绢,阿锡是齐地东阿出产的细缙,两种丝织品均生产历史悠久,天下闻名。1971年至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曾发掘临淄区齐都镇郎家庄东南的一个殉人墓,年代约为战国早期。出土的丝织品残片中,有我国最早的织锦遗物。织锦为经二

据上,疑姜太公所筑之营丘古城,在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部“韩信岭”一带。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根据史书有关记载的考证,和地理位置、地形、地势的比较来看,姜尚始受封之营丘在临淄而不在昌乐,姜太公所筑之营丘古城,在临淄“韩信岭”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



重组织,每平方厘米约经丝 $56 \times 2$ 根,纬丝32根。每根经丝是双头合股的,拈度很不均匀。测其径向投影宽,经丝为0.2—0.25毫米,纬丝为0.13—0.2毫米。另外,此墓还出土了平纹组织,每平方厘米经丝76根,纬丝36根的绢、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丝48根,纬丝43根的刺绣残片等有极高价值的丝织品文物,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齐国丝织品做工精细、质量上乘的特点。

汉朝,齐国纺织业达到了鼎盛。西汉时期的临淄,是全中国纺织中心之一,为“三服官”(专为皇室宫廷织造高级丝织品,用于春夏冬三季服装)所在地,生产规模很大,“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产品异常精美,有纨素、轻绡、绮绣、冰纨、方空縠、吹絮纶等最高级丝绸品种,代表了当时的国家最高水平。汉代儿童识字读本《急就篇》中,有“齐国给献素缙帛,飞龙凤凰相追逐”之句,形象地反映出齐国丝织品图案的生动、华美。


齐地先民很早就生产丝绸,也很早就销售丝绸。他们不仅把齐地精美的丝绸运往国内各地进行销售,还开辟了海外丝绸贸易通道,把丝绸销往朝鲜半岛和日本。

据考证,早在战国以前,齐国就已经有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具有开放性和分散性特点的商路,是由齐地商民或移民自发开辟而成的,经齐都临淄到芝罘(烟台)、蓬莱、海阳、崂山(青岛)、琅琊(胶南)、海阳、斥山(石岛)等港口,然后北渡长山列岛至大连,再转向东南,沿带方(朝鲜)西海岸南下,过济州海峡到达倭奴(日本)。

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存在的。日本在公元前3—4世纪时,还处于绳文化时期(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没有铜、铁和丝织品,然而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墓葬中,却发掘出了丝织品随葬物,经测定为日本弥生文化时期(相当于我国战国末年)的产物,而且经纬线与齐地所产丝绸极为相似。据专家推断,这可能是齐国商民为中日文化交流留下的原始记录。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发展于秦汉,盛行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是中、朝、日人民自古以来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至今,日本的羽田、波多、羽太、八田等姓氏日语发音为“八夕”(意为“机织人”)。他们曾自豪地称自己的祖先是来自中国的移民。许多日本人以从事采桑养蚕和纺织为生,故日本又称“扶桑”。

临淄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还是汉代陆路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因临淄所产丝绸质量最精细,品种最高档,故西汉中央政府常常把临淄生产的丝绸赠与匈奴和西域诸国,还通过西域把这些丝绸销售到中亚和西欧。据专家考证,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外运之丝绸,约三分之二产于齐国齐地;故而齐都临淄成为汉代“丝绸之路”最东端的重要源头之一。临淄的丝绸一般要由汉政府的主管部门“少府”统一调拨,先从临淄经定陶、济渎,再经洛阳、函谷关运到长安,最后从长安走上丝绸之路。


综上所述,经建立在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基础上的科学论证,临淄作为周至汉时期中国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铁板钉钉,当之无愧的。 

(上接第18页)外,在激励的同时,相应的敦促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鞭策。心理学实验表明,相对于赞扬,惩罚的效果远没有那么明显。因此,当今世界500强企业大多都有一套激励机制,注意对员工实施有力的激励。

在市场竞争中,物质方面的激励和鞭策确实很重要,但是,即使在这个领域内金钱也不是万能的。根据马斯洛的理论,对于已经实现生存和安全需求的人来说,物质激励已经远远不够了,这时需要用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来激励他们。因此,对于公司的优秀人才,激励应主要来自精神方面,包括培养他们对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他们为自我实现而奋斗的信心,尤其是培养公司员工的敬业精神。一旦在员工中普遍培养起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和敬业精神,团队精神便会应运而生,越来

越强。

物质奖励也好,精神鼓励也罢,方法和机制可以有多种多样,无论哪种方法和机制,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不妨借鉴古代兵家所推崇的赏大罚小、公平赏罚、信赏明罚、及时赏罚、重赏重罚等原则,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

孙武的治军思想深刻而系统,“天地孰得”、“兵众孰强”等观点都蕴涵着深刻的治军艺术,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创造性地在当代企业管理中运用。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企业家们如果善于从中取其精华,得其神韵,把饱含制胜智慧的古代兵法与充满时代精神的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工作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无疑将有益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 淳于髡

## 诸墓考

于靖怀

淳于髡画像



淳于髡是历史名人。在群贤济济的稷下学士中，出道最早。《史记》等书中所记的言行，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其社会影响，既深且久，由于人们的追慕，他身后被作为人文遗迹的葬地，史志所及，即有三处之多。笔者不揣孤陋，据史料加以爬梳，附及管见，供同道聊资参稽。

见于史乘记载最早和公认度最高的是临淄淳于髡墓。此墓在临淄区辛店街道窝托村外，俗称“窝托冢子”或“駙马坟”。早在1500年前，北齐魏收在《魏书·地形志》里，已把它作为侨县郟县的两处地面标志之一。以后，元代人于钦在所著《齐乘》里，还有以后编写于明、清时期的《山东通志》和《青州府志》，都相继认定。于是，此墓的墓主成为众所确认的事实。文人雅士们多有咏题，《史记》里记述淳于髡是“齐之赘婿”，诗人们免不了据以“发思古

之幽情”，近代县内崔际唐在《临淄堂诗集》里，即有“当年作赘滑稽客，犹占荒山土一丘”的句子。

此墓封土高大，保存完整，对此，附近人有其解释，小时候，就听到家在窝托的李家表姑如是说：“駙马的媳妇，是齐王的闺女。人家齐王有的是钱，附马俩口子死得早，齐王心疼孩子，买了好多宝贝和器木（棺材）一起垒了个好大的坟埋了起来。谁敢动，要招灾的，里头还会放毒药箭的。”这些，看来只是属于“姑妄听之”的老话了。

记述再早和认定的人再多，不一定就是真实的。上世纪70年代初，胶济铁路复线施工，封土运走了，墓内只做了局部清理，出土文物多达一万多件。墓主虽有待于考古后续工作的文字认定，但从墓制和规模推知，它是一座西汉时齐国国王的陵墓，和淳于髡并不相干。人们之所以长期如是认定，乃是由于古代史官的推断和误导。

在湖北省宜城县（今宜城市）境内，也有一座被认为是淳于髡归骨之所的古墓。这和《史记》中记载的一个淳于髡故事有关。《史记·滑稽列传》里讲，齐王派淳于髡做专使，送一只白天鹅给楚王，半路上开笼给白天鹅饮水，白天鹅却趁机飞走了。淳于髡谒见了楚王，先奉上空鸟笼，传递了齐王的友谊表示，接着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表白了自己的内心斗争和甘心认罪期待。楚王很欣赏他的诚实，不但没有

怪罪，还加以重赏。宜城地当南北要冲，东濒滔滔的汉水，沿大路往南不远就直抵楚都郢城，后人据以认为是淳于髡放鹤之处，和地名“善谗驿”的宿处，对其驿其墓，都相信其有，连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大诗人们也信之不疑。刘禹锡经过此处，酹酒凭吊，并做诗寄给好友柳宗元。诗写的是“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寓言本多兴，放意亦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柳宗元收到后，做了首和诗“水上鹤已去，亭中鸟又鸣。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荒坟遽千古，羽觞难再倾。刘伶今日意，异代复同声。”明朝前期官修全国志书《大明一统志》在湘广省襄阳府部分里更有这样具体叙述：“淳于髡墓，在城北二十里善谗驿中。髡，战国时人。驿即放鹤之所。后卒葬于此。”诗云加上志曰，被人们辗转附会认为此地系淳于髡曾留宿之处和葬身之所，也就板上钉钉似的被人们信实和流传下来。

要问淳于髡为什么埋葬在远离父母之邦几千里外的异域，刘、柳两诗人各说各话，刘诗颌联，说的是淳于髡仕楚身故，楚王以客卿之礼葬之于此。柳诗尾联，则释为淳于髡和后世同嗜饮游的刘伶一样，主张不论死在何处即就地掩埋，后游览经过此地身死，即葬身于此。这些都不足为据。淳于髡毕生热爱国家，从威王初年到孟子去齐，时距五十（下转第14页）



# 齐桓公苑囿——申池考

王毅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推运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角,提出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加强国家重大文化……保护建设”的伟大号召。众所周知,我区建造的姜太公祠、管仲纪念馆、姜太公湖等人文景观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游客的高度赞誉,然而仍有淹没于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的顶级人文景观还没有挖掘出来,加以开发利用。笔者认为临淄具有“国家重大文化”的魅力就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苑囿——申池。它是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它属于“国家重大文化”的范畴,很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开发利用。笔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

## 一、关于申池具体方位和实用功能的辨析

关于“申池”这一著名古迹在信史《左传》和《史记》中虽多有记载,但其具体方位无载,后世诸多注家多以猜测记入辞书。尤其是方位在“齐城西门左右”之说,很难使人置信。再则申池并非普通水池,其实用功能,典籍也无明确记载。

(一)申池方位歧说辨析。关于申池方位历来注释不一,众说纷纭,笔者本着“以书为友”,以书为敌的治学态度来探其真实。申池方位最早见汉代高诱《淮南子注》,称:“申池在海隅。”至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不同意高诱“海隅”说。但又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便扑风捉影推论提出:“齐城西门名申门,齐城无池,唯此门左右有池,疑此则是。”笔者认为杜预所说“唯此门左右有池”,这大概指的是齐城外的护城河。此魏郦道元《水经注》但有记载:作者观察细致,说“今池虽有小小竹木却无复仿佛”“晋伐齐,焚雍门”“而不言北掠于海(隅)”“懿公见弑”“见困近郊矣”“杜预之言,有推据耳。”郦道元既否定了高诱的“申池海隅说”,也指出了杜预“申池西门”说是凭空推论。至唐代裴骅《史记集解》仍沿用“疑此则是”的“申池西门”说。清初编《康熙字典》时,略去“疑此则是”几个字,简为“申池,齐城西门曰申门,左右有池。”后来《辞源》、《中华大字典》以及有关齐文化著述仍按此说。笔者几经反复考证,认为“申池西门”说是凭空推论,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二)典籍史料的辨析。欲知申池的规模和具体

方位,应以《左传》和《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为据,方知其真实。申池在信史《左传》和《史记》中有三处记载,今抄录于下:(1)《左传·文化十八年》:“夏五月,公(齐懿公,系齐桓公之子)游于申池。二人(仆人邴歃、驂乘闾职)浴于池。以扑扶职,职怒。曰:‘人夺汝妻不怒,一拂汝,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杀懿公,纳诸竹中。归,舍爵而行。”(2)《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齐灵公时,晋平公会鲁、宋、卫、郑、曹、莒等12诸侯,共同伐齐,“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北郭。刘难、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3)《史记·齐太公世家》亦载:“五月,懿公游于申池……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典籍三处均载“公游于申池”,可知申池不仅仅是个水池,而是齐国君主重要的游览胜地宫廷苑囿。从引文(1)“二人浴于池”看,申池不可能在“齐城西门左右”,因“西门左右”人们熙来攘往,岂是国君的仆人和驭者洗浴的地方?再说谋杀国君的地点选在城门口左右,即使邴歃和闾职是两个笨蛋,也不会这样做的。哪里还有比城门口更人多眼杂的呢?二人谋杀懿公后,就“归,舍爵而行”去了。“归”与“游于”相对应,可知申池与都城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故说申池不可能在“西门左右”。引文(2)中的“焚申池竹木”强调指出“刘难、士弱率诸侯师”前往焚烧,说明申池不在城西门左右,又距城不会太远。如果在“西门左右”,自当焚城郭与焚申池竹木一并进行,如果太远,也无当即专程率师去焚烧的必要。从另一角度看,“率诸侯师”前去申池焚竹木,也从侧面说明了申池规模之宏大,其地位之重要,如果是一普通水池,还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由此可见申池是一处规模宏大的齐国宫廷苑囿。从引文(3)中“二人弑懿公于车上”看,齐懿公是乘坐车驾穿行于申池宽阔道路上而被杀的。这从侧面反映了申池规模的宏大,这正是齐国宫廷苑囿的格局。

(三)志书和遗存的印证。据传申池遗址在距齐城西20余里的今临淄凤凰镇申桥村一带。清康熙《临淄县志·古迹》载:“申池(在)县西二十里。”这两



者正相吻合,也正符合此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肯定的懿公“见困近郊”的论断。另外,乌河中游申桥村周围的诸多遗存也都要印证了这一点,在申桥村中间有元代建的一座古桥,横跨潯水之上,桥头有石碑,碑阴刻曰“申桥”两个大字,《临淄区地名志》称:“古迹方位村名。桥以‘申’名。”当是申池古迹遗存。桥头有一古碑,阴刻“申池”两个大字,此为申池遗址的佐证。民国《临淄县地》记载,申桥庄附近相传有两处古迹遗存,一为“瓮倒井”“深不可测在申桥庄后”。一为“跑马泉”“泉涌似跑马”,在申桥庄中。此两处古迹遗存当与申池有关。这从侧面印证了申池遗址当在申桥庄一带。再另外,“申池”之名多次被用于行政区划称谓,它是古迹名称延续的见证。日伪时期这里称过“申池乡”,建国后四区下设“申池乡”,公社化时期,申桥村一带还称过“申池片”,这些也是申池遗址具体方位的旁证。

综上所述,充分证明了申池是一处齐国规模宏大的宫廷苑囿,其具体方位就在今临淄凤凰镇境乌河中段申桥村一带。

## 二、关于申池为“齐桓公苑囿”的考证

据前文的考证和辨析,笔者把“申池”称为“齐国宫廷苑囿”仍感单薄和不准确,这就涉及到申池名称定位问题。下面对申池的创建者及其具体规模等内容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一)从齐桓公“游于囿”考证申池的创建者。据《左传·僖公三年》载:“齐侯(桓公小白)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来之绝也。蔡人嫁之。”这段记载的意思是:齐桓公与夫人蔡姬乘舟在园林(申池)中游玩,蔡姬晃动船身,桓公惧水害怕,吓得脸色都变了,急忙让她停止,但蔡姬不听。桓公极为恼火,回来就把她送回了蔡国。但没有与蔡国断绝关系。不久,蔡国又把蔡姬改嫁到了别国。(后导致伐蔡国之战)这里记载了齐桓公乘舟于囿的历史事实。何谓“囿”呢?《辞源》载:“囿,有围墙畜养禽兽的园林。”《左传集解》载:“囿,苑也。盖禽林、鱼池在苑中。”两注书都说是养禽兽,有水池和林木的地方。从“乘舟于囿”看,更是规模宏大的湖泊了。笔者查遍齐史资料,除了远在百里之外,今高青县境内的“高苑”外,齐都近郊养有禽兽,植有竹木,又有池水可荡舟的场所只有申池。况且史料中在齐桓公乘舟游申池之前,皆无此例。我们屈指数来,齐国君主中只有五霸之首齐桓公掌控时的齐国,才有充盈的财务物力得以修建这样宏大的苑囿。因此说申池为齐桓公创建是在情理之中。

(二)以齐宣王与孟子“说囿”来加深对申池内涵的考辨。《孟子·梁惠王下》中有孟子在雪宫回答齐宣王“说囿”的一段回话:“臣始之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40里,杀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孟子这段回话的意思是:我初来乍到贵国边境上时,首先了解齐国有何重大禁令,然后才敢进入贵国。我听说国都郊外有个方圆40里的公园,凡是在公园里猎杀了麋鹿的人,就像犯了杀人罪一样。从文中得知下信息:①“臣始入境——孟子从鲁国来,自然从齐都西边入境,他所闻的‘囿’必是都城西边的百姓所亲见的,这就说明申池在齐都的西境。”②囿在“郊关之内”——《尔雅》载:“方五十里(先秦二里相当于今一里)为郊关。”这就明确地界定了“囿”的位置在齐二十多里处。齐都西边二十多里处的“囿”当然是指的申池无疑了。③“有囿方四十里,杀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有囿方四十里”说明苑囿的规模极其宏大,且畜养着大批的麋鹿。申池养殖禽兽还有两个旁证:①据《临淄文物志》载:“申桥南八里有一座古墓,传为孔子女婿公冶长墓。史载,公冶长是齐国诸邑,能通鸟语。这位驯养禽鸟”专家在申池供职,死后葬于此。这个说明申池多养殖禽鸟。②刘向《说苑》载:“齐宣王出猎杜山(即今凤凰山)遇间丘印。”杜山在申池附近。这说明直到战国时期,这里仍是养殖禽兽供君主游猎的囿。孟子对齐宣王的答话和两个旁证,进一步说明了申池的具体方位和其广阔的战地面积,更加深了对申池内涵的了解。

综括全文,得知齐桓公曾乘舟游过申池,他的四子懿公曾在申池被杀,他的玄孙齐灵公肘,晋将曾率焚烧了申池竹木。至战国时,孟子还听说申池“方四十里”且畜养麋鹿繁多。由此看来,这个由齐桓公创建的苑囿申池存在于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虽屡遭毁坏,但规模仍极其宏大,它又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载体和见证。由此可见,申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开发价值。

这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齐桓公苑囿申池淹没于历史长河数千年,如今若能开发复建成为宫廷式的园林,它将成为经海强区的重要文化支撑,它将起到齐文化开发里程碑的作用。笔者建议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在新整修的乌河中段申桥村一带适当位置设置“齐桓公苑囿——申池遗址”标志碑。第二步,通过媒体宣传,广造舆论,待时机成熟,集各方之财力物力,复建“齐桓公苑囿——申池公园”,将其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全国第一流的人文景观园林。□



# 孙武治军之道与现代企业管理谋略

薛国安

孙武是一位谋略艺术大师，同时也是一位管理艺术的专家。吴宫教练宫女，怒斩吴王爱妃的故事非常能说明他严格治军的特点。孙武之所以在治军问题上一丝不苟，不阿权贵，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管理出战斗力、管理优劣决定战争胜负。虽然他没有列出专门的篇章讲管理，但纵观十三篇，各篇都蕴涵着一些管理思想。如果以《计篇》中的“七计”为线索，我们不难看出在孙武的思想中管理方面的认识实际上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其中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今天在治军工作中借鉴，同时也值得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借鉴。

## 一、“主孰有道”与宏观管理策略

“主”即一国之君主，可引申为一支部队的首长，或一个企业集团的首脑、主要负责人。“道”有多层含义。一是国君自身的道德修养，二是国家政策法规的性质，三是国君的宏观领导艺术。这三方面的含义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主次关系。无论孰主孰次，在孙武的思想中，有道之主必须注意从如下几个方面提高宏观管理艺术。

### (一) 国君必须有道

所谓“道”，即“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有的版本写作“而不畏危也”。这里的“令”不是命令的令，而是指君主通过开明的政治使老百姓的思想意志自觉地与朝廷保持一致。一旦形成这种局面，那么老百姓便可以为了国家的利益出生入死，在任何危险的时候都不会背叛。当然，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形成“令民与上同意”的局面，首先国君的道德品质要令人信服，其次国君的政策法令要符合民众的利益，再次国君要有才。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道”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长期“修道而保法”。

就一个企业而言，总裁就是企业内的君主。总裁是否有“道”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必须打破一个误区，以为管理只是对下属和员工的组织指挥问题，总裁只要掌握这种组织和指挥的艺术就行了。其实，最重要的，或者说整个管理艺术的第一步，就是总裁必须严格自律，加强修养，在道德品质、敬业精神、工作能力等方面为人师表，如此方

(上接第11页)年左右，稷下学士而外，更专门担任过接待外宾的“诸侯主客”，也多次衔命出使异邦。从没有他出仕楚国和游览客死的文字实证。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里倒是记有“楚王贤其言，辨其词，因留而赐之，终身以为上客。”似为刘诗所本，但那是没有使臣名字的另一故事传说版本。总而言之，宜城的驿和墓，是后人追慕而制造的人为遗迹，和淳于先生也没任何关联。

我省龙口市(原黄县)境内也有一座淳于髡墓，看来，比较接近实际。

还在早十几年，刘庆文先生查访临淄人汉代名医淳于意的别证，除了临淄墓外，他还依据一条线索，到了传说中淳于意的墓地

所在处龙口市下丁家镇丹岭村。当地并无淳于姓族人，村里老人讲，村外原先确有一所淳于姓的祖墓，原先有封土和墓碑。如今，封土早已夷平，墓碑也砌了墙，上面字迹模糊难认，不知这墓主究竟是谁。初还记得从前黄县城东诸由观一带很多姓淳于的，每年清明节都结队来祭拜。刘先生把访查结果写文章刊登在《临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

我和刘先生有忝属文字之交，对他的文章挺感兴趣，病余多暇，涉猎所及，发现一处新的文字佐证，记述在这里，以供探讨。

在明代官修志书《大明一统志》的山东省登州府黄县部分，记有明朝以前古代坟墓，总共只有两处，一处是姜齐末代国君康公

姜贷，另一处就是淳于髡墓，标明此墓位在黄县城东二十里的蔚阳山下。在列举的当地淳于姓名人，有秦朝博士淳于越，有唐初的登州刺史淳于难和莱州刺史淳于朗，还有宋朝时的太子中书舍人淳于雍，并分别在各自姓名下注明：“髡之后”。并无淳于意著录。诸由观镇在黄县城东，这和丹岭村老人所说城东淳于姓人清明节去丹岭村墓地祭拜的旧事，可以互证。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丹岭村外的古墓主人是淳于髡后裔的名宦，绝不是淳于意，淳于意是没有儿子的，当然不会有众多后裔远道来燃香和酌酒的。

我想，如果通过原黄县城东访问，进一步查询当地史志，此处的淳于髡墓确认，当会有积极的结论。①



能做到“令民与上同意”。与创业的一代相比，守成的一代总裁更应当高度重视这一点。

## (二)精心选拔将帅

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作用以及选将用将问题。他把国家比作战车，而把将帅比作车体两边起固定和牵引作用的辅木。认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辅木与车体结合越周密，整个战车越牢固。反之，如果辅木与车体之间有缝隙，整个战车就容易散架。同理，将帅对国家尽心尽力，国家必然强盛，而将帅对国家三心二意，则国家必然衰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正因为将帅与国家安危息息相关，孙武提出一个“择将”的问题，要求“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择人而任势”。这里“责”，意思是“求”。他的意思是不要求强于人。有的企业家认为，企业的技术或财务，都不能公开，是一张纸的问题，一捅就破。所以，过分依赖技术人才、财务人才、高层管理人才，生怕他们“跳槽”。实际上，人才是很难私有化的。正确的办法还是建立科学的机制，选择愿意或有能力达到某项目标的人为自己服务，只要达到目标即可，至于是否忠心则无关紧要。这就要求我们，不要把企业的身家性命全部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而是要选择合适的人去充分营造有利的形势，各方面人才组成的人才方阵合力开创事业。

## (三)提高将将水平

所谓“将将”是指如何领导下属或搞好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孙武认为，国君统帅不必事必躬亲，独揽大权，要相信将领，进行目标管理，指定目标、检查结果、不问过程。他指出了国君干涉将领工作的三种常见现象：“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mí)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把将帅当作木偶，一举一动都要受国君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将帅是无法有所作为的。所以，历来善于统兵作战的将帅无不反对国君干预。

道理说起来简单，而且普遍认同，但在社会生活中国君或主帅总是放不开手中的那根线，习惯于用手中的线牵制前线将领。两宋时期，这种国君干涉将帅指挥的情况发展到最为严重的程度。当时将帅领兵出征作战，必须依照国君亲自审定的军阵图行事，将帅不得擅自改变，结果严重束缚将帅的

主观能动性，屡战屡败。

善于将将，除了不御将之外，还要注重量能授职。清太祖努尔哈赤曾说：“全才者有几？夫一人之身，才技有长短，处事亦有工拙。有阵中之勇者，于理国则拙而无用；有宜于国中者，于从军则无用矣。自是任用，皆随其材。”（《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通俗地说，就是要用善于治国的人才去治理国政，用善于治军的人才去统领军队，各尽其才。中国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可谓这方面的典范。他因善用张良、萧何、韩信而取天下，确实堪称将将高手。在经营领域，企业家要想开辟一块天地，成就一番事业，最好也要有点善于将将的本领。聪明的企业家往往会对刘邦的将将艺术心领神会，并善于结合当代中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古今结合，融于自己的工作之中。

## 二、“将孰有能”与管理者的素质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所以一将难求，难就难在千军之将不是随便哪个都能担当的。这种人必须要有特殊的才能和杰出的综合素质。所以，孙武十三篇中多次论及将帅的才能和修养问题，其中“为将五德”和“为将五危”尤应予以重视。

### (一)为将五德

所谓“为将五德”，是说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具备五方面的才能。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自身修养，认为这是能否成功治理军队的关键，也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他在《计篇》中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后人称之为“五德”。用今天的军事术语来说：智，即多谋善断；信，即赏罚有信；仁，即爱兵抚士；勇，即勇敢坚定；严，即明法审令。

曹操注释此句时提出，“将宜五德备也”，强调一位优秀的将领，应当五德兼备，缺一不可。但对于任何一位将领来说，五德之才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学习，不断修炼，才能不断提高，特别是五德之首的智力才能更是如此。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明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是会暴露出来的。”因此，即使一个职位最低的指挥官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不要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在职位较低时获得的声誉带到了较高的职位上。

此外，孙武认为优秀的将领在心理素质上应当能够“静以幽，正以治”，即考虑问题冷静而幽邃，管理部队公正而严格。要注意谨思慎行，“主不可以怒



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在思想品格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意思是说,如果取胜前进了,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功名;不战而退了,也不逃避自己违令的罪责,只求保全民众,符合国家利益。

### (二)为将五危

所谓“为将五危”,是告诫将帅要尽量避免五个方面的弱点。孙武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凡事皆有度。在这里,孙武突出强调的就是为将之“度”。“必死”的“必”,即固执一端。不怕牺牲是将帅应具备的品德,但如果超过了限度,变成轻生决死、作无谓的牺牲,那就成了拼命主义。拼命主义的勇敢固然不好,但怕死贪生也同样是不可取的。“必生,可虏”,战场上越是贪生怕死,越有被俘的危险。“忿速”指的是性格急躁、偏激,急于求成。“廉洁”指的是过于洁身清廉,看重名声。“爱民”指的是一味迁就求全,不知权衡利害。这些都是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弱点,是那种片面性严重而不懂得辩证法的庸将所具有的特点。

综合孙武的为将思想,不难看出他对将领素质的要求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综合性,二是辩证性。具备“五德”等综合素质的人才,恰当把握各种才能的限度,避免“五危”之类的失误,灵活发挥自己的特长,这便是建大功、成大业的良将。

企业管理与军队治理一样,“存亡之道,命在于将”。那么,经理人不妨从上述为将五德、为将五危等思想观点吸取一些借鉴,有意识地修炼自己。当然,毕竟时代发展了,为将之道也应当增加新的内容和要求。今天的军事将领除了要培养古代将领的综合素质,更要掌握当代的科学技术。

特别是对于当今经营管理领域来说,时代对职业经理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作为企业经理人,要想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应当从多方面修炼自己。

### 三、“法令执行”与加强制度管理

古代有远见的军事家都非常注重以法治军。孙武所说的“法令执行”,显然着重讲的是以法治军问题。其重点在于如何“行”法。

#### (一)令必素行

孙武认为,治军当严格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军令既出当严格执行,不可朝令夕改,因人而异。“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

众相得也。”其中的“素行”二字至关重要,突出强调了民众或将士是否服从管理的关键在于将领是否始终严格执法。西汉名将周亚夫“军细柳”的故事历来被人们传为执法如山的佳话。

人们都想打造百年老店,为什么有的如愿以偿,有的昙花一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是不是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是不是持之以恒地遵守这种制度。长安汽车集团生产车间内有一幅醒目的标语:“管理的灵活或许是一种艺术,制度的灵活肯定是一种灾难。”不仅强调建立一套十分严格、健全的,实用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管理制度,而且高度重视整个管理过程,在实际执行中敢于在“严”字上下工夫。

#### (二)文武兼施

军营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地方,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特殊而又神秘的军人。但是,军营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军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基于这种特点,聪明的将领既要善于以法治军,也要善于以情带兵。所以,孙武主张文武兼施,恩威并用。

他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指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所谓“亲附”,是指将领的恩惠和信义深得人心,能够凝聚广大官兵。如果不施任何恩惠或没有展现任何诚信,便大行惩罚,势必难以使部下心悦诚服,关键时刻也就难以调动起来他们拼死效力的积极性。所以,孙武告诫将领们要“视卒如爱子”。相反,如果一味讲究恩惠和信义,而不能严格执法,那么关键时刻也可能同样指挥不动娇惯了的士兵。所以,古人强调“慈不掌兵”。

一方面说“视卒如爱子”,一方面又说“慈不掌兵”,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是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但正是因为有矛盾,而且矛盾双方有可能相互转化,才使得事物的发展千变万化,也才可能激发人们无穷的智慧。孙武的治军智慧就在于他准确地抓住了治理军队的核心矛盾,并从中探索出一条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历史上曾经与孙武齐名的吴起应当说是深谙此道的。他一方面强调军令严明,使三军服威。另一方面,又要求将帅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据司马迁记载,吴起行军作战时总是与士兵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自带粮食,同甘甜共苦味。他甚至亲自为生病的士兵吸吮脓包。吴起这种文武兼施的做法深得人心,部队官兵都乐于服从他的管理和指



挥,作战勇敢,所向无敌。

### (三)宽严适度

应当说,文武兼施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任何领导人都知道要同时使用这两手。可是为什么有些人用起来得心应手,有些人用起来却运转不灵呢?奥妙就在于能不能把握好“度”。孙武强调“文”不可滥用,“武”不可过度。在他看来,将领固然要“视卒如爱子”,以仁带兵,但不可爱之过分,以至于“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宦官专权,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君对这些近臣过分依赖、宽厚、骄纵,动不动就大行赏赐,加官晋爵,使其逐渐掌握大权,以至于他们所掌握的实权超过了皇权,最终挑战皇权,酿成天下大乱。所以,对任何部下都要宽严适度,收放有节。

与军队相比,企业的气氛相对来说要宽松一些,人情味更浓一点。然而,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注意将孙武的文武之道引入管理,应当有益于提高企业管理状况。孙武讲的文武之道,与当代企业的“软管理”和“硬管理”大体一致。企业管理是一个过程,是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可以凭借制度约束、监督,直至惩处、强制等手段进行“硬性管理”,也可以依靠感召、启发、诱导、激励、奖惩等方法进行“软性管理”,并注意将硬管理与软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法为纲,人为本。这一系列软管理和硬管理的方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落到实处,必须具体化。

### 四、“士卒孰练”与注重各级培训

“士卒孰练”主要讲的是部队训练问题,训练有素的一方战斗力必强,作战时必然具有优势,训练不精的一方则战斗力必弱,作战时必然处于劣势。在一般情况下“剑不如人”,有时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一时难以改变的事实。但是“剑法不如人”则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加以改变的。只要加强训练,改进战法,提高部队战斗力,是完全可以做到“剑法过人”的。从而摆脱“剑不如人”的困境,以超人的战法驾驭劣势的武器装备去战胜拥有优势武器装备的敌人。所以,关键是一个“练”字。聪明的管理者务必在练兵与精兵上狠下工夫。

#### (一)练兵与精兵的关系

古代有眼光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多强调重视军事训练。《吴子》提出:“教戒为先。”《司马法》也说:

“士不先教,不可用也。”都是主张把教育训练放到治军的首要地位。孔子作为教育家、思想家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认为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打起伏来就等于把士兵白白送给敌人。宋代名将岳飞率领的岳家军、明代名将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就是因为训练有素、军纪严明、战斗力强而闻名于世的。值得注意的是,岳家军、戚家军等训练有素的部队通常都是十分精悍的精锐之师,这与孙武的精兵思想完全一致。

孙武强调军队要有实力优势,但实力并不在于兵员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训练有素。所以不讲“士卒孰多”,而讲“士卒孰练”。在他看来:“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兵力不在于愈多愈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够集中兵力,能够准确判明敌情,能够战而胜敌,这就足够了。冷战结束后,世界许多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奉行质量建军思想,大量裁军,只保持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干部队,中国也先后裁减100万人和50万人。这一情况固然是冷战结束后时局变化的结果,但其思想源头则出自于孙武。

#### (二)注重企业各级员工的培训

企业都希望少养员工多出效益,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孙武重训练、求精兵的思想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思路。企业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关键又是能力的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经营管理理论的引入,近些年来我国企业界已普遍开始重视员工培训,这是好现象,但要使培训真正有效管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在这方面西门子公司的一些做法与孙武的思想暗合,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启示:

首先是重视培训,投入大量资金。西门子每年将占利润1/5左右的经费用于员工培训,而且培训基地装配的都是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我国企业的当务之急是转变观念,切实加大培训投入。其次是培训要有针对性,与公司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西门子有针对性新员工的“第一职业培训”,有储备管理人才的精英大学生培训,有专为现在和潜在的管理人员准备的五级管理教程,有各种员工再培训计划,他们的设置本身就是很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而且,其培训内容也是以企业发展为目标,根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来设定的,员工通过学习,最终要达到能够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和提高为企业服务的目的。第三,培训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应该与员工的发展紧密联系。西门子员工培训常抓不懈,而且注意



将培训与员工个人发展相联系,使员工积极主动参与进来。西门子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通过“与员工的谈话”来了解员工的愿望,结合公司需要,经过客观分析,认真制订每个员工未来发展领域和方向,并会同员工一起拟订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认真组织实施。培训工作与员工个人发展计划结合起来,能够使员工意识到培训是与自己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大大提高了培训的效果,实现了公司和员工的共同发展。目前我国企业的员工职业生涯设计工作刚刚起步,与此相联系的培训尚未广泛展开。这应当是企业人才培训的核心目标和一个突破点。

### 五、“赏罚孰明”与落实激励机制

孙武之所以把“赏罚孰明”列于“七计”之中,主要因为赏罚历来是治军的法宝,也是治军的标志,通过观察赏罚是否严明,可以判断对方军纪是否严整、战斗力是否强盛。在这方面,关键是一个“明”字。

#### (一)赏罚的多种途径

军中实行赏罚的历史源远流长,据文字记载至迟在夏启讨伐有扈氏的甘之战中,就提到“用命,赏于祖;弗命,戮于社”(《尚书·甘誓》)。千百年来,赏罚成为国君将帅激励官兵冲锋陷阵的主要手段,演化出无数司马穰苴辕门斩庄贾、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之类的故事。综观历代赏罚之术,大体有如下几种途径。

一是主张赏小罚大。主张“以诛大为威”,要敢于惩罚那些权贵,才能树立权威;“以赏小为明”,要奖赏到那些地位低下的士卒,才能显示出公正严明。

二是提倡不徇私情。正如明太祖朱元璋的主张:“赏罚者至公之道也,赏当人心,则众劝于善,罚当人心,则众惩于恶。善为政者不以赏私亲,不以罚私怨。”一句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三是注重信赏明罚。韩非子认为,“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韩非子·内储说上》)。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治必由之”。

四是强调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司马法》中有一句经典名言:“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让兵士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看到功罪的利与害。

孙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重奖、再罚。他要求“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即施行超越惯例的奖赏,颁布打破常规的号令,那么,指挥全军就会如同指挥一个人那样,令行禁止,指哪打哪。

无论采用哪一种途径实施赏罚,有一点是共同

的,那就是精神和物质并用。在军人这种特殊的武装集团里,精神因素往往是最重要的。克劳塞维茨曾经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概括为“战略五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统计要素。其中,精神要素是第一位的。在克劳塞维茨看来,精神要素之所以是战争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是将帅意志和军心士气的支柱,良好的精神素质能激发将帅的聪明才智,能鼓舞士兵的高昂斗志。因此在战争中精神要素有着惊人的作用,精神力量的得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其次,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紧密结合,并赋予物质要素巨大活力。受客观条件限制,物质要素通常是有限的,而精神要素的发挥却没有任何限制,它在特定的情况下能使物质要素的力量成倍地增长。再次,在物质力量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精神力量往往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精神要素普及于军队上下各个方面和作战的各个阶段,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利益往往是精神要素的重要源泉,物质利益与个人的精神状态有一定关系,但不是最重要的关系。最重要的在于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者说,奖赏的艺术就在于如何奖到人们的动情之处。

现在虽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对金钱比以往看得重一些,但并非一切都能以金钱衡量。如果单纯靠物质奖赏,即使给100万恐怕也没有谁会愿意冲上老山战场,也没有谁会长期驻守南海礁头,更不会有谁愿意在世界屋脊站岗放哨。不可否认,今天的人们比以往更需要物质奖励,应当加大物质奖励力度。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精神鼓励仍然是激发人们内在动力的重要途径,聪明的领导者往往善于在“赏喜罚恶”方面巧做文章。

#### (二)落实企业激励机制

现在的企业家们大多希望在自己的企业中培养一种团队精神,以凝聚全体员工团结奋斗,共同创业。应当说,团队精神绝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企业家从多方面努力。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培养共同的奋斗信念,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此外,建立严明的激励机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途径。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欲望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对归属感和情感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相应地,对人才的激励也是以此为依据,结合人才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激励措施。另(下转第10页)



公羊高，战国时齐国名儒，相传是子夏（卜商）的弟子，作《公羊传》，也叫《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

《公羊传》作为家学，最初都是口耳相传，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到西汉景帝时，他的玄孙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毋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及邀集的研究公羊高的学者，辑录成《春秋公羊传》，并写在竹帛上，流传于世。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

《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史事记载较简略。

《公羊传》是今文，盛行于汉武帝、汉宣帝之时。成为儒学“十二经”之一。自王莽时，古文大盛，《公羊传》渐少人研究。到清代后期，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主张复兴今文学，借用公羊传“微言大义”来说经，议论时政，对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公羊学说的形成和丰富，自战国起至东汉末，经历了五六百年。由《公羊传》奠基，胡毋生《条例》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发展，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系统地总结，如此世代努力，构建起公羊学说的理论

## 齐国名儒公羊高

李俊



公羊高像

体系，并成为今文学派的中坚。中国儒学具有繁富的内容，在不同时期，以及在不同学派身上，形成不同的特色。就汉代形成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而言，就各具特色，在此后历史长河中，适应不同时期政治、文化条件的需要。古文学派有其长处，如重视史实，讲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不讲或少讲灾异迷信，讲究文字、制度、名物训诂等。与之相比，以公羊学说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也有自己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三项：

一是政治性。中国历代志士仁人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精神。孔子志在安邦治国，希望实现“天下有道”的局面，孟子反对暴君污吏，反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主张实现统一，主张施行“仁政”。公羊学派继承了先秦儒学这种积极的精神，主张“大一统”，倡导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而“改制”，谴责暴君贼臣，关心民族关系。公羊学这种“以经议政”的传统，到封建制度衰败的时期，更加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发挥出战斗的力量。

二是变易性。公羊学形成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变易历史观。由《公羊传》提出“三世异辞”，是处于萌芽状态，至董仲舒便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到何休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进化历史哲学。公羊学者吸收了先秦思想家的思想资料，如孔子认为后代对前代制度加以“损益”，韩非认为今胜于古，也吸收了《周易》“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何休的“三世”历史哲学，还糅合了《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而



加以改造。《礼运》篇讲“天下为公”的“大同”世是在遥远的古代，而现今是“大道已隐，天下为家”的小康世，历史是退化的，何休加以改造，概括出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进步历史观，相信人类社会将进步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境界。“三世说”与“通三统”相贯通，强调自古代以来，社会和制度都在变，那么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又强调时代越来越进步。这两个核心观点都反映了历史演进的本质，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到了清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处在旧制度行将崩溃，近代化进程即将开始，西方的侵略和西方文化传播同时出现的特殊阶段。面临这种空前历史变局，公羊变易历史哲学便被进步思想家们所利用、改造，形成一套敏锐反映时代前进脉搏的新的变革学说，从而迸发出异彩。

三是解释性。公羊学说专讲“微言大义”，对《春秋》或《公羊传》中简略的文字，大胆地阐释、发挥，故公羊学说可视为中国古代一门解释学。从《春秋》的“春王正月”可以得出“大一统”的解释，又从《公羊传》的“大一统”而得出董仲舒“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解释，而进一步又得出何休“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无不归于王者政教统摄之下，以及其以王为核心、“五者相须成体”的“世界图式”。公羊学说这种解释性特点，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弊病。由前面的某一点为发端，解释者可以引发出去，畅意讲出自己的理解，发挥理论的创造性，借解释以立新说，这是其突出的优点。但这种大胆解释，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随意比附，流于主观性，这又是其明显的弊病。就公羊学说创造性的优点而论，清代中叶以后进步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将之发扬光大，他们需要倡导变革维新、救亡图强，倡导了解世界，学习西方民主政体和进步学说。公羊学说恰恰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的途径和合理的形式。①

# 节彼南山 维石岩岩

——深切缅怀路元祥先生

路金川

总有一些人，值得人们去深深地怀念，路元祥先生便是一位赋得永久怀念的人。

齐国故都临淄城西20里处有一座愚公山，冬天里的山上积雪皑皑，名为“愚岭冬雪”，是临淄一方小小的名胜。1937年冬月，路元祥先生出生在愚公山下泲水东岸的路家庄。先生祖居北五里即龙山文化桐林田旺遗址，南四里有齐国苑囿“申池”遗迹，先生生前常把玩篆刻家石可先生为其刻制的一方寿山石图章，温润可人，内容为“泲水之右、愚山之阳、爽鸠遗墟、故土一方”，阴文，汉印风格，短短四句即把先生的祖居交代清楚了。先生慕高山伟岸，择诗经《小雅·节南山》中“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句取字为岩。提笔写下此文，也仿佛仰止在先生这座高山之前，谨能遥寄心香一瓣，愿先生在远方一切安好。

自幼生长在齐故都临淄这片历史文化和文物遗存丰厚的土地上加上先生热衷传统文化、潜心战国古齐乃至山东历史研究，在那个贫困饥荒的年代，路元祥先生一方面投身社会主义农业大生产中，一方面挤出时间将精力投入到历史文化的学习中，年青时便积淀起深厚的历史考古知识。翻开先生1965年的日记，扉页上先生亲笔抄录着爱德华·巴格利茨基“青春不会消亡，青春常在”和拉德夫斯基的“尽管贫困统治我们，尽管我们的权利很少；我们的青春依然健在，我们的青春正在燃烧”的文字，曾经的翩翩少年对生命和青春的热爱可见一斑。

1976年3~6月，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敦愿、蔡凤书、马良民等带领历史系1975级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发掘，在对齐国故城桓公台宫殿区遗址及河崖头墓葬区进行大面积考古发掘期间，路元祥同志作为临淄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参与协助考古调查活动，并结合齐都临淄相关文物记载，为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先生对山东古代史及齐国故城考古研究方面的建树也得到时任考古系主任刘敦愿教授的赏识，考古工作结束后，因当时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建之初考古教师资源匮乏,路元祥同年被特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兼职讲师并颁发聘书。在山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的几年期间,路元祥先生主要讲述山东古代史及齐故城研究,且将学习和授课二者于一体,提升拓宽历史考古知识面。期间,由刘敦愿教授引荐先生结识蒋维崧先生并多向宋百川教授、蔡凤书教授、张知寒教授、于海广教授请益田野考古、历史文化知识及先秦诸子研究,并与诸位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工作结束后,路元祥先生返乡自学中医并通过中医科考试,先后于淄博市临淄区朱台医院、临淄区医院工作,悬壶报答于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直至逝世。

回顾先生一生求学问道、为人治学的过程,可用四方面作以集中概括:一曰儒雅谦虚。先生一生为人治学,谦卑弥切,但凡家乡中有对历史方面有所涉猎的老先生,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师长还是世辈耕耘于斯的平民布衣,都虚心求教、谦恭请益,这也为其在齐国历史遗迹的考证方面积累了丰厚的天然资源,得其地利,加之先生慧心聪颖,先生有所成就势当必然。二曰勤于治学。先生所学知识均是自学为主,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授课期间,虚心向山大的教授们请教知识,先生当时留存的学习资料细密谨严、考究详尽,曾先后对齐国鲍叔、高子、国子等上卿进行考证,《齐文化丛书》中也刊录先生提供的一段齐故城城垣考据资料。三曰处世淡泊。先生一生恪守传承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精神,淡然处世、从容应物,但凡有求于先生事情定是竭尽全力,慷慨相助,而对自己的事情却是宽和对待,不以物喜己悲。先生又热爱传统书画艺术,在家乡曾创办临淄稷下墨宝斋弘扬传统文化,在刘敦愿教授去函引荐王学仲先生时曾称先生为人治学有“墨子遗风”。因与上海师范大学王延洽等教授的关系,先生晚年又将所收藏古陶器分别捐献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及南京大学博物馆,为历史考古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应有的力量。四曰重交情谊。先生在山大的工作结束后返乡归里,虽然与山大的老友见面较少,但一直保存鱼雁往来,翻阅先生保存的信件,既有与山大教授们对历史考古的学术探讨,又有关心生活子女的日常琐事,这正是学者们的君子之交。1994年刘敦愿

教授将其所藏在国立艺专老同学胡明德所汇戏曲人物转赠先生,并补款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元祥君天津之行归来,赠此以作纪念”,其年刘教授77岁,可见两位先生的深厚情谊。先生2005年农历8月因肝疾逝世,诸友无不潸然,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赖非先生曾写挽诗云“夜阑思君渺云汉,披衣徘徊银河岸,记忆北斗尔莫察,泪雨哀君已长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我这个晚辈后学的心中,先生就像一位杖藜行歌在海岱之间的战国士子,又像一本丰厚的书、一个多彩的名士,翻看先生1976年12月在山大所记《山东古代史稿》最后的按:“山东古代史就讲述到这里。再往下讲,就是封建社会的战国了。”仿佛看到先生站在三尺讲台上,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和学识,或许这也是先生一生最引以为豪的。路元祥先生毕生热爱着历史文化和田野考古,并将所学知识传授晚辈后学,惜多述而不作,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末学曾多次拜访先生,那时先生多讲述很多山大逸事,讲那些老先生们的风采和处事,讲书画文人书卷气的养成,至今仿佛昨日,历历在目,并建议我学习书法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能够熟读古代典籍及《医古文》,也希望我学习中医方面的东西,可由于自己的生性懒惰至今未能成器。由于身体原因,当时先生虽然聊起其求学、学艺的种种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但每天都需要卧床休息养神,想起来很是让人心疼。即便如此,晚年的先生仍约老同学朱焕章先生游览了临淄城的古迹遗存,谒晏婴、拜管仲、登桓公台、览四王冢,凭吊先贤,格物致知,诠释着他对历史文化的赤子之心。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蒋维崧先生赠送先生的一副行书书作也特意选取了王渔洋先生《夜经古城》诗,文曰:“我行牛山下,寒墟带平楚。不见齐王宫,空城半禾黍。疏星耿不明,白杨夜深语。”或许这也正是先生一生的心境写照。

世事沧桑、蹉跎磨人,但这位治学严谨的先生内心一直有一颗庄子般逍遥的心,先生晚年请老朋友篆刻家石可先生刻制了一方印章名为“濰水渔僮”,家乡有“宁戚饭牛”处遗址,先生所号与此异曲同工,每每闲暇之余先生总喜欢把抚润养,对着刘敦愿先生赠给先生的手泽沉思遥忆,我想先生定是想起了那些在山大的老友,抑或是想如童年般垂钓在故乡濰水岸边,做着和庄周一样的梦……



# 天南地北临淄人——当代著名书画家——王宁

王内祥

王宁，号老槐，1943年生于北京，祖籍临淄区王家桥村，是孙娄店王氏当代著名的书画家。其父王同凤，燕京大学毕业，曾任河北省丰润中学教员、清华大学水利馆职员。

王宁，1961年从师宁斧成学习书法、篆刻。1963年从李苦禅先生学习写意花鸟画。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生前曾为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印社会员，北京市花鸟画研究会会员。1980—1998年在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工作，先后担任两次文物管理所所长。在职期间，为建立本地区海淀博物馆呕心沥血、不遗余力。海淀博物馆的丰富展品大多数文物都经他手收集整理。其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书画展，并多次获奖。1994年和1995年连续两次在日本举办个人作品展和“王宁书画作品特别展”；1996年曾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举办个人绘画作品展并讲学。

王宁出生于书香人家自幼受传统文化的侵染、熏陶。并从师宁斧成、李苦禅、包于轨、郭凤惠等老前辈，学习书法、篆刻、绘画，能得各位老师的法度与精神。他饱读诗书、学养深厚，于诗、书、画、印都有颇高造诣，这源于随宁斧成、李苦禅、包于轨等诸大师的刻苦研习，源于他对历代诸家之佳作名篇的博览沃读，源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源于他对于天地

(上接第32页)文化内容产业，增强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齐文化生态园、齐国故城遗址公园、大型齐文化博物馆、孟姜女民俗文化创意园、牛郎织女爱情文化民俗园、周村古商城、聊斋文化产业园、中华陶琉文化城、淄博民间收藏博物馆群等十大文化产业项目，辐射带动齐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打造“齐文化节”节庆文化品牌，整合已基本培育形成的“世界足球起源地”和“姜氏后裔寻根祭祖”两大齐文化品牌，培植一批以齐文化为内涵的工艺美术精品，编创一批“齐味”浓郁的文化剧目，延伸齐文化产业链，做大做强齐文化产业品牌，实现无形文化向有形产业的转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由志鸿教育集团打造的印

造化的体察入微，源于他不为世事所扰静心潜悟。王宁以极高的艺术天分厚积薄发，将中国画人文精神借于笔端，诉于纸墨，写就其清逸超脱的画风。

王宁先生学习书法非常勤苦，收藏的碑帖也很多，钟鼎铭文、秦汉刻石、魏晋碑志、造像摩崖、历代法帖多所涉猎，尤善隶属和章草。他的章草朴厚纵逸、苍茫遒劲，颇似苦老题画的字，为大家所珍重。

王宁先生平生喜写梅、兰、竹、菊，尤以竹为最。正是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人文精神至深的情愫，对“竹之精神”的不懈追求。他植竹窗前，数度入蜀观竹，与竹为伴，体察竹之势，品味竹之操。他爱竹，知竹，画竹。将竹之品格，人之贤德，情之清逸，融为一体至“其身与竹化”的境界。以练达的笔墨，浓厚人文意味，成就了超脱、隽秀“无穷出清新”的绘画风格。

王宁先生的作品无论书法、篆刻，笔端、刀下都很有韵味，引人入胜。包含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对艺术的追求。他是孙娄店王氏当代最高品位的书画艺术家，为“孙娄王”争了光，也是临淄书画界的一朵奇葩。不幸的是，他于2008年10月9日病逝，终年65岁。2010年9月，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老槐作品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人文精神财富。

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将齐文化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让文化企业、创意社群集聚到这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在公众的嘉年华中传播“印象齐都”的理念。但是要注意，在“齐文化”开发上，要力求原创性，把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成为直观的可见可听、可闻可用、可消费的产品，努力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并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产业品牌。相信，“印象齐都”必将为淄博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必将带动淄博市文化产业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淄博市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淄博市建设经济文化强市的步伐。

到时，“印象齐都”必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 《管子·轻重篇》断代问题之管见

郭小文

《管子·轻重篇》的断代问题历来是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

1. 春秋成书说。韩非子、司马迁、刘向等认为是管仲所著，汉、隋、唐、宋诸代官修史书亦持此说，梁启超（《管子传》）、李居祥等人则依据《韩非子》《史记》的记载和刘向的《管子书录》等认定是管仲遗著，成书年代自然是春秋时期。但由于《轻重篇》中很多词语与先秦诸古籍相比没有相同的用字习惯，又由于有一些文字与史料记载不符，所以近代学者大都持否定意见。如：《轻重戊》篇“鲁梁之于齐也，千谷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尹《注》：“鲁、梁二国在泰山之南。”但是春秋时的梁国，是周平王少子康所封国，在夏阳，西近秦而远于齐，怎么会成为齐国的祸患呢？所以此处梁国绝不是春秋时之梁国。据马非百先生考证，“北界泰山之梁，至文帝十二年，用贾谊言始有之。”据此可知，《轻重戊》篇成书不会早于汉文帝时期。

2. 战国成书说。胡家聪先生认为《国蓄篇》作于战国，他提出了许多证据，如：“黄金、刀币，民之通货也”中“刀币”一词具有时代特征。田氏齐国通用的货币主要是刀币，考古发现有六种均为刀形，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实行法家政策，不仅统一度量衡，而且统一货币铸“半两”圆钱，全国行用，此时刀币已废。汉时刘邦铸荚钱，吕后时有八铢钱，文帝时有四铢钱，到汉武帝，整顿币制，下令销毁旧钱，把铜输送中央，另造新五铢钱，在全国行用。从秦到汉，都是圆钱，并非刀币。可见，《国蓄》作者乃田齐时人，而决非汉代。又如：“前有万乘之国而后有千乘之国，谓之牝国。前有千乘之国而后有万乘之国，谓之距国。壤正方，四面受敌，谓之衢国。以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西汉时代同姓王国没有“四面受敌”的，也没有“百乘衢处，谓之托食之君”的，文中听说自然是指战国分裂割据时代的情况。胡家聪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刀币”一词，他篇也多见，如：《轻重乙》有“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但据“刀币”一例，只能证明《国蓄篇》不得作于秦汉之后，尚不能证明作于田齐时代。“刀币”的使用下限是秦统一货币之前，而上限不可知。张龙海、杨英吉在《临淄近

年来刀币的发现》一文中指出“如果《管子·轻重篇》记载的‘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是准确的话，齐刀币的铸行应始于公元前683—643年之间，至秦灭齐为止约使用四百六十年左右。”可见“刀币”的使用尚需《轻重篇》来证明，而胡先生却拿来借以说明《轻重篇》的著作年代，其结论也就不可靠了。

3. 西汉成书说。此说法又不一致，有下列几种：

(1) 文、景时期说。王国维先生根据《国蓄》《揆度》《轻重乙》等篇中的“玉起于禺氏”一语，认为“禺氏”即“月氏”，以月氏为匈奴所败，在汉文帝四年，而其西居大夏，则武帝之初，因而断定“月氏东去敦煌、祁连间之后，西居大夏之前，其居必在且末、于阗间”（《观堂别集补遗·月氏末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从而考证《轻重》诸篇为汉文、景间所作。郭沫若先生在《管子集校》中说“余意乃文、景时同一学派之文汇，当别为文以论之。”可惜郭老生前未有详述，没有完成“别为文以论之”的宿愿。王国维先生所考一来证据太少，仅据一例来说明问题，其结论不能使人信服。二来“禺”是疑母喉部，“月”是觉部。两者声训属于旁对转，而把声训作为考证的依据，可信度不高。三来“禺氏”“月氏”虽是一名二写，但是毕竟写法不同，汉初从贾谊到张骞以来，文献皆称“月氏”，“月氏”乃汉初以来通名，月氏出玉既在文景期间，何以要称“禺氏之玉”而不使用当时通名称“月氏之玉”呢？产玉之地或早有之，何以到月氏迁此才有此说？

(2) 武、昭时期说。罗根泽《管子探源》中列举了十二条证据，判定《管子》一书成于汉武、昭年间。

(3) 新莽时期说。认定《轻重》诸篇成书于王莽时期的是马非百先生，在其所著《管子轻重篇新论》中举出了很多证据。仅用词方面，如：《轻重乙》“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通货”一词，《盐铁论·错币》作“通施”，证明盐铁会议时，还没有“通货”之名，此处用“通货”显与王莽改制有关。《汉书·食货志》：“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龟贝钱布之品，名目宝货……是为钱货六品……银货二品，……龟货五品……布货十品。”是其证。又如



《山至数》：“冯会龙夏牛马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月价”一词，于古无闻。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设立五均官令“诸司事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价，各自为其市平，毋拘他所。”才有所谓“四时中月上中下之价”，也就是所谓“月价”的出现，在此以前是没有的。

以上诸说均有道理，很难说谁的正确，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定论。目前还处于争论不下的阶段。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叶适《习学记言·读管子杂记》）实际上这是一种折中调和的说法。而《轻重篇》的断代问题，对于正确评定其理论价值，以及校勘训诂的科学性是十分重要的。是研究《轻重篇》必须解决而十分难解决的问题。

我通过阅读《轻重篇》，结合各家之说，认为《轻重篇》确实是“非一时之书”，但是，《轻重篇》的成书时间最晚不能晚于汉武帝时期。首先，我对马非百先生许多观点（包括成书于新莽时期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明人胡应麟《四部正讹》中提出的考核古书八法之一“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对考证《轻重篇》也是极为适用的。马非百先生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找出了能反映西汉时期的历史思想和用词习惯的许多例证，也找出了属于王莽时期的例证。但马非百先生在有些例证中认识方法是不当的。如“菁茅”一词。《轻重丁》：“江淮之间有一茅而三脊，贯至其本，名之曰菁茅。”马非百先生认为汉武帝前无“菁茅”之名，其以“菁茅”二字连用实始于王莽。《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六月，更授诸侯莽土于明堂”曰：“陈菁茅五色之土。”可见“菁茅”一词，乃是王莽所特创。但是“菁茅”一词古籍中多见，《尚书·禹贡》：“包匭菁茅。”《谷梁传·僖公四年》：“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贡不至，胡周室不祭。’”“菁茅”一词并非王莽时所特创，这恐怕是马先生一时失察所致。

又如，马非百先生注释《国蓄》“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也，食之则非补于饱也”时说其二语显系从景帝诏文及晁错疏文蜕化而来。”又说“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数语，则与贾谊谏除禁铸令文所谓“挟铜积以御轻重，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羨”云云有因袭之关系。”但是此处马先生明确犯了一个错误。即将本来需要证明的论点为已知前提，找出证据，而反过来又用这一证据去证明论点，循环论证，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可靠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景帝诏文，晁错的疏文及贾谊的谏除禁铸令文是从

《国蓄》中蜕化而来，他们都因袭了管子之说。

再如《揆度》：“管子曰：匹夫为鰥，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马非百认为这里所述与《汉书·高纪》所载：“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槨，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事”，内容完全相同。但不知内容完全相同，又能说明什么问题，或许马先生认为《揆度》是抄袭《汉书》，但是完全可以认为汉高祖时所用之法是因袭管子之法。

再如，马非百先生认为：“所谓‘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定名者，割壤而封’（《揆度篇》）云云，盖即王莽于镇压翟义时，下拜封车骑都尉孙贤等五十五人皆列侯及镇压赵明、西羌等时，‘置酒白虎殿，大封拜……以大小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汉书·翟先进传》）的反映。”但是此处马先生思路有点问题，就是先把《揆度篇》的成书硬性放入王莽时期，而找出此时期与之相对应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据。但是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之乱不也是“今天下起兵加我”的反映吗？刘濞既是诸侯王，又同时是一个富商大贾；他以长期发展工商业而致富，又以长期致富而蓄谋叛国。战乱平息之后，汉王朝痛定思痛。积极寻求改变旧制的道路，一是形成中央集权，一是积极发展经济。这段历史不也是与《揆度篇》所云相符合吗？

另外，还有两条证据不可忽视：一是汉武帝在公元140年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抬到很高的位置，《轻重》作者又何必鲜明地打着法家管仲的旗号做文章呢？二是司马迁《史记》写作始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在太始四年（前93年）已完成，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明确指出他曾读过《轻重》篇。司马迁读过《尚书》《国语》《国策》等书，对古代语言的时代特征认识是很清楚的，他认为是管仲所著，亦有其语言的根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说：“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必其无疑。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所以司马迁之言是可信的。那么《轻重篇》的成书年代绝对不会晚于汉武帝。

《管子·轻重篇》断代问题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就《管子·轻重篇》而言，也或许非一时之作，应该就每一篇做断代的考证。本文只是对其中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教。⑦



# 战国诸子思辩之风述略

吴宪贞

## 一、战国诸子辩之说略

战国政治格局的多元化为诸子们带来了自由思想的空间,而思想的自由又导致了学术文化的极度繁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黄金时代。从这一层面讲,战国乱世实质上应是战国思想、学术、文化得以滋生、繁衍的一方沃土。战国中期的思想、学术、文化论坛,论辩之风日炽,成为弥漫战国社会一时之风气。这种论辩之风蕴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战国诸子们对社会、人生和自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思索,表现出他们对自家学说舍我其谁的自信和坚守,因而这种辩风的极盛并非是战国诸子们一时心血来潮,它含有极为深厚丰富的理论蕴涵来作为支撑,应当说,论辩的风行正是各家各派将其理论学说公之于众、接受社会选择和评判的映射,并在这种论辩的环境中不断地修正、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家学说。其次,在各家各派的论辩中,所涉及的话题和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诸子们不再囿限于自我,不再仅局限于社会政治伦理,而是把思路 and 兴趣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宇宙自然和更为抽象的精神及语言世界。其深广程度又刺激了诸子们作出了探源性的追问思考,从而导致了战国诸子理论思维的丰富和深化。因而,战国诸子之文无不显现出更多的理论内涵和思辩色彩。

战国中后期,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意识领域的“百家争鸣”被诸子们演绎到无比辉煌的境地,学派林立,论辩盛极。《庄子·天下》篇品评当时诸子各派,以示“天下治方术者多矣”,并慨叹“道术将为天下裂”。《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它嚣、魏牟、陈仲、墨翟、宋钐、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和孟轲的学说为“饰邪说,文奸言,以泉乱天下”“欺惑愚众”,但亦承认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后《韩非子·五蠹》指斥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为“五蠹”。《汉书·艺文志》称“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这些历史评说向我们展示了战国中后期诸子争鸣论辩的鲜活面影,透露出战国论

辩之风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为适应战国争鸣的需要,战国诸子们也无不好辩:庄子主非辩、无辩,却多次与惠施进行论辩;孟子以儒家正统自居,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却与告子辩,与许行、陈相辩,极富有雄辩之气势;荀子则明确讲“君子必辩”(《荀子·非相》);墨家虽怕“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主“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却专以辩为技术传授门徒,更有《墨辩》传世;法家虽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可亡也”(《韩非子·亡征》),却言辩犀利,说理透辟;名家惠施更是以“善辩为名”,以“历物十事”“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而“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则提出“二十一论题”以“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庄子·天下》),体现出战国诸子辩者、察士的另类本色。由此审视,无论各家各派对辩采取何种态度,崇辩也好,非辩也罢,但实际上都参与了辩争,而且辩论的内容涉及到当时所有的重大问题,有“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古今之辩”“礼法之辩”“人性之辩”等等。除此之外,各家各派并非壁垒分明,囿于自家,为争本派正统之位,其自家内部亦相非相驳,如荀子之非子思、孟子、墨家三派相訾相斥,相谓别墨。各家各派相与辩争的热闹场面,构筑了战国中后期重辩的学术氛围,形成了一道以诸子论辩为特质的文化景观。

作为在这种氛围和景观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战国诸子之文无不沾染论辩的色彩,而这种不同的论辩色彩又无不体现着诸子各家各派独特的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体现出各家各派不同程度的理论思维水平、方式、方法及其思辩取向,他们在论辩中提出的独具特色的异说,又无不透显着各自独特的思辩风味。就其思辩所能达到的深广程度而言,应该说,在诸子之文中,《庄子》和《墨子》中的《墨辩》应是战国思辩之文的典型之作,以下结合战国学术文化氛围对各家作出考察和比较。

## 二、儒、墨思辩之特点

作为“世之显学”的两大学派之一的儒家,自孔



子起,就以继承发扬周代的礼乐文化为己任。孔子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而导致名实相怨的局面,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来修复这种混乱的次序,故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提出正名的目的在于兴礼乐,维护传统的政治伦理秩序,从而确立了儒家关于名辩的学说主张,当为名实之辩之肇端。但孔子主张用旧有的“名”去纠正变异的“实”,因为“名”象征着永恒不变的理想秩序,故其名辩主张带有浓厚的复古传统色彩。

至战国中后期,儒家出现了分化,“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二人分别继承孔子的“仁说”和“礼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家伦理型哲学。在对待名辩的问题上,他们恪守着孔子的名辩主张,遵循着传统的名辩思路。他们十分重视名辩,因为这样可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词,以承三圣者”(《滕文公下》),可以“名定而实辨”,“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荀子·正名》)。因而儒家关注、思考的对象是社会政治伦理领域,儒家更多的是强调教化的作用,更多的是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宏愿,以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为指归。因而其思辩的内容更多地是与政治伦理密切相关,带有浓重的社会伦理色彩,而对于社会伦理以外的自然和纯学术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呈现出一种用世的、带有传统理想化色彩的实用功利性,故其思辩体现着传统的因袭,表现为重历史、重事实、重人事人为的主导精神和循规蹈矩常态性的思维方式。

墨家则不同。墨家也主人世、用世之说,但却扬弃了儒家理想化的色彩,在注重现世的实用功利的思路上比儒家走的更远,具有“工具精神和科学精神”。他们“属于十分坚定的现世实用主义,他们有一种极为实用的思路,为了‘富裕、繁庶、安定’,为了消除三大忧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一切围绕着社会的现实问题展开思索……把思考的基础放在现实的合理性上”。本着“以对社会的有用与无用、有利与无利为唯一标准”的实用原则,墨家表现出与庄、孟、荀不同的论辩态度。与庄子一派的“非辩”“无辩”、儒

家的“重辩”不同,墨家不仅重辩,而且好辩、善辩。墨子本人即是一位有“辩者性格”的思想家,先秦典籍多有记述。《墨子·耕柱》篇墨子云:“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庄子·骈拇》云:“骈于辩者,累瓦(丸)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成玄英《疏》云:“墨者,姓墨,名翟……禀性多辩,咸能致高谈危险之辞,鼓动物性,固执是非。”《孟子·滕文公下》亦称:“距杨、墨,放淫辞。”由此可见,墨子的确是一辞锋锐利的辩者。他本人首创“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上》),既以此来衡量言词,又以此来作为论辩的表达方式,初步形成墨翟的辩学思想。其文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皆以论辩方式说理,而《墨辩》六篇更是显示了论辩的技巧和辩说方法。诚如刘大杰先生所说:“论辩的散文是由墨子开始的。在我国古代学术界中,墨学最讲究方法,开名学之先导。故其学说之立论,都是采取首尾一贯的论理形式。因此,他的文章成为富有条理的论文。”从此可以看出,重辩乃是墨家创始以来形成的一大学术传统。

到战国中后期,墨家亦同儒家一样,学派出现了分化,《韩非子·显学》称“墨离为三”。《庄子·天下》篇也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此则表明墨家如同其他各派一样,学术出现了不同流向,并且内部也存在着正统之争。墨家学派后期发展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是沿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注重科学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逻辑思想,形成了墨辩学派;另一种倾向则是向非理性和宗教化转向,注重学派“钜子”传承的宗教教派化形式,发展了墨子思想中尊天明鬼与神秘主义学说,后演变成秦汉时的游侠。这种不同的学术取向昭示了墨家走向不同学术道路的必然。于是墨辩学派一系恪守墨家实用功利的基本原则,以“辩”为切入点,在对先秦儒、道、名等诸家辩说的批判基础上,将广大的社会经验知识和自然知识作为自己思辩的背景,沿着较为系统的、严密的逻辑之路走向形上的思辩领域。其理论成果即是《墨子》中的《墨辩》六篇。

所谓《墨辩》,是指《墨子》五十三篇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始称《墨辩》起于晋人鲁胜。清代学者汪中《述学·墨子



序》和孙诒让《墨子间诂》以六篇性质相同,故又称《墨经》。《墨辩》六篇以丰富的内容、系统的严整,成为“先秦逻辑思想的集大成,树立了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光辉典范”因而可以说《墨经》代表战国时代逻辑思辩的最高水平。

综上所述,《墨辩》之思辩实质上是实用理性基础上的、以严密逻辑为特征的思辩,因此可以说,《墨辩》即为逻辑思辩文。

### 三、《庄子》思辩与《墨经》思辩之比较

《庄子》之思辩,从其深层内蕴处讲,是以特定的思辩对象为指归,在其直觉顿悟思维和相对辩证的基础之上的,既具有超越世俗功利,又别于纯逻辑、纯理论的超理性思辩,它正是以这种特异的思辩把人们的思维论辩导向形上的方向;另一方面,从文字层面上讲,由于当时的思辩环境使然,《庄子》又自觉不自觉地用形象化的思辩语言将抽象的哲思掩盖在形象的背后,造成了形象与理念的间距离感,呈现出一定的诗化特征,形成了《庄子》思辩形象化的表述。这就是《庄子》独特的思辩风貌。

基于此,现将《庄子》思辩和《墨经》思辩比较考察如下:

#### 1. 从其思辩的对象看

《庄子》立足于虚玄抽象的“自然之大道”,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进行超验的体悟,追求个体生命达道后的一种逍遥无待、极度自由的精神境界,因而就其思辩对象而言,带有极大的抽象性和超越性,具有一种形上的思辩品格;而《墨经》则以实用理性的眼光看待把握现实,针对现实辩风之弊,以“辩”入手,以探求现实中的事物的实用功利为其思辩对象,《小取》对“辩”之作用的明确概括,及文中那些蕴含了生活经验和科学知识颗粒的概念和判断,即反映了《墨经》思辩的终极目的。因而就其思辩对象而言,它总是客观的、具体的。

#### 2. 从其思辩方式上看

《庄子》主要是采用超逻辑或说是反逻辑的思辩方式,具体表现为直觉和相对方式。一方面,《庄子》以直觉的方式来体悟道的本源性,强调思维非常规的跳跃和非逻辑的了悟,跨越了现实生活经验的论述和支撑,其过程表现为“丧我”——“去智”——“心斋”——“坐忘”——“神遇”——“得道”。其“心斋”“坐忘”的过程即产生在突发之际的意会;另一方面它又以“道通为一”高度向外推演,形成了它

评判万物的、带有某种辩证因素的相对理论,它从异于世俗约定俗成的视角看待现象世界,于是有“齐物我,一生死”之奇论,以此来消解战国辩风中的独断之论。从其运用的思辩方式上讲,它是一种超常规的思辩。而《墨经》则主要采用具有逻辑色彩的思辩方式,它通过对现象世界的总结和归纳,运用符合人们惯常思维的逻辑手段,即概念、判断、推理来循规蹈矩地辩说事理,它强调思辩的有根有据、连贯严密,具有某种科学化的色彩。但与《庄子》相较,它仍属于一种传统的、常规的思辩。

#### 3. 从其思辩语言看

《庄子》所运用大多为“谬悠之言,无端崖之辞”,采用一种“不可与庄语”的说理语言,主要表现为“三言”的表述和诗化语言的运用。《庄子》一书大量运用生动风趣的寓言并杂以重言和卮言来说理,使之哲学理念形象化、具象化,并且具有了某种诗意,故而极富文学色彩和意味。而《墨经》则一反《庄子》文辞华美之风,质木无文,用语极为概括、简略、明确,表述更重逻辑性,文学色彩减弱,极近后世专题论文。

综上所述,就思辩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这一层面而言,《庄子》和《墨经》之文确实体现了当时思辩的最高水平,成为战国思辩文章的典型之作,但就其所体现出来的思辩之风,确乎又存在着实质的不同,《庄子》和《墨经》昭示了战国思辩发展的两个趋势和方向,即因循自然、关注个体、超脱功利和关注社会、尚功重用。而《庄子》所体现出来的思辩之风在战国中后期的思辩之风中当为“别是一家”。

### 四、结语

综观战国诸子之文,以《墨经》为代表的思辩之风更具传统思辩的意味,所谓传统思辩意味,是说其体现出来的思辩无论从其目的还是方式上都体现了先秦传统学术文化的浓重厚积。就儒、墨、名、法诸家而言,他们学说主张各异,但若从思辩的视角加以审视,他们仍体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孟子之主张“仁政、王道”,荀子之“隆礼重法”,墨家之明是非、决嫌疑,韩非之主张严法治国,公孙龙则主张“以名实化天下”,其思辩的目的最终在于人世,为世所用。沿循着这一共同的实用目的,其思辩的内容也大都与社会、政治、伦理密切相关。正如梁启超所云:“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




# “牺”音一考

## 正一

偶听国学教授讲，“牺”作器皿、酒樽表义时，读“娑”（suō）音，耳目一新之余，又颇费思量。因多闻“国宝牺（xī音）尊”，自忖“牺”为多音字，虽多番查阅字典、词典，均不见“牺”有“suō”音，故心存小惑，铭之愈深。后颇多留意，并借诸古籍，多方求证，以解小惑。

“牺尊”始见《周礼》“六尊”。东汉郑玄注曰：“牺，《周礼》作献（音suō）”。《诗经·鲁颂·閟宫·传疏》亦作注释，《周礼》“六尊”之中，最华美者即牺尊。心思“华美”一词，乃形容酒具纹饰，概读音可由此可考，遂定向证之。功夫不负，翻至西汉《毛传》，豁然见注：“牺，有沙饰也”，即印证纹饰一说。再翻唐代孔颖达所著《礼记正义》，注曰“则毛、郑献沙二字，读与娑之娑，皆谓刻凤凰之象于尊，其形娑娑然。”可见，古人既作美器，取吉祥之物饰之，概因凤凰展翅，娑娑而舞，即以此作读。又见清代段玉

裁《六书音均表》注曰：“沙、娑、羲三字同在十七部。牺牲、牺尊盖本只假羲为之，汉人乃加牛旁”，方更为佐证。同时，古篆字“牺”作，右为“羲”字，如段玉裁所说，“羲”“娑”同声，可见“牺”字古读“suō”音有据可考。后人多按形声而读，历史延续读作“xī”音，亦是汉字发展规律，不足为怪。


一字考之，一笑了之。 



错金银镶嵌铜牺尊

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整饬，并对其近距离的直接评说和参与，因而也就带有更多的实用意味，与之相表里，其思辩也大都遵循着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经验性的事实，在实证的基础上作逻辑推理”，其行文说辞中贯穿着较为严密的逻辑，如《孟子》中孟子与陈相并耕之辩、与告子人性之辩、与齐宣王王道之论皆是步步紧逼，层层追问，实是类比推理之功效；《墨子》亦有墨子与公输盘攻宋之辩，有入其园窃其桃李之论，亦作类比推理，于其尽头见其谬误；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辩充满了论辩逻辑技巧；《荀子》有正名的逻辑；《韩非子》有“参验论”（即比较、实验和归纳证明）和“推论术”；而《墨辩》更是总结各家之经验，成为逻辑思辩方式的典型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墨、名、法诸家之思辩实应归于传统一派思辩。

与《墨经》所代表的思辩之风相比，《庄子》思辩之风“别为一家”。从思辩目的上讲，《庄子》所追求的是个体生命的自由境界，倡扬个体自由的珍贵，其兴趣在于追寻并突显个体的存在意义和

价值，因而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社会政治伦理之一隅，而是从自然宇宙广阔的视角思辩万类万物的生成、发展和存在，并着眼于时空的无限性上来看待万物存在的相对性，揭示出其辩证的依存和转化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古代辩证法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些都反映了《庄子》思辩领域的扩大和思辩层次的深化，使之在战国思辩之风中别具异趣。当然，《庄子》文中多有“愤激之词”，亦有“至德之世”的设想，但其主观意图不在于用世，而是以现实世界的“昏上乱相”（《山木》）之态衬映大道之境的安和恬淡，楚王之聘、神龟之说即为其隐世、避世超脱心态之明证；而其思辩方式则重直觉体悟，重相对破独断，不注重经验基础之上的实证，其思辩结论都是在对客观现象的观照体悟而来，大都缺乏逻辑性的分析和推理。当然，《庄子》文中也有逻辑推论，但纯粹是在抽象中进行，并带有很大的情感主观性和跳跃性，正如前人所评“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这些都显示出《庄子》思辩之风超卓迥异的风貌，从这一层面上，《庄子》思辩之风当“别是一家”。 



# 从齐国博士官到秦汉博士制度

王景甫

“博士”一词首现于《战国策·赵策》：“郑同北见赵王。赵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这里的博士似是一种对博学士人的称谓，尚不是官名。博士作为官名，最早出现于齐国。许慎《五经异义》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的记载。齐国博士官的设置是与齐稷下学官的兴盛有密切关系的。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齐国稷下学士在稷下学官兼收并蓄、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在辩论争鸣中相互吸收渗透，日渐成为通博之士。这些通博之士以那种无所禁忌的“不治而议论”方式参政议政，逐渐转化为常设官员。齐国的统治者为了达到借用“稷下先生”的集体智慧富国强兵的目的，创立了博士制度。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就在齐国博士制度的基础上专门设了博士官。《秦集史》中说：“大抵齐之稷下先生，即为秦代博士制度之来源……其员额为七十人，其制盖亦袭稷下先生之七十人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续汉志》载：“博士，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秦朝的博士制度承沿战国传统，其职掌主要是参加国家大政的商讨会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记载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博士官参与了起帝号的御前会议。可见，秦始皇将齐国稷下学官这一半官方的组织上升为秦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把博士官作为了随时备自己顾问的智囊。

秦始皇时的博士表面上隶属于奉常，但是奉常对博士的统辖并不太严格，博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博士即是奉常属官，又和属官同仕列于朝，所负职掌直接向皇帝负责。可见，秦始皇时的博士制度仍保持着原先稷下学官的组织结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秦始皇初期博士在秦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史记·礼记》说：“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看来秦始皇是把齐国稷下学官的博士制度看作了一种好制度，把齐国稷下学官那一大批精通礼仪的博士当作了有用的人才。因为秦始皇不仅把源于齐国的博士制度几乎原封不动地

照搬了过来，还大批收取稷下学士为己所用。这从秦议礼时多用博士可以得到印证。秦朝博士官的议政职责与稷下学士“不治而议论”的职务正相符合。稷下先生们除议政外，常从事的教授、制礼等活动，也与秦朝博士官的职掌有相承关系。就连“博士七十人”的员额也与齐国稷下学士的人数大体相近。另外，秦朝初年的博士多为齐国人，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两者间的承传关系。可以这么说，博士原为战国时齐国的一种官职，是由稷下学士担任的。在秦灭齐的时候，秦始皇将这一制度为己所用，体现了他以武力统一中国后对文官政治的重视，反映了秦始皇新统治政策中的“文治理国”构想。虽然史书中并没有发现秦博士独立承担主管职位的史料根据，秦博士在朝官中也仅属于“秩比六百石”的低级官吏，但是秦博士却享有“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的十分尊宠的政治地位。《晋书·百官表》注云：“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

然而，齐国稷下学士出身的博士官，骨子里是以“言其治乱”为本职的，是以能当面指出君主的过失为荣耀的。《说苑·至公》记载，临淄人浮丘伯与秦始皇廷辩之事：秦始皇召群臣提问，自己以禅让传位和以世继传位哪一种方式更好。浮丘伯站出来：以天下为公，则用禅让方式；以天下为自家，则用世继的方式，但是陛下你是不可能做到禅让的。并且逻辑严密，激昂慷慨地历数了秦始皇的种种暴行。秦始皇不是齐宣王，在廷堂之上被如此顶撞，是独裁专制的秦始皇所不能容忍的。虽然当时秦始皇自寻台阶暂时忍下了这口怨气，这些博士官最终落个“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过秦论》）的结局是难以避免了。所以才有了由是否实行分封制的争论发展到了攻击博士儒生的“焚书坑儒”悲剧。“焚书坑儒”宣告了秦朝博士制度的失败，标志着以秦文化为背景的独裁专制制度与具有原始民主传统的齐文化精神相结合的失败。可以说，这一失败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历史实践证明，秦朝虽然实现了统一局面，却没有成功地构建新的与政治大一统局面相适应的文化大一统，成了秦王朝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王朝的统治风格与秦朝截然不同。特别是



为了显示接受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又重新建立和发展了博士制度。在汉初政治、学术气氛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博士制度几乎恢复到了昔日齐国稷下学官时“不治而议论”的学术氛围。汉初博士制度的博士里诸子百家俱全,不仅有儒家、黄老学家,还有五行家、杂家、刑名家等。著名的大臣贾谊因“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贾谊的言谈,多引用道家、法家的言论。晁错的上书多引用刑名家的言论。像贾谊、晁错这样身为博士的重臣,能学兼众家,足以说明汉初博士制度在学术上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汉书·贾谊传》载:“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史记·儒林列传》中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受命的争论,最后甚至涉及到“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辕固生说窦太后好《老子》书为妇人之见,惹得窦太后哭闹到景帝那儿,景帝也没有治辕固生的罪。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汉初博士们能在最高统治者面前,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没有论资排辈的等级森严和学术上的门户成见,表现出公平竞争和畅所欲言的民主精神。再者,汉初博士多为齐人。《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的汉初8位传经大师中有4位是齐国人:传《易》的田何、传《诗》的辕固生、传《公羊春秋》的胡毋生、传《尚书》的伏生都是齐国大儒,而赵人董仲舒也是齐人公羊寿的弟子。而且汉代时将“博士”与“稷下”互称:刘邦称博士叔孙通为“稷嗣君”,意为“继踪齐稷

下之风流也”;郑玄《书赞》也说“我先师棘下生孔安国”,“棘下”即“稷下”,孔安国为西汉博士,故郑玄称其为“棘下生”。由此可见,汉初博士制度的开明性,与齐国稷下学官博士议政中开放、宽容的民主风气是一脉相承的。

汉武帝于元光五年(前130年)设置《五经》博士。使原来的博士制度改变了百家并存的局面,学术进入了经学时代。博士们在议政时所发表的意见,被严格限定在经学的范围内,议政成为对经书的阐发和对统治者既定政策的诠释,经学成为士人猎取高官的达身之阶,经学原则成为博士官们最基本的行为准则。然而汉武帝所尊的儒术与齐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汉武帝创设《五经》博士制度,却始终没有让儒学理论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的整个统治方略中表现出“外儒内法”的特征。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只是为了使全国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用思想的统一和政治的统一相匹配,以利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发展。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是霸道王道杂用的。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实际上他是把儒术看作了一种学术装饰品:表面上说尊崇儒家,但是在实际决策中却又杂用霸道的一些东西。霸道所指的具体内容是指法家的治国之术,王霸之辩在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士的百家争鸣中就早已经出现。也就是说,齐国稷下博士的影响在独尊儒术体系下并没有从政治舞台完全退出,而是依然在发挥着很大的实际作用。同时,汉武帝时期,儒学完成了对齐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黄老学说及方仙道学说的吸收和融合。可以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齐文化正是构筑汉代新的文化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基石。据《西汉会要》载,有博士参与的会议有废立、议宗庙、议郊礼、议典礼、议封建、议功赏、议民政、议法制、议罪罚、议大臣等项。博士参与这些重大的朝政决策,充分反映了统治阶层对博士的注重和博士政治地位的重要。但是,汉武帝时期,博士官员虽然参与了这些事务,但其作用影响主要限于学术文化领域。直至元帝即位,才一改以往“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实行了纯儒术的统治,博士制度的作用影响日见重要。博士弟子人数大增,为汉朝培养了大量儒生化的官员,其时博士官的升迁已日见显赫,当时著名的三公如韦玄成、薛广德、贡禹、匡衡、师丹、平当、孔光、彭宣、翟方进、张禹等皆为博士出身。以经学见长的博士官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至此,源于齐国稷下学官的博士制度,最终融入了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封建官制之中。⑦

## 赞第十届中国齐文化旅游节

陈晓伟

齐国故都多盛事,展颜笑迎八方宾。  
齐风韶韵绕不绝,精彩赛事聚人心。  
节俭实效办节会,贴近民众出精品。  
崇尚艺术不奢华,服务人民是导引。

## 齐刀币

周丽华

齐刀独特类型多,彰显齐国经济强。  
铸体最大币文美,引得历代把币藏。  
六字刀作纪念币,传世稀少不寻常。  
六合成规三字刀,流通范围它最广。



# 学学范蠡的

# 经营理念

◎ 裴培科

每年毕业季,难免会有一些大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如果想自己创业的话,何不让我们来看看范蠡是怎么做的。2500年前,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之后急流勇退,弃官务农,经商致富,并用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救济贫困,奉献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人典范之一。

范蠡是一位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多面手。他能农耕,能经商,能养鱼,还能饲养牲畜。尤其可贵的是,他愿意帮助别人共同致富。司马迁赞颂范蠡生财有道,富贵又仁,是“富好行其德者也”。《史记·越世家》记载,范蠡初到齐国,“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范蠡父子凭借智慧和双手,艰苦努力,辛勤劳作,从事农耕,经营商业,养鱼畜牧。《齐民要术》有他成功养鱼的经验记录。范蠡还给鲁国贫士猗顿传授致富之术,“欲速富,畜五粽”“畜五粽,子息万计”,使猗顿很快从饲养牛、马、猪、羊、驴五畜中发达起来。

作为一代商圣,范蠡有着丰富的经商理念。首先,他搞经济不盲目出击,择善而行。精心选择地方,发挥自然优势,追求最佳经济效益。他利用“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的有利条件,带领全家,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多种经营,致产数十万。他隐退创业,发家致富,给后世深刻启迪。其次,把握商机,候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欠循环论经商,提出“待乏论”思想,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早则资舟,水则资车”。准备别人



没有或想不到的货物,占据市场优势。他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再次,为富要仁,厚德立商。“富好行其德”是他最宝贵的经商思想。《史记》记载,他经商19年中,三致千金,两次把钱分

给贫困人家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称赞。范蠡富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没有官商勾结,没有权钱交易,没有假冒伪劣,没有欺行霸市。他慷慨回报社会,使当今那些为富不仁者无颜面对古代前贤。

无论是经商致富,还是从政治国,范蠡都是一个优秀的成功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他既有古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又有道家顺应自然的豁达人生观。儒道互补,外道内儒,顺应自然,始终保持平和淡定的心态。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天道、地道、人道和谐尤为可贵。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意思是,治理国家要注意三件事,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处理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范蠡把这三点与天地人相结合。他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地,节事者与人。”他还对勾践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范蠡这些宝贵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总结范蠡的成功之路,可以得出,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到:

**一、肯干、努力。**少说多做,一旦有了理想,就要为了理想脚踏实地的去努力,不要今日复明日,那样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在空谈与空想中虚度了时光。不论有多少好的想法,都会付之东流。

**二、多动脑子,因时而动。**不要头脑发热,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范蠡的“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早则资舟,水则资车”是十分有道理的,体现了前瞻性,如果看问题没有前瞻性,别说是做生意要赔本,干别的也会干不成的。这其实就是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礼记·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豫,亦作“预”)。这个规则通用于一切领域,只要理解了这一精髓,一切都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要有宽大的胸怀。**无论做什么,要以给社会、给他人带来方便、帮助他人作为前提,他说的“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有了这样的心态是可以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的。 ㊟

## 由打造“印象齐都”想到的

李哲文

去年3月,融融春光暖暖地照在淄博市高新区的花山生态恢复区内,印象齐都文化产业园建设在这里全面启动。在此期间,举办了“印象齐都·齐文化体验之旅”文化系列活动,其中包括:齐文化开发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论坛,印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奠基仪式,印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推介及战略签约仪式,中国出版产业高层论坛,“齐风大赏”特色文化演出,外国使节团齐文化体验之旅等。

印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由志鸿教育集团投资建设,位于淄博市宝山文化教育产业园区,总投资21.2亿元,规划占地面积830亩,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以齐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为内核,以创意为龙头,以现代化科技手段为支撑,打造集文化产品研发、创意设计、文化体验、数字版权和休闲娱乐、印刷复制、旅游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园区为两园两心,即艺术创意产业园、出版传媒创业园、园区展示中心和园区服务配套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47.66万平方米,主要由文化产品孵化、产品研发与生产、文化展示体验以及文化产业服务四大功能片区组成,同时配套建设其它公共服务设施。

印象齐都定位为“一座承载齐文化传承使命的文化新城”,也是集齐文化展示、体验及产品研发生产于一体的文化产业聚集区。项目以现代技术手段再现齐文化,主要通过以数字出版等新科技传播齐都文化、以及通过新媒体技术表现印象齐都。目的在于让世界深入了解发展中的淄博,充分展示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让世界了解齐文化,共商文化产业的发展之道,共商齐文化的开发之路,让印象齐都文化创意产业园走入人们的视线,扩大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齐文化真正成为淄博的城市名片。

淄博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世界足球起源地,历史上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都城长达800余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历史使命。

由志鸿教育集团规划实施的印象齐都文化创

意产业园项目,对深入挖掘齐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和现代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想到2016年,将有这么一个高科技综合服务性园区矗立在淄博,心情还是很激动的。我也是一个文化人,是土生土长在齐国大地上的热血男儿,对先人在这里创造的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主张以智取胜的先进文化——齐文化,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齐文化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文化瑰宝。两周时期的齐国,与古希腊大致处于同一阶段,她们各具特色,交相辉映,可称得上是古代世界东西方两颗璀璨的明珠。而800年齐国故都临淄,作为齐文化发祥地和中心,更是久负盛名。周至汉时期,临淄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为中国最重要的冶金、纺织、制车、制陶、漆器制作、铸镜、手工业科技中心和海盐、丝绸贸易最大集散地,有“东方古罗马”的美誉。

多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开发。高端规划、开工建设了齐文化生态园,连续举办了十届齐文化国际旅游节,开展“齐国故都与齐王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田齐王陵遗址、临淄齐国故城遗址、稷下学宫遗址、齐长城以及齐国故城48处重点遗址、临淄墓群150余座古墓和市级以上27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重点保护。不断加强对齐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齐文化研究专著33套(部),完成国家和省社科规划项目19项,理论专著作品85件,论文500余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术科研组织。初步确立了以齐文化为核心的15大类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五音戏等10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村铜响乐器制作技艺等30个项目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后,要进一步加强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开发,整合文化资源,切实推进齐文化市场化、产业化、品牌化建设,确立实施项目带动、突出品牌建设的发展思路。实施项目带动,把聊斋文化、陶琉文化、鲁商文化、地方民俗文化等统一在齐文化的大旗下,通过积极发展齐文化旅游业、足球产业、影视业、工艺美术业、休闲娱乐业、图书出版业等齐(下转第22页)



# 中国足球的历史发展

## ——兼谈齐都临淄在足球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

赵明奇 刘秉果 曹大伟

足球是竞技体育中最受人们欢迎、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有“世界第一运动”之称,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是青少年锻炼身体的竞技游戏,也是广大人民最欢喜的休闲娱乐。高水平的足球比赛能吸引数万的现场观众和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激烈的对抗,快速变化的比赛节奏,团结合作的默契,意想不到的结局,都能给人带来无限的欢乐。

现代足球成型于英国,但是,它的文化渊源历史悠久,有不少的国家都认为自己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经过国际足球历史学家鉴定,中国有足够的史籍和文物证据可以说明足球是起源于中国。因此,2004年2月4日,国际足球联合会副秘书长项伯涅先生在国际足联百年庆典的伦敦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体育文化的发展也源远流长。中国古代足球是体育项目中起源最早、历时最久、开展最为普遍的一个项目。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程是丰富多彩,曲折回环,封建社会的各个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足球在其中的发展表现最为明显。

蹴鞠便是踢球,是中国古代足球名词。《辞海》:“蹴鞠亦作‘蹶鞠’‘蹋鞠’‘鞞鞠’‘蹴鞠’‘蹴鞠’。中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P2151)蹴鞠一词首先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其后在《汉书》中多次出现。而比《史记》更早的著作《战国策·齐策》中记齐国首都临淄人民的娱乐生活,“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六博、蹋鞠者。”这段话被引用在《史记·苏秦列传》中,《史记索隐》注释说:“刘向《别录》曰蹴鞠者。……蹴亦蹋也。”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又出现了蹴鞠一词,“(项)处后蹴鞠,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史记集解》的注释是:“徐广曰,一作蹋。”这说明了在汉代以前是用蹋鞠一词,蹴鞠一词是在汉代出现的,汉代初年是两词并用,以后才确定蹴鞠是基本词汇,虽又出现许多不同名词,蹴鞠一词一直被使用。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唐代以后的球制作方法有了改进,名称便随之有变化。《辞海》蹴鞠条所说:“亦作蹶鞠、鞞鞠、蹴鞠、蹴鞠……”这些均是异字而非异名,蹴球、筑球、踢球、踢圆、蹴圆、踢行头、圆情、蹶鞠、踏鞠、踢鞠才是异名,除了个别词语可能是文人所造,大多数词语都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时代流行而形成的,后来才出现在史籍文献中。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蹴鞠历史悠久,流传广泛,随着时代文化风俗的变迁而产生了众多的不同名词。

从文献记载来看,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了蹴鞠,齐国首都临淄城的人民已把蹴鞠和吹竽、弹琴、六博当作是消闲娱乐,较为广泛的开展了,其起源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临淄是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蹴鞠的广泛开展就全国范围而言,有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和中心地位。根据考古学通则,类似于一个城市的建城史,必须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为据,才能断定其真实年代。根据这些规则和规律,我们可以说,《战国策·齐策》所载齐都临淄人民的足球运动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足球史文献资料,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最有力的证据。西汉学者刘向在其所著《别录》中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其子刘歆在《七略》一书中也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都是把蹴鞠起源时间定在四千六百年前的黄帝时代,因为黄帝时代尚无文字记录,所以刘向父子都说是“传言”,是口口相传的说法,没有文献依据,但汉代以后的文人大都认为蹴鞠起源于黄帝时代是可信的,唐人蔡孚在《打球篇序》中说:“打球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宋人黄朝英在《靖康缙素杂记》中说:“此戏生于黄帝,蹴鞠意在军戎也。”明人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说:“蹋鞠始于轩后(即轩辕黄帝),军中练武之剧。”清人顾沂在《过同年颜淡园寓观蹴鞠》诗中说:“吾闻黄帝开球场,貔貅习练都跳梁。”都是认为黄帝创造蹴鞠以训练兵士的说法是可信的。

中华五千年文明肇始于黄帝时代,因为在这个



时期社会生产发展了,房屋,衣冠,车船,都已建设较为完备:制度,礼仪,伦理,社会文明已初具规模;蚕丝,指南针等科学文化有所发展创造,在这种社会文明的氛围中,体育文化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氏族部落统一的战争中,蚩尤部落为提高战斗力,创造了以游戏方式训练兵士“以角抵人,人莫能御。”(《述异记》)的角抵戏;在战争胜利和丰收的庆祝会上,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舜典》)的乐舞娱乐;在温饱之余还有消闲的游戏活动,“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论衡》)的击壤游戏。在这样文明程度和文化氛围中创造蹴鞠,“练武士知有材”的军事游戏,完全是可能的,可信的。

在两千年前考古学尚未兴起而文献记载又不足的情况下,对于史前文化,刘向父子只能写作“传言”,后代学者也只能根据文化发展作合理的推断,近百年来考古工作有了极大的发展,出土文物不断发现,对于史前文化有了较可靠的根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一部是战国早期人著作的《十六经》,其《正乱》篇中记述了黄帝与蚩尤部族战争的结果,“……黄帝身遇蚩尤,因而擒之,剥其革以为干候,使人射之,多中者赏之。剪其发而建之天,名曰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这段文字说明了早在战国初期便有了蹴鞠是起源于黄帝时代的说法,只是起源的原因并非是为了练兵而创造的游戏,而是在胜利之后的复仇欢庆中,剥下敌人的皮制成箭靶,剪下敌人的毛发做成旗头,割下敌人的胃当球踢。这种惩罚性的复仇措施在世界各个民族中的都曾有过,在战胜敌人之后,举行各种惩罚敌人的欢庆游戏。如果《十六经·正乱》记述的是史实,则可以说明,世界各民族原始的文化发展轨迹是近似的。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村落遗址,其使用的石器中有不少是石球,“石球是石器里面比较突出的一种,不但数量多,而且磨制得光滑而又规则,直径自1.5厘米至6厘米。”(《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的发现——西安半坡》)打磨得光滑而又规则的石球不可能是打猎用的抛石,作为装饰品的石器则又太大,唯一可能的便是作为游戏的器具。在半坡的墓葬中有一个女孩的墓(152号墓),在墓葬中她的脚下放着一个尖底瓶和陶钵、陶罐,在陶钵下有三个石球(见图一)。石球的位置能够表明是作为足踢的游戏器具。西安半坡石球的出土很能为黄帝时代就

有蹴鞠游戏作为证据,因为黄河中游正是黄帝部落生活的地区,新石器时代距今五千年,与黄帝时期年代也基本吻合。

黄帝时代所使用的球是石质的而不是皮革制成的,《十六经·正乱》中说:“充其胃以为蹴”,可能是启发用皮革制鞠的开始。从民族民俗学角度来研究,踢石球是最古老的蹴鞠游戏,这种游戏一直在民间潜流着,直到明清时代。明人刘侗在他所著的《帝京景物略》中记述北方地区的体育活动。“十一月,小儿及贱闲人以二石球置前,先一人踢令远,一人随踢其一,再踢而及之,中之者胜。一踢即着焉,即过焉,与再踢不及者,同为负也。再踢而过焉,则让先一人随踢之。”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述了踢石球游戏。“十月以后,寒贱之子,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亦蹴鞠之类也。踢球一事,自金元以来即有之,不自今日始矣。”明清时代踢石球已有简单的方法和规则,并说有很久远的历史,是蹴鞠之类的活动,是民族传统文化,与半坡出土的石球相印证,可以认为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踢石球游戏,就创造了蹴鞠,只是那时的球不是皮制的。

黄帝时代创造蹴鞠到了战国时代才见之于文字记载,夏、商、西周二千多年时间为何是一片空白?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书写文字的开始,在牛骨龟甲上刻下的卜辞文字尚未规范,需要研究对照才能辨认,在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就是正在研究辨认之中。其卜辞的全文是:“庚寅、卜、贞。呼舞,从雨。”(陈锡康《龟甲文字概论》)这个舞是什么舞呢?甲骨文学者认为是韦字,通围,即圆圈舞。体育史学家唐豪先生认为这个字可能即鞠字,舞即鞠舞。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是象形,字就是两只光脚踢一只圆球形。而舞便是边踢球边挥动长袖而舞。汉代的画像石刻《宴乐百戏图》中就有蹴鞠舞表演,在音乐伴奏下上身舞动,双足蹴鞠。从事物的发展来说,由练兵的蹴鞠游戏演化为祭神求雨的鞠舞,鞠舞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便成为宴乐表演的蹴鞠舞,而另一方面的发展便是蹴鞠运动。这方面重要的论据便是字的真正意义,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备此一说,供作参考。

中国蹴鞠起源于黄帝时代的传说是可信的,但并非是可靠的,因为远隔五千年时间,文字记载的只是传闻,尚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新发现作为证据,才可以确定下来。我们探讨蹴鞠的起源于黄帝时代,旨在说明中华民族的文化悠久,也可以说明中华民族是具有发展足球的智慧和能力的。作为一种文化现



象,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原始阶段都创造了一些体育游戏,有的发展了成为一项体育运动,有的却消灭了寂然无闻,中国蹴鞠起源甚早,经过发展,在二千年前就初具体育运动项目的规模,但在盛行一千多年后却突然消失,这种骤然兴衰的现象,确实使人迷惑,我们应该对蹴鞠的起源、发展、消失现象进行研究,从中找出足以借鉴的经验,为现代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体育社会学家认为:“体育是社会的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中可以窥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以及民风习俗的面貌。”换一个角度说,体育发展的兴衰以及活动方式的变化都和这个国家(朝代)的整体文化有关。中国蹴鞠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几十个封建王朝,几千里不同地域,和几十个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自然是有很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蹴鞠在流传中有不小的发展演变,而且在蹴鞠功能,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研究蹴鞠的发展演变,可以从中看到历史社会文化对蹴鞠的影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文化面貌。

蹴鞠起源时间是定在黄帝时代,但是当时蹴鞠游戏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已不可知,又是什么力量促动产生了蹴鞠呢?刘向在《别录》中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习之。”这是说黄帝时代创造蹴鞠是从练兵的需要出发。

殷商时代是否有鞠舞尚需进一步证实,但汉代确有类似于舞的蹴鞠,汉画像石刻中便有多幅蹴鞠表演图像。无论殷商祭祀雨神的鞠舞是否曾经有过,汉代的宴乐蹴鞠表演都是祭祀舞的遗存,把蹴鞠技巧与舞蹈美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观赏表演,而唐宋以后的白打蹴鞠则又是在蹴鞠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娱活动。

战国是一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奴隶解放,平民地位上升,生产发展,人民的消费娱乐成为被重视的问题。齐宣王在回答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要关心民众的娱乐。《战国策·齐策》上记载从事蹴鞠活动的是“其民”,是“待发”的后备兵。《西京杂记》中说平民出身的汉高祖刘邦,其父亲刘太公在沛郡丰邑所结交的“皆屠贩少年”,是平民阶层的小人物,其消闲活动便是“斗鸡,蹴鞠,以此为乐。”现在我们尚无法考证当时的蹴鞠方式是什么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开展的蹴鞠都是亲身参与的,平民式的消闲娱乐。这

与军队的练武手段,庙堂祭祀的鞠舞,在性质上已有很大的区别,这一时期的蹴鞠娱乐表明当时社会蹴鞠的群众性。所以我们说这一时期的足球运动具有典型性,齐都临淄群众性的足球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有现代足球的基本属性。

汉朝是封建社会的奠基时代,朝廷礼乐,典章制度,都是在这时制定的,后世只是稍加增减而已。汉代蹴鞠的发展也奠定了在二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汉代蹴鞠的发展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娱乐性的技巧提高,配合音乐伴奏,由自娱性消闲娱乐提高为观赏表演娱乐,成为“百戏”表演中的一个节目;汉代蹴鞠另一发展便是作为军事训练手段,是军事检阅军礼的一个部分,其运动形式和娱乐性蹴鞠有很大的区别,不是表演而是竞赛,直接对抗性的竞赛。汉代两种蹴鞠的性质不同,一种是军事训练手段,一种是宴会娱乐;形式也不同,一种是对抗竞技,一种是技巧表演;但这两种蹴鞠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开展,成为我国古代蹴鞠发展的又一高潮期。这二种蹴鞠发展都是受当时社会文化影响,因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南北方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北方少数民族以其精湛的骑术战胜了中原地区的步骑联合兵种,因而促使了军事技术的改变,骑兵战术成为重要兵种。唐太宗李世民是以轻骑兵战胜群雄,统一天下,建立唐朝,因此,唐朝的最重要兵种是骑兵,建设强大骑兵成为国之大事,打马球是训练骑术和砍杀术的最好手段,于是马球便成为唐宋时期军训重点项目,“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宋史·礼志》)蹴鞠失去了在军训中的价值,从此消失了,连蹴鞠专业书《蹴鞠》二十五篇也随之失传。汉代已经有了自娱性的“寒食蹴鞠”,是民间的节日消闲娱乐,到了唐代,社会安稳,生产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寒食蹴鞠”民俗得到极大的推广,“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杜甫《清明》)杜甫周游全国万里之地都看到有“寒食蹴鞠”的风俗。“寒食蹴鞠”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踢法,俗称为白打。“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王建《宫词》)“寒食蹴鞠”的习俗也传播到了皇宫。这种白打蹴鞠不知是否是由战国时的消闲蹴鞠发展而来,还是汉代蹴鞠舞的变化,但白打蹴鞠的风格特点是巧与美,与汉代蹴鞠表演风格相同。

宋朝的开国君臣大多是军官出身,他们都喜爱体育运动,北宋画家苏汉臣留下了一幅名画《宋太祖



蹴鞠图》,图中有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对面踢球,大臣赵普、党进、楚昭辅、石守信在一旁观看,这说明宋代初年的皇帝和贵族都是喜爱蹴鞠活动的。蹴鞠表演进入到宋辽全社会上层娱乐,这是蹴鞠价值最高的时代。此时的蹴鞠能进入上层娱乐圈和其精湛技术有关,也和当时统治阶级的喜爱有关。《水浒传》中有高俅的故事,也能间接说明这一点。

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使城市人口大增,全国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北宋的汴梁城,南宋的临安城,人口都超过百万,为了满足城市人民文化娱乐需要,城市中有了综合性的游乐场——瓦舍,也叫瓦子、瓦市,瓦舍中有供艺人演出的勾栏,多者有五十余座,少者也有一、二十座。在勾栏演出的节目有说唱、杂剧、讲史、杂技,也有相扑、拳棒、举重、弄水、蹴鞠等体育项目。蹴鞠艺人的会社叫齐云社。早在汉唐时期,皇室和贵族的家中就有专业的蹴鞠艺人,称为“鞠客”“内园小儿”,是专为统治阶级表演观赏的,宋代朝廷的教坊司也有专业蹴鞠艺人,而城市瓦舍中的蹴鞠艺人则是民间的,是为市民表演娱乐的。从皇室贵族家中走到民间,从为统治阶级服务到为市民服务,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是蹴鞠发展的表现。宋代官方蹴鞠艺人和民间蹴鞠艺人的发展,为宋代蹴鞠的普及和技艺的提高,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宋代朝廷宴会表演节目中有蹴鞠,市井娱乐中有专业蹴鞠艺人表演,民间广泛开展“寒食蹴鞠”风俗,构成了蹴鞠发展的高潮。无论是从技术的发展,还是开展广泛的程度,以及蹴鞠在社会上的娱乐价值,宋朝都是中国蹴鞠发展最兴盛的时期。

由北方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虽然统治的时间短暂,但是所造成的戏曲艺术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颗明珠,而戏曲中的重要角色女艺人的成就是熠熠生辉,使社会刮目相看。因此在宋朝民间蹴鞠艺人发展的基础上元朝社会上便有了女蹴鞠艺人,而社会上也以观看女艺人表演蹴鞠为最好的消闲娱乐。青年男女也冲破了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的束缚,同场踢球娱乐,这说明了元代女蹴鞠艺人的出现,拓宽了蹴鞠娱乐的社交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社会对妇女歧视的观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元代女蹴鞠艺人的出现,在中国蹴鞠发展史和世界足球发展史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封建意识浓重的中国古代,具有商业性质的女蹴鞠艺人表演,是纨绔子弟追求的娱乐,便为封建士大夫阶级所不齿。这说

明当时社会上许多妓女都练习蹴鞠,以蹴鞠技艺高超,陪客人踢球娱乐而获得欢心。从文化价值来说,朝廷宴会上的蹴鞠表演和妓院中陪客人蹴鞠是有天渊之别的,所以,只从这一点上来判别宋朝与明朝的蹴鞠,便可以看到其衰落的景象了。明代朝廷宴会蹴鞠表演的取消,瓦子勾栏中没有蹴鞠艺人表演的位置,“寒食蹴鞠”民俗地区的缩小,都预示着蹴鞠社会地位的下降,蹴鞠走向衰落。

清朝是由居住在长白山下的满族建立起的国家,其祖先女真族曾建立过金国,在公元1234年为蒙古军所覆灭。接受历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失败的经验,清朝政府对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采取压制政策,在体育方面如武术、相扑、击鞠、蹴鞠、捶丸、龙舟竞渡,或予以严令禁止,或不加提倡,或阉割其精华,而对于其本民族的体育项目如围猎、骑射、滑冰、摔跤则积极予以提倡发展,并曾企图把滑冰与蹴鞠相融合创造冰上的蹴鞠以代替中原传统的蹴鞠。由蹴鞠改变为冰上蹴鞠,不仅运动性质和方法改变了,其文化含意也由中原传统民俗演化为北方民族的风俗,这就是清代创造冰上蹴鞠的目的。

明代蹴鞠社会价值已逐渐下降,走向衰落,清朝文化政策的压迫更促进其消亡。清朝初年社会上还有蹴鞠的开展,康熙时礼部侍郎顾沂还有一首《过同年颜淡园寓观蹴鞠》诗,描写蹴鞠艺人精彩的表演。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28回中还有:“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但是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各种史籍中便没有蹴鞠的记载了,有几千年传统的蹴鞠便由此消失了。

纵观几千年中国蹴鞠的发展演变,兴盛衰落,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其发展中不仅可以看到蹴鞠的丰富内容,及其与社会文化相依存的关系,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封建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脉络。看出中国足球由刚健趋向于文雅,由角力发展为技艺,由竞争演化为表演的基本路线。中国现代足球发展面临着重大的选择,何去何从值得检讨。然而,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足球进步需要民族精神,足球发展需要人文关怀,足球提高需要社会风尚。山东临淄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关注祖国的足球文化,建设足球博物馆,发展各项足球文化事业,成绩斐然,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髓。齐都临淄在足球文化领域已灿然具备首位性、中心性、正宗性的基本元素,可以说当之无愧的足球之都。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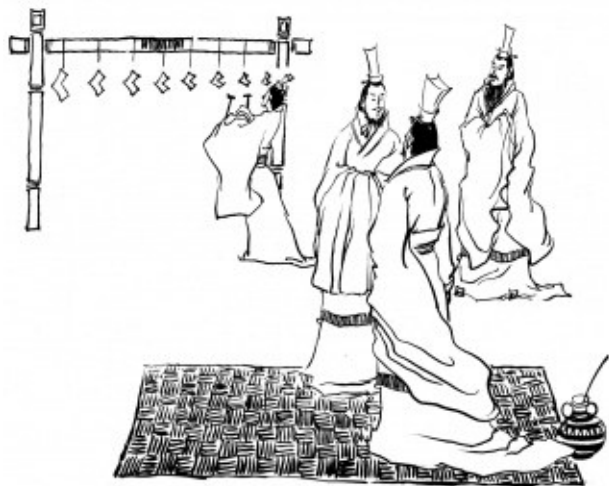
# 泱泱大风

**【解释】**泱泱：宏大的样子。指气魄宏大的大国风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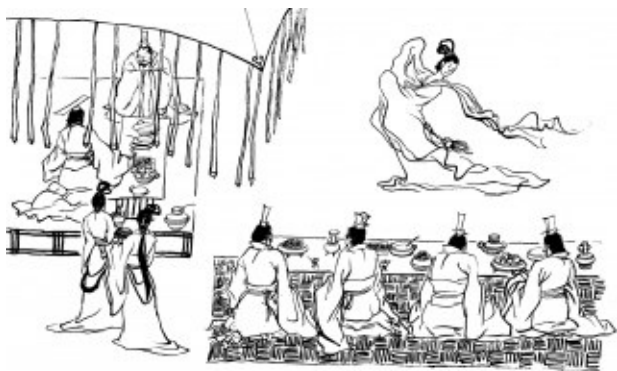
**【出处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1.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君的第四个儿子，他自幼精通音乐，贤良而又博学多才，很受世人尊敬。公元前544年，季札到鲁国进行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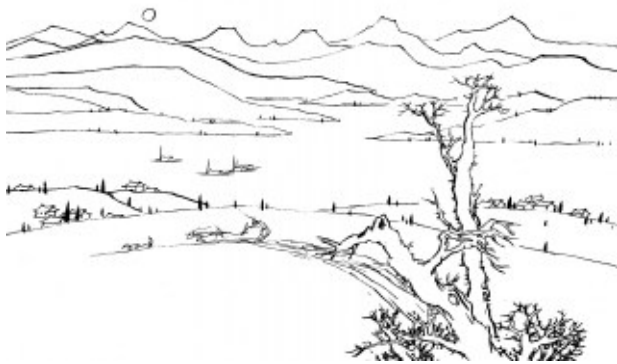
2.季札请求聆听观看周朝的音乐和舞蹈。乐工为他表演了《周南》、《召南》、《邶风》、《卫风》、《颂》等乐舞。季札以深刻的感受力和卓绝的见识透彻地分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并且透过音乐预见周朝的盛衰运势。他语惊四座，使众人刮目相看。



3.当乐工为他表演《齐风》时，他由衷地赞叹道：“美啊，多么宏大的声音呵！这是大国的音乐啊！作为东海的表率的，大概是太公的国家吧！国家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



4.通过季札对《齐风》的高度评价，看出季札对齐国强盛和恢宏大气的民风十分赞赏，对齐国非常向往，对姜太公更是充满了崇敬景仰之情。



5.季札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齐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证明齐国在诸侯国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邵杰/文 朱代训/图）



# 齐风韶韵绕劈山 孟姜情泪成涌泉

## ——山东涌泉孟姜女故居纪念馆巡礼

周雁翔

走近涌泉,走近劈山,走近齐长城,那个千年的呼唤就在耳旁轻轻的回荡,犹如天籁之音弥漫在飘渺空灵的天地之间,如歌如诉,久久不息,望着劈山之阳那如长龙起伏蜿蜒盘旋的古齐长城,顿时,一幅鲜活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旌旗猎猎,鼓角长鸣,一个个手持长矛的武士严阵以待在烽火台升腾的一股股浓烟之中……

望着劈山齐长城下的姜女台和劈山顶齐长城的坍塌断裂的缺口,瞬间,把一个遥远的传奇故事又复原展现在了眼前:一个弱不禁风年轻女子,为寻夫历经磨难,颠沛流离来到劈山齐长城下,惊闻夫亡葬身于城下,悲痛欲绝,泪如涌泉,呼天唤地,哀声不绝,其声如剑,撕心裂肺,震惊三界;其情如电,天地动容。霎时,电闪雷鸣,天河倾泻,天塌地陷,山裂城崩。风雨过后,姜女台不见了痛哭的女子,只见劈山顶上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后人说:“那就是孟姜女的化身”。由此孟姜女的故事从这里传开,并岁岁演绎的走向了世界。

其实,孟姜女传说的故事原型来源于杞梁妻哭夫。公元前549年,齐伐卫、晋后,没有回齐都临淄便突袭莒国。在袭莒的战斗中,齐国将领杞梁、华周英勇战死,为国捐躯。后来齐莒讲和罢战,齐人载杞梁尸回临淄。杞梁妻哭迎丈夫的灵柩于郊外的道路。齐庄公派人吊唁。杞梁妻认为自己的丈

夫有功于国,齐庄公派人在郊外吊唁既缺乏诚意,又仓促草率,对烈士不够尊重,便回绝了齐庄公的郊外吊唁。后来,齐庄公亲自到杞梁家中吊唁,并把杞梁安葬在齐都郊外。后来经过历代加工,才有了孟姜女传说。

齐风韶韵绕劈山,孟姜情泪成涌泉。两千多年过去了,劈山依然,齐长城依然,断城依然,姜女台依然。岁月的流水冲淡了许多,历史的烟尘埋没了许多,然而,孟姜女这个千古的传奇,这段凄美的故事,却在这里凝结不散,环绕着劈山回荡,伴随着涌泉呜咽。谁想,这民间的口碑相传,竟打破了疆域和语言的障碍,穿越了历史的时空,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依然鲜活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真乃奇也!神也!

今日漫步在涌泉的孟姜女大道,同行者里不乏游山玩水的游客,而更多的是来此探奇寻幽者。昔日崎岖的孟姜女古道,已是越走越宽阔,人来车往如穿梭,今非昔比了。特别是这里恢复了孟姜女故居,建立了孟姜女故居纪念馆后,姜女庙的香火更旺,更红火,来拜谒孟姜女和参观孟姜女故居纪念馆的游人与日俱增、络绎不绝。又有谁曾想到,从这千年封闭的深山老峪里走出了世界的东方女神?

沿孟姜溪,穿响泉飞瀑,过孟姜老井,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三谷会合的山间盆地犹如一把五颜六色的折扇展开,仿佛是聊斋中狐仙鬼妹惯用的仙术魔法,在绿树红花的婆婆摇曳中,一座古朴典雅、别具一格的宅院突现眼前。抚摸古树老藤,依小桥凭栏,听泉水淙淙、百鸟啼鸣,仿佛步入了天赐的一幅自然古画中。懵然间,又被一同抖落在人间的仙境,习习清风中花香扑鼻,如梦如幻中惬意无比。走石路,下石阶,过石桥,迎面是一栋石墙石屋茅草盖顶的北方传统的山石结构的四合院,石之风格,石之韵律,石之情怀,石之景象,无不令人遐想、耐人寻味,大有身临梦中的香格里拉与桃花源的意境和感受。

一棵高大的古杏,枝叶参天的立于孟姜女故居门前,在阵阵山风的吹奏下,合唱着一支有情人方能听懂迎宾曲。树下一块如同坐佛的巨石特别引人



孟姜女故居



注目,据说,这就是当年姜女昏卧的“佛缘石”,后人称“孟姜石”。静立于孟姜女故居门前,遥想两千年前,姜女千里迢迢如何来到劈山脚下,荒山野岭兵荒马乱,没有阻挡一个弱女子寻夫的意志,是情的牵挂,是爱的力量,坚定了她不畏艰险,不畏强暴千里寻夫的决心。正因为如此,才留下了这千古佳话和戏剧性的孟姜奇缘,才有了今天孟姜女故居纪念馆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在孟姜女故居石结构的门楣上,茅草掩映着一块古色古香的横匾,五个鎏金大字:“孟姜女故居”特别醒目。这苍劲、流畅的墨宝,系出自当代著名书法大家、原泰山文物局局长黄挺惠先生之手,字里行间洋溢着黄老对孟姜女故事的关注与珍爱,更渗透着他老人家对国家文物事业和文化遗产的深深眷恋和不了情。

入院门,迎面立一石,在几株苍翠的竹子点缀下,其形状如同躬身拱手迎宾的主人在恭候着您的到来,让您时时处处感悟到山里人的朴实与热情。穿过石圈门,一个宁静宽阔朴实的院落,被几棵历尽沧桑的古树合环笼盖着,给人几分古朴、几分神秘。院内十字形的石板路,连接着四合院内东、西、南、北屋的房门,座北朝南的是院内的正房主屋,门上有一扁,扁上有三个墨绿色的大字:“孟姜宅”,墨宝同是出自黄老之手,又给人几分深沉、几分凝重。无需问,这就是传说中孟姜女曾经住过的房子了。三间茅草石屋,古树枝结构的门窗,门前两棵粗壮的大石榴树左右守护,在门窗左右的石墙上自然地挂着几串老山玉米、红辣椒、红高粱穗与金黄色的谷穗和几张獾皮与兔皮,这些无不尽显着浓厚的原始山野生态气息和历史沧桑中一段生活久远的凝固。

推开柴门,步入孟姜宅,迎面是一幅孟姜女的肖像,画像采用了工笔画的技法,线条流畅,清晰逼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虽然她眼神里充满了哀怨,却丝毫掩盖不了孟姜女那眉清目秀丽质天生的仙姿。素衣简装的孟姜女,身披遮风挡雨的斗篷,手臂紧挎包袱里的寒衣,瑟瑟秋风舞动着她风尘仆仆的发丝、衣带、斗篷,孟姜女坚毅的目光始终望着前方。画面的下半部分,孟姜女抖动的衣裙中,虚幻着缕缕白云、道道长城、自由飞翔的天禽与对对追寻春天的雁阵。作者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手法,将孟姜女传说故事和孟姜女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界定于远与近之间、实与虚之间、形与意之间、人与神

之间,给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和耐人寻味的余地。这幅出自青年画家小杰之手的孟姜女画像,其实也完全可称作:“长城魂”。画像两侧是当代著名书法家王法颜书写的楹联,上联是:“万里漂泊归根叶落”,下联是:“千年传诵东方女神”。苍劲有力的联语,道出了一个千年的真谛和无数人的意愿。千百年来万里长城万里哭哭无定居,万里长城万里魂魂漂万里。不管怎么说,孟姜女神总算叶落归根终有家了。画像与楹联下面是山石和黄泥垒砌的土炕台,炕台上铺一张旧的不能再旧的破草席,席上安放一石板桌,桌上摆着几个小陶罐和一盏陶油灯,两边是供人席地而坐的草甸子,东西两间各有土火炕,炕上陈列着一架旧纺车和用树条编制的用具。在黄泥漫的土墙上,挂着兽皮、树根、谷穗、高粱穗和葫芦等,在黄泥地面上简陋的石盆、石槽、石臼、陶瓮、草篓、草筐、木瓢等,这些陈列无不印证着一个久远的时代,并默默的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生活的故事。

相传,新婚之夜,夫被抓丁未归,孟姜女日思夜想泪守空房,深秋夜梦夫君在服徭役,修建齐长城,索要寒衣,姜女醒来,连夜整理行囊,拂晓,就迫不及待的出门寻夫急送寒衣,一路历经磨难,辗转来到劈山齐长城下,一个弱女子哪经得起旅途的劳累?在山雨中饥寒交迫,踉踉跄跄的昏死在孟家门前的卧佛石上,多亏被这家人搭救,抬回家中,精心照顾,慢慢康复。孟姜女为报再生之恩,叩拜孟氏夫妇为义父义母,说:“滴水恩,涌泉报”。由此该村得名“涌泉”,孟姜宅也一代代传了下来。

步出孟姜宅,一位老人对我说:“自古以来,俺这里不光有孟姜女故事流传,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的民歌传唱,我唱的不好,于莲香唱的好,你愿意听,我叫她给你唱唱”。说着就喊在故居工作的一名中年女同志过来介绍说:“她就是于莲香,唱的可好了,你给老师唱唱。”于莲香,四十岁左右年纪,端庄秀丽,热情大方的说:“行!我唱的不好,千万别笑话啊!”她大方的清了清嗓子,略一沉思的唱了起来:“姜女寻夫到劈山,千里迢迢路艰难,秋雨涟涟风瑟瑟,饥寒交迫昏道边,恩公孟氏来相救,再生孟姜在人间。滴水之恩涌泉报,粒米之情满囤还。茅屋留下孟姜女,洗衣做饭碾磨转,劈山常叹孟姜情,涌泉传唱孟姜缘。惊闻夫君修城死,孟姜哭到劈山关,悲痛欲绝泪如雨,泪尽血出感苍天。天崩地裂雷声响,天河倾泻长城断。雨过天晴艳阳天,一道彩虹恋劈山。孟姜



化神乘鹤去，留下佳话伴涌泉，齐长城下孟姜庙，香火袅袅世代传。”随着她原汁原味声情并茂的演唱，让人们的思绪穿越了历史时空。朦胧中，整个故居小院鲜活起来，石磨、石碾一起转动起来，孟姜宅又升腾起袅袅的炊烟，炊烟里传出孟姜女那咯咯咯的爽朗笑声。

孟姜宅的两侧是东西各三间厢房。东间，是孟姜女传说故事的再现和有关孟姜女的文献资料及那个时代相关实物；西间，是整个齐长城的图片展览和文字介绍；南屋与孟姜宅之间有一类似眼睛形状的水池，中间有一类似鼻梁的石桥，人称“双泪池”，简称“泪池”。走过泪池，可进入与孟姜宅对应的南屋，这里是书法家、画家的天地，孟姜女故居纪念馆收藏的全国各地大家的墨宝，都在此轮流展出。

孟姜宅后面是一片荒废的园林，有待于开发利用。孟姜宅大门的南侧，有一个石砌的圆门，打开柴门，是一片桃园，据说，原来是一个种菜的菜园，因这里有山泉小溪，非常适合种植各类蔬菜，由此可见主人自给自足的山野田园生活，真是其乐融融的世

外桃源。而今，为了配合故居的对外开放，在原基础上加以整修：山泉小瀑、飞线溅珠；小桥流水、金鳞漫游；豆棚瓜架、绿荫婆娑；清风习习、百鸟唱和。这别有滋味的景象都是现代都市求之不得的。

立于孟姜女故居小院，四面青山犹如大自然赋予的万花筒：春泻红、夏滴翠、秋吐金、冬撒银，淳朴、自然，没有雕琢、没有虚假、没有喧嚣、没有污染，试问，有谁不爱这样的净土？又有谁不眷恋这样的家园呢？也许，因为这里的情缘、佛缘，才有了这里的孟姜缘；也许，因为这里的劈山齐长城，才有了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流传。孟姜宅是孟姜女文化传承的结晶，孟姜女故居是孟姜女文化凝结的寄托，孟姜女故居纪念馆是孟姜女文化永恒纪念的结果。然而，这都不是结束，它们都责无旁贷的承载着一一种历史的神圣使命：诠释孟姜女文化现象的内涵！升华孟姜女文化现象的真谛——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家庭幸福，社会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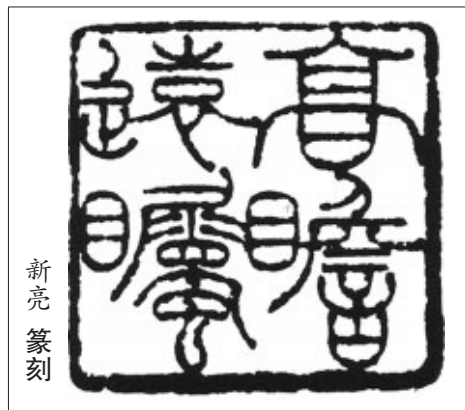
我们期待着凝聚着大爱的东方爱神走出涌泉，走出神州，走向世界。📖

# 《古代咏齐诗赋续集》 和《孙娄店王氏诗文集注》两书同时出版

王 生

日前，山东省文艺家、临淄齐文化民俗学会副会长王毅先生新作《古代咏齐诗赋续集》和《孙娄店王氏诗文集注》两书均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期正式出版发行。

《古代咏齐诗赋续集》是王毅先生费近十年之功，潜心搜集、编注而成的。此书的出版是在



新亮篆刻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先生倡导下，对原书《古代咏齐诗赋辑览》的补充和续写。此书以王志民

先生的《诗赋中的古齐风云》为代序，由淄博市诗词学会会长李奎封作“序二”。它以圣贤诗、齐风、名人、古迹、山河五编分类，雅俗兼顾，文俚共赏，一册在手，古迹风物、典章事理、山水人物尽收眼底。此书的出版将《古代咏齐诗赋辑览》和《古代咏齐诗赋续集》两书打造成为“咏齐诗赋”的大全之书，其两书更有“以诗证史”的权威性、学术性和工具性。

《孙娄店王氏诗文集注》是对明清时期孙娄店王氏文化首次挖掘成果的结集，此书共收集到诗作百余首，文五十余篇，展示了王氏文化的辉煌成就。它是齐文化在明清时期延续和传承的产物。正如本书的序者、齐文化研究院院长宣兆琦先生指出的“王氏诗文是一笔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既有资料价值，又有学术价值，更具有当代开发利用价值。”📖



# 齐鲁会盟台

姚继平

齐鲁会盟台简称会盟台,又名西王台、仙垆堆,位于山东巨野县城西1.5公里大李庄村北约250米处。现存台高约2.8米,东西宽34米,总面积为816平方米,形似覆斗状。相传,此台为春秋时期齐鲁两国会盟之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79年,会盟台被巨野县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会盟是古代诸侯之间为达成某一种协议而进行的集会和订盟。而筑台为盟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所特有的现象。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会盟是“瓦屋之盟”。《春秋穀梁传》:“(鲁)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诸侯之参盟於是始也。”齐桓公初霸时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东)大会诸侯,筑台为盟。盟约申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还规定同盟诸

国,“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即不要乱筑堤防,使邻国受水害,不要囤积粮食,使受灾之国买不到粮;不要擅以田邑封给卿大夫,而不报告天子。

这是较大规模的会盟。而各小诸侯国之间的会盟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战火不断,会盟不绝,于是便在各地留下诸多的会盟台。据史料记载,齐国和鲁国之间曾有两次会盟,一次是在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会于柯(今东阿县);另一次在鲁定公十年,“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相,齐归我地。”(司马彪《郡国志》云:夹谷在祝其县西南)巨野县境内所遗存的齐鲁会盟台便是当年齐国和鲁国歃血为盟之地。至于何时而盟,因何而盟,却无从详考。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昔武王伐纣成功后封周公于少昊之虚曲阜。而“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由其子伯禽代封,建鲁国。

齐国是太公望吕尚的封地。武王平定天下后,封吕尚于营丘,建齐国。两国建国时间差不多,而建国之初施政纲领的迥异却决定了其今后的强弱。据《史记》记载,鲁公伯禽初受封,三年之后报政周公。周公问他为什么这样慢?伯禽回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而太公望封于齐,五个月后即报政周公。周公问他为什么这样快?他回答“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于是周公叹道:“鲁后世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这句话果然言中。齐国依山傍海,本有渔盐之利,经过一百多年以后,到了齐桓公时,齐国任用管仲为大夫,进一步改革,实行“案田而税”“寓兵于农”等措施,把齐国治理得更加强大,终于在前651年大会诸侯于葵丘,挟天子而令诸侯,率先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而鲁国虽为第一等封地,但因其太重礼仪,处处讲究,反而束缚了发展的脚步,始终未能强大起来。齐鲁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时好时坏,颇为复杂的。在建国之初,自鲁公伯禽始至鲁桓公十八年(即前841~前694年)140多年的时间里,齐鲁两国一直友好相处,有时还互通婚姻,关系非常密切。后齐襄公与鲁桓公夫人文姜私通,并把鲁桓公杀死,自此两国交恶。虽然在齐桓公称霸后两国关

系曾一度稳定,但总的来说,两国之间仍然战火不断,互相侵掠。从前684年(鲁庄公十年)至前373年(鲁共公四年),有历史记载的战争就有29次之多(《史记·表一》)。由于齐强鲁弱,鲁国常常处于劣势,所以不得不联合其他国家甚至投靠楚国来对付强齐。巨野县境内的齐鲁会盟台也许就是某一次战争之后两国达成协议时所留下的遗存。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沧桑和地貌变化,此台初建时的规模已无法知晓,而与之相关的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依然还在流传。传说宋金时代黄河决堤时,洪水漫野,屋宇俱毁,附近群众尽上高台。人愈众,而台却不见拥挤,犹如神助。后被世人称作“仙垆堆”。明代薛瑄注路过巨野时曾有诗云:

巨野茫茫远际天,春风春雨淡如烟。

盟台已然成陈迹,俯仰千秋事渺然。

昔日的硝烟已然散去,人们再也不会为了躲避洪水而再到台上去住,如今的会盟台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实际作用,却把无尽的遐想留给后人,现在成了人们休闲旅游、抚今怀古的好地方。台四周古树参天,遮天蔽日,台面平坦,绿草如毡。一条小河自南向北从台西边潺潺流过,流向远方的田野。夏日的傍晚,人们三三两两,来到台上,相扶相携,或卧或坐,尽享天伦之趣。近年,齐鲁会盟台又被列入城市建设规划,拟以台为中心,扩地200亩,建“会盟台公园”,使之成为巨野又一重要文物风景名胜。📍



千乘城遗址,位于高青县唐坊镇卢家村南2500米处,杜姚沟南侧,遗址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

“千乘”得名于齐国城邑千乘。春秋战国时一车四马为一乘,大国有车千乘,甚至万乘,号称“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春秋时,齐景公有马千乘,畋猎于青田之地,遂得名“千乘”。据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末期的万乘之国有韩、赵、魏(梁)、燕、齐、楚、秦七国,千乘之国有宋、卫、中山以及东周、西周。

好奇的我们曾经在周日结伴去探寻,只看到一望无际的原野,生长着茂盛的庄稼,平坦的土地,连个高起的土堆都没有,实在找不到城池的踪迹。我们也想找块破砖烂瓦,说不定就是古人的馈赠,但一无所获。

史载,齐桓公时(前685~643年)“始置千乘城于古漯水两岸”。西汉时置千乘郡,又置千乘县。《齐记》:千乘城在齐城西北百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距二十余里,其一城县治,一城太守治。此二城即千乘县和千乘郡治。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次子齐王刘闾薨,齐国除为郡。约在此后,武帝分齐郡置千乘郡。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千乘郡领十五县:千乘、东邹、湿沃、平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乐安、被阳、高昌、繁安、高宛、延乡。其地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高青县、滨州市滨城区、博兴县的大部份地区,以及利津县、沾化县与桓台县的一部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千乘郡有116000多户,人口49万多人。王莽改千乘为建信。东汉建武五年(29年),占据青州、徐州的张步降汉。东邹、湿沃、平安、建信、琅槐、被阳、高昌、繁安、延

倪宽雕像



乡九县于东汉初年省并。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封皇子刘建为千乘王,置千乘国,次年刘建薨,国除为郡。又以齐国利县置利侯国(今广饶县)、由北海国分出寿光侯国、益侯国(今寿光市一带),划入千乘郡。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

## 寻觅千乘城遗址

赵永伟

封皇子刘伉为千乘王,复置千乘国。汉和帝永元七年(95年),改千乘国为乐安国。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乐安国除为乐安郡。三国魏时置千乘县,西晋时省千乘县。南北朝时复置千乘郡,并移治广饶。遗址应为春秋至南北朝时期,文化层普遍埋藏在3米以下,地表为可耕地。遗址西南部偶有宋元瓦砾发现。1973年曾在遗址出土过战国晚期豆柄。1978年,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乘这块文化沃土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大学问家和达官贤士,倪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他出身贫寒而苦学不辍,官居高位而体贴下士,辅佐皇室而不忘百姓疾苦,日理万机而不忘研究学问,他是历史执政者的楷模,同时也是当代执政者的一面镜子。倪宽的政绩誉满千成之地,他的“清明之治”和无量功德在家乡人民中树起了一方令人钦佩的丰碑。

倪宽自幼聪颖好学,虽家境贫寒,但胸有城府,学而不厌,他的渊博知识和善辩才能颇为千城名流称道。他性情温良,待人礼貌,喜欢洁身自好,善交四方好友。这时有个地方官叫张汤,正出任廷尉之职,府上缺乏精通文史法律的人,就让倪宽撰文笔试,倪宽写了一篇上呈皇帝的奏文,张汤看后拍案叫绝,为倪宽的出众才能大吃一惊!于是召见倪宽叙谈,见他谈吐不凡,满腹经纶,善辩能力非同凡响,看中了倪宽这个人才。

张汤曾贬官流放北国多年,赫免任职不久就遇上了一位不可多得人才,使他感到十分欣慰。他把倪宽撰写的奏文上呈汉帝,得到了汉帝的赏识,不久张汤就受到重用,晋升为御使大夫,他举荐倪宽为左内史,使倪宽的出众才华有了用武之地。

此时司马迁也被任用为中大夫,他与倪宽是汉武帝时期的贤士良才,精通治国安邦之策和经史伦理之道,两人共商国事,切磋学问,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汉武帝时期由于广招贤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倪宽、东方朔等,这些人对汉室的清明之治和国家的繁荣富强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倪宽理政清明,他兴农业、减税收、缓刑(下转第48页)



# 临淄八景

苏崑莲

临淄的自然人文景观最著名的是八景。有明代流传至今的八景诗：“高阳馆外酒旗风，矮矮槐阴夏日浓。秋入龙池月皎皎，春回牛山雨濛濛。古冢遗迹怀晏相，荒台故址吊桓公。淄江钓罢归来晚，西寺楼头听晓钟。”

“高阳馆外酒旗风”，指的是当年高阳城酒馆林立、酒旗猎猎的繁华景象。高阳故城位于临淄区朱台镇南高阳村西约200米处。城址濒临泲水，泲水由地下水汇成，水质优良，清冽甘美。传说附近有一块田地，特别适宜种植高粱，结的穗极大，一个萼内有两颗高粱粒，粒也象鸠眼一样大。用此处的水和这里出产的高粱酿造的酒，气味浓郁，有“开坛十里香，酒醉三年醒”之说。当时这里家家造酒、卖酒，传说著名的酒狂、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曾慕名前来，并且死后葬在这里。

“矮矮槐阴夏日浓”，指的是今临淄辛店街道矮槐树村的一棵小槐树，这棵槐树非常特别，树身低矮，冠如伞盖，虬枝下垂，叶密荫浓。树旁边立着两方石碑，一块石碑上刻着一首七绝诗：“临淄路上矮槐树，密叶团团如小亭。偶在此中休半日，不知六月有炎蒸。”另一石碑上刻着一首五言律诗：“故国非乔木，斯槐不满寻。老干擎新盖，繁枝庇宿禽。经秋犹黛色，入夏更浓荫。挂袍追往事，遗说到如今。”传说宋太祖赵匡胤打天下时曾率一支人马在该村古邮亭旁歇息。当时正是六月，天气炎热，赵匡胤将汗水浸湿的战袍脱下，挂在邮亭不远处的一小槐树上面晾晒，他自己则在槐荫里躺下歇息。一觉睡到日落西山，浓密的槐荫一直为他遮挡骄阳，使他很快恢复了体力。因为他的战袍是龙袍，压得小槐树从此不再长高，所以这棵树就叫“矮槐树”，这个村子也改称矮槐树村。

“秋入龙池月皎皎”，指的是秋天的夜晚，月影倒映在名泉龙池碧水之上的皎洁美景。龙池在今临淄齐陵街道龙池村，面积约有一千多平方米，水有数米深，泉水从池中涌出，即便到了大旱之年，泉水依然奔涌不息。龙池的水清澈见底，能看得见水底下的游鱼。龙池四面竹木环绕，环境优雅。池的左右两边分别有两口水井，井里的水面比龙池的水面还高，每当皓月悬空的时候，月影就倒映在井中，好像一个大玉盘沉到了井底。

“春回牛山雨濛濛”，指的是春天里牛山的风光。每当春季，牛山上小雨濛濛，松柏吐翠、云气蒸腾，附近的淄河波光潋滟，一派怡人风光。牛山在今临淄区齐陵街道境内，海拔174米，传说周武王灭商之后，姜太公被封到齐国营丘。为了抢占对营丘的控制权，姜太公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地往营丘赶，在黑暗中迷了路。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看见月光

下不远处有一头牛，为姜太公带路，一直把他带到了淄河边，突然，这头牛变成了一座巍峨秀丽的山。姜太公为感谢这头神牛，便把这座山命名为牛山。牛山及其周围地区有丰富的齐文化遗存及脍炙人口的传说。山坡下的天齐渊“五泉并出，喷珠吐玉”，泉水从嶙峋的山石间流泻到滚滚波涛的淄河中，泉流跌宕，水气蒸腾，宛若霏霏烟雨。

“古冢遗迹怀晏相”，指的是人们在晏婴冢旁深切怀念贤相晏婴的情景。晏婴冢在今临淄齐都镇永顺庄东南约350米处，墓高11米，南北50米，东西43米。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辅佐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个国君。晏婴节俭并且能够以身作则，他住的是低矮狭小的住宅，乘的是破旧的马车，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粗米干饭就咸菜。晏子机警善变，足智多谋，他出使楚国不辱使命的故事，更是世代流传。相传晏子死后葬在他的故宅旁边，墓前立有明代石碑。

“荒台故址吊桓公”，指的是后人登临桓公台，凭吊春秋霸主齐桓公时的情景。桓公台位于今临淄区齐都镇长胡村东南，是一座高台建筑的台址。现台高14米，东西86米，南北70米，是齐故城的制高点，相传是齐桓公登高望远，宴宾享乐的地方。如今绿草覆盖，灌木丛生，已看不到当年的宏伟气象，但前来游览的人，仍可凭吊齐桓公任用管仲，变法改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赫赫业绩。

“淄江钓罢归来晚”，指的是日落西山，残阳夕照，人们在淄河边钓鱼忘归的情景。淄河又称淄水或淄江，齐故城因为临近淄水，所以得名临淄。淄河是山东境内的重要河流之一，也是淄博境内最大的河流。淄河沿途有很多风景名胜，它作为临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见证，引得无数文人墨客舞文弄墨，流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西寺楼头听晓钟”，指的是每当清晨，临淄县城西部的西天寺那沉重浑厚的钟声响彻云霄，声音远达方圆十余里外的情景。西天寺是南北朝十六国后赵皇帝石虎建造的，当初名为兴国寺。到北魏时期，又在寺后修建了大石佛，佛身高5.6米、宽1.8米、厚1米。到了宋代，经过修建，改称广化寺。在元代被毁坏，明朝初期，又在旧址上重建了新寺，改名为西寺，又名西天寺。西天寺规模宏伟，最盛时整个建筑北起石佛像，南至石塔群，跨度约三里。2006年，这尊石佛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单位。



# 韩姓渊源

韩姓是中国第二十六姓，总人口约为七百六十多万，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一。



韩姓图腾

## 韩姓图腾解释

韩姓图腾由三部分组成，左边代指韩姓氏族的农业，太阳照射下禾苗茂盛的生长，右上方是一中野猪，带指氏族的畜牧业，韩姓是一个崇尚太阳的氏族因此野猪身上有太阳纹，右下方是脚印与城郭，意指氏族的城防，脚印带指围城巡逻的卫兵。

## 韩姓起源

韩姓起源有四：

一、出自黄帝后裔，系以祖先姓名韩氏。据《世本》记载，黄帝娶西陵氏的雷祖（嫫祖），生青阳和昌意。《山海经》记载：昌意后来被贬谪到若水，生子韩流；韩流娶淖子族阿女，生颀頊，颀頊是五帝之一。韩流既是人名，也是其所在氏族的名称。韩流氏族是从昌意族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氏族便以韩为姓。

二、出自姬姓，以邑为氏或以国为氏，为唐叔虞之后裔，韩侯为其得姓始祖。西周初年，周公灭唐后，封叔虞于唐，史称晋国，因建都在唐，故叔虞又称唐叔虞。春秋时期晋昭侯分封叔父成师于曲沃，造成分裂局面，后为曲沃武公统一。曲沃武公夺得晋国君位以后，灭掉了周成王之弟所建立的韩国，封其叔父姬万于韩，称为韩武子，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为氏，称韩氏。

三、少数民族复姓汉化改为韩姓。  
四、异国韩姓，汉武帝时获直侯韩陶，朝鲜人。唐宪宗飞龙卫士韩志和系倭国人。



韩姓始祖 韩侯

## 韩姓历代名人

战国时法家代表人、思想家、哲学家韩非，汉初军事家韩信，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南宋名将韩世忠等。



韩愈全集校注

## 韩姓繁衍迁徙

韩姓对联

文明氣運叁天地  
殿墨萬年貫古今

◆ 郡望：颍川郡 南阳郡 昌黎郡  
◆ 堂号：泣杖堂 昌黎堂

韩姓发源于今山西。战国时韩国建立后，先后迁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阳翟（今河南禹州）、新郑（今河南新郑），从而使韩姓人得以迅速繁衍，也使得韩姓人在今河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灭韩，其地为颍川郡，颍川（约为今河南许昌、平顶山、三景河、登封等地）便成为了韩行人发展繁衍的中心。秦汉时，韩姓人播迁至今江苏、浙江、四川、山东、甘肃、河北、北京等地。西汉时，韩襄王子孙韩王信叛逃到匈奴，其子颓当、孙婴于汉文帝时归汉。西汉末年，颓当的玄孙韩寿，避王莽之乱，徙居南阳（今属河南）。唐宪宗时，韩愈被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成为韩氏入今广东最早者。唐朝末年，固始（今属河南）韩氏随王潮、王审之入今福建。清康熙年间，有韩氏渡海赴台，移居东南亚及欧美。



韩姓人口分布图

# 文物保护标准化建设中的 主要问题和对策

何 流

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是文物博物馆行业的新领域,它既不同于传统标准化发端的生产制造行业,也不同于以数字信息通信等新媒体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创意产业,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涉及的学科也更多,是对标准化工作的全新挑战。在其发展初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矛盾,这里仅就我们认为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研究。

## 一、文物保护标准化的认识理念和运行机制

在标准化工作上,与西方国家“市场驱动、民间主导”的理念以及由此而来的“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不同,我国正处在从“行政驱动、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理念过渡的进程中,表现出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其根源是仍未走出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阴影。在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中,由于文物工作的特殊性,其问题更趋于复杂,不同的环节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由政府出资立项,“行政驱动,计划引导”,难免出现不符合标准化自身科学规律的现象;标准计划项目缺乏系统性,使得标准制定从源头就存在层级不清、重复交叉、衔接不当;标准制定多由一个单位独自承担,以局部经验出发,缺乏全行业广泛协商、充分协调;标准制定过程不够开放、透明,征求意见范围偏窄,存在回避不同意见现象,几乎没有一定范围的多行业参与度;标准一经发布,编制等相关人员工作即告结束或暂停,不重视后期验证和应用反馈;发布的标准中有一些适用性不强,形成标准制定和标准使用“两层皮”的现象;标准实施手段单一,仅依靠政府行政权力强势推行。但是,应该看到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尚处于初期阶段,政府主导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不可避免,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通过加深认识、机制创新来促进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科学合理地开展。

首先,要正确认识标准化活动的规律。标准化工作从制定标准化规划与计划,到标准的制定、修订、贯彻执行、效果评估、信息反馈等活动是一个完

整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不是一次就完结了,而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过程。标准应将科学研究的成就、技术进步的成果同实践中积累的先进经验相结合,它是对科学、技术和经验加以消化、融汇贯通、提炼和概括的过程,从而避免局部的片面的经验,奠定标准科学性的基础。其次,要认识标准的本质在于统一。根据标准定义,“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见《标准化工作指南》)。从主观上来说它要求“协商一致”,“并由公认机构批准”,从客观上标准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其实质则是“统一性”。至于什么应该制定标准进行统一,什么不能统一,则应经过科学的研究与论证,决策不当造成的不恰当统一往往带来持久而巨大的负面作用,且其具有不明显和不易证实的特征。文物行业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业内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普遍存在的关于文物的“唯一性”和标准的“统一性”的诸多观点,尤其是将文物的“唯一性”和标准的“统一性”对立起来。实际上每个文物个体是独特的、“唯一的”,而标准化是对我们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的文物活动要求“统一性”。再次,要尊重标准工作的客观性。标准的立项应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虽然需求方也可以是政府,但政府也仅仅只能作为一方,而标准的立项和制定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参与、协商、协调,达成一致。标准的条款应具有客观性,应以科学技术成果和先进实践经验为客观基础,从而得到相关各方普遍认同和许可,形成能够广泛实施的促进行业发展的科学合理的标准条款。标准实施的效果应得到客观的验证、评估、反馈,以便于对标准条款进行优化修订,增强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执行性,进而实现制定标准所要达到的最终社会目标。

理顺关系、健全机构、多方调动,探寻有序高效化的文物保护标准化运行机制。遵循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逐渐把标准化工作中的“行政行为”向“技术



行为”转变，“政企分开”。表现在实际的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中就是要理顺关系，政府管理部门起到行政管理作用。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标委”）作为技术组织负责本行业标准化技术归口工作。充分发挥文标委的主导作用，并逐步完善文标委的组织机构。文物是多学科汇集交叉的领域，文标委管理的专业领域十分广泛，往往针对某一方面标准匹配的专家委员人数不足以开展标准的指导、审查工作，更不能保证标准的高质量，建议为主要专业领域设立分技术委员会；还可借鉴标准化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标准涉及的不同领域增设业务工作组，建立标准化流程持续运转长效机制，活化标准使其在行业内保持旺盛生命力。发挥调动文物保护社会机构和协会、学会的广泛代表性作用，鼓励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广泛参与到文物保护标准化的工作中。建立开放的标准编制过程，标准制定过程透明，工作进度信息公开，保证各方意见都被考虑，征求意见范围可再拓宽，包括所有相关的技术委员会委员。建立标准应用中经验反馈机制，重视标准实施工作中的实践检验和反馈优化，营造相关各方积极参与、自觉遵守标准化的社会环境。通过开放思想，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开创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的新局面。

### 二、文物保护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标准化工作是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产物，随着世界进入工业时代，标准化已是不可或缺的专项工作。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先后开始实施标准化战略，我国也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方面建立起大量各种规模的标准化研究机构和庞大的标准化体系，使我国逐渐迈入标准化大国的行列。文物保护行业是新兴行业，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在一些大学设立文博学院和文保专业，各省市陆续成立文物保护科研机构，造就了一批专业人才，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梯队。但

时至今日尚没有文物保护标准化的专业研究机构，甚至在文物保护科研机构内部也没有设立文物标准化方面的子机构或部门，而兼有丰富文物保护经验和深厚标准化知识两方面专业背景的复合型通才则是聊胜于无。由于文物保护标准化人才匮乏，导致标准化基础研究非常薄弱，如概念体系、术语体系、标准体系等均难以建立，直接影响标准计划和规划缺乏系统性和方向偏颇，制约了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科学有序地发展，只有突破人才匮乏这个瓶颈才能使文物保护标准化整体工作稳步持续发展。

现阶段文物保护标准化面临两方面人才队伍建设。首先，急需加强文物保护标准化专家队伍建设。鼓励文物保护专家学习、掌握标准化知识，逐渐成为文物保护标准化专家，让具有较高文物理论水平 and 丰富实践经验、熟悉和热心标准化工作的文物保护标准化专家充实技术委员会，并使其在标准建议和立项的决策、标准制修订的指导、标准送审稿的审查等把关的关键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减少行政干预，以达到科学、先进、公平和协商一致。其次，培养锻炼一支文物保护标准化业务骨干队伍。立足对现有文物保护专业人员标准化认识的提高和标准化知识的培训，通过举办标准化知识培训班、委托培养等不同方式，使一些具有一定文物保护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迅速进入文物保护标准化领域，让他们参与到标准的实际编写制定过程中历练实践，不断在文物科技成果的标准化转化中总结提高，造就一批具有丰富文物保护经验同时拥有较深厚标准化知识的复合型高端人才。同时，应积极引入标准化人才，促进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的快速展开，使文物保护标准的制定工作和标准制定质量能够有更高的起点。但要注意到不能以他们主导文物保护标准化的工作，因其存在不具备一定文物知识的先天不足，只能做到对现有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的整理，不能发现和解决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文物专业方面的复杂问题，甚至会在竭力使各方面符合标准化规范的情况下而将问题掩藏更深。另外，应设立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机构或部门，专门从事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的研究，营造良好的标准化工作环境，汇集和培养文物保护标准化人才。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将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要实现这一目标尚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必须从政策上向文物保护标准化工作倾斜，把文物保护标准化人才培养作为文物保护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 齐国历史博物馆

朱刚

齐国历史博物馆，青砖垒砌似城堡。  
瑰宝收藏之府地，齐史辉煌令人傲。  
模拟场景手法多，再现大国之风貌。  
文物珍品厅中列，名君贤相逞英豪。

# 对基层文物部门考古人才缺乏的一点认识

罗胜强


近几年,设置考古专业的高校数量不断增多,但考古人才依然在一些地方缺失,究其原因,是有多方面问题造成的。

首先,基层文物部门领导的问题。在基层文物工作开展较好的地区,一把手或许是考古出身,而相对落后地区,多由上级部门委派,他们对考古完全不懂。实际工作中,这些不懂考古知识的领导,如果知道在哪些方面发力,还是会有成果的。缺乏什么人才就引进什么人才,堵住关系户,文物工作也会开展得很顺利。最差的就是既不懂文物,又让许多关系户进到单位,造成单位工作很难打开局面。更有甚者,不与外界进行交流学习,抱着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闭门造车,把单位工作推到绝地之中。

其次,基层文物部门对待考古人才的态度问题。在基层,为了待遇平衡,干考古的往往野外工作补贴很低甚至没有。为了平均,也不配置相机、笔记本电脑、扫描仪等工作设备。这一做法,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专业人才的积极性。即使引进了一些专业人才,往往也会安排从事与专业工作无关的事。有些

考古人才宁可到省一级的文博单位,也不到地市一级的单位,县里更不用说了。

再次,基层政府造成考古人才难有用武之地。随着社会经济强势发展,各个地区都在争夺好的企业或公司入驻。为了使这些企业或者公司顺利进入,基层政府根本不考虑文物部门职能,在没有经过文物部门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情况下,就擅自大兴土木工程。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经常遇到。文物部门介入调查时,施工方以各种理由拒绝,更有甚者给领导打电话。面对这些损毁的文物,责任心强的文物工作者,犹如失去亲人一般的难受。在难受之时,领导还会打电话说“挖”快点,不要耽误工程进度。在工作中,我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不讲理的基层政府,考古人才很难发挥专业特长。

总之,考古人才的缺失是基层文物部门发展的最大障碍。作为一个基层文物部门,必须考虑人才合理分配比例,人尽其用,在保证考古人才的前提下,适当引进美术、设计、规划、法律、建筑等人才。这样才能保证基层文物工作的顺利开展。 

## 填漆工艺青铜鼎的保护修复

杨爱民

根据以往工作经验,由于鼎铜胎较薄,矿化严重,会给矫形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防止在矫形中加重填漆纹饰的脱落,矫形前必须对填漆工艺纹饰进行必要的加固处理,再采用专业矫形工具进行矫正,达到文物本体损坏小、工作效率高、矫形后不易反弹的效果。具体修复步骤如下:

### 1. 清洗

对器盖、器身矿化严重部位的锈蚀和污染物,采用棉签蘸无水乙醇的方法进行清洗。先做实验块,以选择最好的清洗方法和清洗程度,并确定最终的清洗标准。

使用去离子水、酒精和1:1的酒精+水溶液分别

做试验,用棉签蘸取溶液从上往下滚动清洗浮土。因打磨填漆工艺纹饰较浅易脱落,故清洗力度不宜过大。实验发现用1:1的酒精+水溶液既能清洗掉附着物和污染物,又与文物本体颜色相近,故选用1:1的酒精+水溶液作为清洗剂。

对器物足部存在的白色结垢,采用手术刀、牙科钻交替进行清洗,去除后用2A将表面擦拭干净。

### 2. 加固

为了达到比较满意的加固效果,也做了试验块:

(1)选用3%B-72酒精溶液,用棉签蘸取进行加固,因酒精挥发性好、渗透性差等原因,加固后效果不明显;



春秋满工填漆鼎

(2) 选用5%B-72酒精溶液,用脱脂棉蘸取后敷贴在加固部位一小时,经观察表层的填漆纹饰仍会脱落;

(3) 选用进口雷马士300渗透液和一种专业的土遗址加固液,用小毛刷涂刷分别进行试验,效果仍不明显,强度不够;

(4) 选用表面封护剂丙烯酸树脂(Paraloid B72),因其易溶于丙酮溶液,在器物表面能够形成透明的保护膜,既能防止BTA的升华,还能进一步阻断保存环境中各种腐蚀介质与青铜器的接触,同时能对保存状态较差的器物起到加固的作用。

选用3%、6%的B-72丙酮溶液分别做试验块,发现3%B-72丙酮溶液加固后的颜色接近器物本体颜色,但强度稍差;6%的B-72丙酮溶液加固后强度较好,但颜色比本体颜色稍暗。后用丙酮溶液擦拭6%B-72加固后的试验块表面,观察发现其颜色和本体颜色接近,强度基本没减弱。

经过试验,最终决定用6%B-72丙酮溶液对器盖、器体表层的填漆纹饰进行加固。

### 3. 矫形

一般采取工具整形法,这是目前国内修复行业一种成熟的借助现有或自制特殊工具对器物变形部位

进行冷处理的有效办法。要求操作求稳,支点找准,加力避狠,循序渐进,适可而止。

### 4. 焊接

采用传统锡焊法对整形残片进行焊接。打磨焊口一般选在铜器内壁,使外表纹饰完整保存。为增加整体牢固强度,可采用间断点焊或两面焊口,受力较大的区域则采用连续焊口。焊接法对青铜器破坏较大,实施中尽量少用。建议在不影响文物外观的情况下采用高分子材料进行加固黏接。

### 5. 补配

对于此件铜鼎面积较大的残缺部分,直接采用有一定厚度的铜皮,剪成相应的形状,调整铜皮的弧度,打磨破口,用锡焊将其与文物本体相连接。如补上的铜皮厚度不够,可在其上涂抹掺加颜料的原子灰,在残缺部分进行补全和全色。待原子灰湿度和硬度适中时,再进行弧度调整和手工雕刻纹饰,使补缺和全色部分和文物整体相协调。

对于小面积的孔洞,采用高分子黏接材料和铜粉加上矿物颜料进行补配处理。纹饰部分采用手工雕刻的办法完成。

### 6. 做旧

修复补配完整后,在补配块和焊接处用聚酯腻子多次打磨平整。依照原器物的固有颜色和锈层,用矿物颜料做出各种层次的锈色,采用“喷点法”进行着色处理,使之与原器物和谐统一。

### 7. 封护

封护后可将环境中的氧气、水分与铜鼎隔绝,达到防止锈蚀蔓延的目的。一般选择使用的封护剂应具有不易分解、对文物外观改变小、耐老化、有效期长等特点。具体做法是,依据修复好的器物的表面状况,采用1%~3%浓度的B-72溶液进行一至二次涂刷封护处理。

最后把文物修复档案填写完整,所有记录资料归入保护档案。 [7]

(上接第42页)罚、理诉讼,体谅下属的难处和百姓的疾苦,取信于民,百姓无不拥戴。所以每当秋季到来之际,只要倪宽一声令下,百姓就争相交纳皇粮国税,大车小辆,肩挑背扛,交纳皇粮国税者络绎不绝。他亲自上奏皇帝兴修水利,在郑国之地开挖“六辅渠”,巧取黄河水灌溉粮田,使郑国之地成为富庶的礼仪之邦;他完善地总结了仁、义、礼、

智、信的道德规范,使之成为举国上下的行为准则,以此来规范国风民风,使西汉时期国家兴旺,物阜民丰,府库银两充实,众巷街头有马,田陌牛羊成群,他两与司马迁等共定汉太初历语,修订了流传百世的“皇历”,即今使用的农家历;他知人善任,向皇帝推荐了大批文武贤士。倪宽的功德也受到同僚的赞誉和百姓的尊崇。 [7]



# 康公的传说

谢家海

齐宣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康公贷即位。贷即位14年,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太公田和就把他迁到海上,只给他一座城做食邑,以便供给对其祖先的祭祀。康公19年(前386年),田和正式成为齐侯,列名于周王室,开始纪元年。桓公6年,救卫国。桓公去世,他的儿子威王因齐即位(前357年),这一年,原来的齐康公去世,断绝了后代,封地都归了田氏所有。

至今,中国最大的陆连岛——芝罘岛上有许多关于康公的传说。

传说在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篡夺了王位,把国君康公放逐到这里。

康公被夺位后,整天闷闷不乐,总想着有一天能复辟。部下劝他出游一次,散散心。他同意了,就带着手下人到属地芝罘岛游逛。

这时正是阳春三月,春日融融,碧海澄澄,鸟语花香。他们乘着兴致,踏着草香,登上了芝罘山之巔——老爷山。他站在山顶上,向大海望去,茫茫大海,一望无际。艳阳在海边波动,泛着点点金光。迷雾的海面,变幻莫测,仙山琼岛隐约可见,不由得心旷神怡。回过头去,再看山前,更是绝妙无比。九条山脉汇合成一个自然的山坳。这里背山靠海,中间是一块平展向阳的地方,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很有帝王之气。他一面观看,一面思索:“看来,我和儿子都没有能力恢复江山基业了,只有死后埋在这里,或许可以借此风水宝地,让后代出一个人来恢复江山。”

康公为自己选择了墓地。

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可康公却十分苦恼。你说怪不怪?原来康公的儿子很不听话,处处跟自己对着干,老子让他向东,他偏向西,叫他打狗,他偏撵鸡,这样的儿子怎么能让他照着自己的道办呢?康公真是煞费心思。

康公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从小任性。长大之后,就更不听话了。父亲替他完婚,他却在结婚大典时,喝得醉醺醺的,硬是让人搀扶着,才完成了娶亲大典。生拉硬拖地将他弄进了洞房,他扯下了新娘的盖头,只觉得好玩,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出去,用盖头

捉蟋蟀了。那种怪戾,弄得全国上下没有不知道的。

思虑再三,康公决定:既然儿子和我对着干,何不将计就计,来个歪打正着呢?我让他把我埋在山顶上,他一定要对着干,这不就埋在山底下了吗?对!就是这个主意。

康公病重,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儿子召到床前说:“儿呀,我已经不行了,我死了之后,你一定把我埋在芝罘山顶上,我喜欢那里清凉……”。说完,一口痰没上来,就满怀希望地归天了。

康公死了,儿子自然十分悲痛。他想起自己一生没听父亲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他。父亲临终嘱托,是一生中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难道我这不孝的儿子连他最后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吗?不!我不能让他白养了我一场,我得改弦易辙!决心按照父亲的心愿,把父亲的尸骨埋在山顶上。

儿子首先派人修了一条从芝罘村到山顶的大道(后人称为牙笏道),派人在芝罘山上开圪子,请了风水先生点穴位。

出殡这一天,声势浩大。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康公城出发,沿途有许多路祭。好不容易地爬山越岭,才把棺材抬到了芝罘岛上。刚刚行至半山坡时,天空顿时乌云翻卷,霎时风驰电闪,地动山摇,大雨下个不停。死去的康公发怒了,他要千方百计阻止儿子把自己的尸体抬到山顶上。这时天昏地暗,人仰马翻,抬杆的人都睁不开眼,山路泥泞,脚下直打滑溜,轿夫叫苦连天。但儿子并不灰心,命令所有抬杆的人,冒死也要把棺材抬到山顶上,他悬了重赏只要不误时辰。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抬杆的人一步一挪,棺材越抬越沉,好像有几千斤似的,但抬杆的人在儿子孝心的感动下,没有泄气,还是拚命地往山上抬,灵杠压断了几十根,人员也又添又换地经了几十拨,不把棺材抬到山顶决不罢休。死去的康公,看着儿子这股拗劲,只好服输了。他长叹一口粗气:“我本是‘糠’,偏偏想成个丰实的谷子,儿子不争气时,我慨叹;儿子要听话时,我还慨叹!这就是命呀!奈何,奈何!”他不再阻止儿子抬他上山了。转眼功夫,风刹了,雨停了,康公的儿子终于把康公埋到了山顶上。

康公本身是康(糠),放到山顶上,一阵风吹散了,所以他的后裔很不兴旺,不出两代就绝了嗣。 ㊟



大夫弦章走进王宫,就被浓烈的酒气呛得透不过气来,稳了稳神,才看见齐景公正正在一边喝酒,一边观看宫女们跳舞,就大踏步地向景公走去。

“弦章来得正是时候,寡人喝得高兴,你陪我痛饮三杯!”景公喷着酒腥气,一把拉住弦章,就命一位宫女向他满满地倒了一杯酒。

弦章哪里是来喝酒的?他听说景公沉迷酒色,在宫中一连喝了七天七夜,把厨师、宫女们都累得东倒西歪了,这样下去齐国不是要毁于景公之手吗?他既不去接酒杯,也不答谢,却直愣愣地站在景公面前,心情沉重地说:“国君,酒能伤人,也会废政,为了齐国大业,国君应该停止宴舞,从此把酒戒掉吧!”

景公碰了个软钉子,很不高兴,冷冷地说:“眼下国泰民安,喝几杯酒又会怎么样呢?”

弦章是个直性子人,听了景公的话忍不住怒火冲天,大叫大嚷起来:“国君如果不听劝告继续沉溺酒杯,那么,你就下道命令杀死我吧!”

景公正要斥责弦章放肆,晏子走进宫来。景公要他出主意如何惩治这个敢于当面顶撞国君的人。“恭喜恭喜,”晏子笑容满面地对弦章说道,把景公和弦章两人都弄糊涂了,“你遇上国君这样贤明的

人,能够倾听臣子的意见。如果遇上了夏桀和殷纣那样的昏君,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所以今天我要恭贺你呀!”

这一席话,表面上是说给弦章听的,可是景公听了却坐不住了,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哈哈大笑起来:“晏相国说得对!我应该听取你和弦章大夫的劝告,下决心戒酒。”

晏子感到现在是到了直截了当说话的时候了,于是诚恳地说道:“国君这样做正符合我的心意。古人说过,饮酒只是为了沟通感情,贪杯就要误事,因此,不论男女,饮酒不能超过五巡,否则就要受惩罚。那时实行这样的礼法,在外就没有聚众闹事的,在内就没有胡作非为的,国家就太平了。如今国君喝酒没有节制,竟然一口气喝了七天七夜,这样,在你身边的大臣跟着你狂欢滥饮,在外面的大臣心灰意懒不问国家大事,如此下去,我们齐国怎么会强大起来呢?”

晏子的一番话,打动了景公的心,景公立即传下命令,撤掉宴席,让妃子和宫女们各自回去休息,并向弦章道歉。自此以后,景公节制了饮酒,每日兢兢业业地处理朝政,大臣们看到景公又振作起来,一个个都尽心为国家出力,老百姓也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7]

## 晏婴谏景公罢宴

齐王 泽

范雎是魏国人,很有才干,起初投到大夫须贾门下做个门客。当初乐毅联合五国一同攻打齐国的时候,魏国也曾经出兵帮助过燕国。后来田单用火牛阵打败了燕军,恢复了齐国,齐襄王法章即位。魏昭王怕他来报仇,就跟相国魏齐商量,打发大夫须贾上齐国去聘问。须贾带着范雎一块儿去。

齐襄王见了魏国的使臣,不由得触景生情,想起以前的仇恨,痛骂魏国反复无常。他说:“从前先王跟贵国一同征伐宋国的暴君,彼此帮忙,多么亲密。想不到你们后来会帮助燕国打得我们齐国差点亡了国。这个仇我还没忘呐,你们倒还有脸来见我!”须贾迎头就碰钉子,窘得说不出话来。范雎在旁边替他回答说:“大王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当初魏国、齐国、楚国征伐宋国的时候,齐王约定灭了宋国之后,所有的土地三股平分。可是大伙儿灭了宋国,宋国的土地呐,全叫贵国独吞了。这是贵国失信,不是敝

## 范雎历险记

耿宇伟

国失信!后来各国诸侯都怕贵国强横起来,才跟着燕国一同出兵。这是五国共同的事,不能单怪敝国。再说敝国知道‘适可而止’,才没跟着燕军打到临淄来。这也就是敝国对贵国的交情!如今大王即位,贵国有了这么一位英明的君王,寡君非常高兴,他希望大王能接续齐桓公的事业,好替潜王遮盖遮盖,这才特地打发使臣前来庆贺,两国重新和好。哪儿知道大王只知道责备别人,不想想自己的错处。难道大王不看桓公的样儿,反要学潜王的样儿吗?”齐襄王站起来,拱着手说:“这是我的不是!”回头问须贾,说:“这位先生是谁?”须贾说:“是我的门客,叫



范睢。”齐襄王挺器重范睢，真想把他留在齐国。

齐襄王打发人背地里去见范睢，对他说：“我们大王挺钦佩先生，打算请先生做个客卿，请您千万别推辞！”也是范睢一时大意，没想到自己是跟着须贾出使到齐国来的，不该私自跟别国有交往。他就回答说：“我是跟着魏国的使臣一块儿出来的，要是不跟他一块儿回去，不就没有信义了吗？不讲信义，还能算人吗？”齐襄王听了这个回话，更加敬重范睢，就派人给他送去十斤金子，一盘子牛肉，一瓶子好酒。范睢一死儿地推辞，非叫他拿回去不可。来人一定要请他收下，还说：“这是寡君的诚意，先生要不收下，叫我怎么回去交代呐？”他苦苦地央告，说什么也不走，闹得范睢实在没有法子，只好把牛肉跟酒留下了，那十斤金子死也不收。来人知道不能再强逼他，叹息着带回去了。

早有人把这件事向须贾报告，须贾不由得疑心范睢私通齐国。他们回到魏国之后，须贾把这事跟相国魏齐说了。魏齐疑心更重，立刻把范睢拿住，带到宾客们面前审问他，说：“你把魏国的机密大事告诉齐王了吧？”范睢说：“我哪儿敢做这种事！”魏齐说：“那么为什么齐王要留你呐？”范睢说：“他虽说留我，可是我并没答应他！”魏齐大声骂着说：“你倒推得干净！我再问你：你不是收了齐国的金子、牛肉跟酒吗？说啊！”范睢说：“他们再三再四地逼着我，我怕得罪齐王，弄坏了我们两国交好的大事，就把牛肉跟酒收下了；金子我可死也没收。”魏齐又喝了一声，说：“你还犟嘴？他无缘无故给你送礼干么？先打你一百板子再说，瞧你招不招。”

两边把他按倒，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阵，范睢嚷嚷着说：“老天爷在上，我并没做错什么事，叫我招认什么呐？”须贾坐在一旁只是冷笑。魏齐恼羞成怒，吩咐底下人把他打死。起先范睢还直喊冤枉，打到后来，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手下的人报告说：“已经断了气了！”魏齐还不大相信，亲自下来一瞧，见他浑身没有一处好地方。一根肋骨折了，戳到肉皮外头，两个门牙也掉了。魏齐指着他骂：“你这个奸贼，死得正好，也好给别人瞧个样儿。”回头叫手下的人拿张破苇席把他裹起来，扔在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叫他死后做个邈邈鬼。

天黑下来了，范睢慢慢地缓醒过来。睁眼一瞧，只有个底下人在那儿看着他，范睢叹了口气，就对那个人说：“我活是活不了啦。可是我家里还有几两金子，你要是能够让我死在家里，我把金子全

给你。”那个人一听说有金子，就答应了他，说：“你还得跟死人一样地躺着别动，我去请求相国把你抬出去。”这时候，魏齐和宾客们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就见那个看尸首的来回禀，说：“那尸首臭得厉害，不能再搁在厕所里了。”宾客们也都劝解魏齐，说：“范睢虽说有罪，相国已经把他治死，就算了吧。”魏齐说：“扔到城外叫鸱鸢收拾他去。”

看尸首的那个人等到半夜里，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范睢背了去。范睢家里的人一见，全都哭了。范睢叫他们别声张，又叫他媳妇儿拿出金子来谢了那个人，把那张破苇席交给他，嘱咐他扔到城外去。那个人走了之后，范睢跟他媳妇儿说：“魏齐也许还要打听我的下落，你快把我送到西门郑家去。”家里人连夜把他弄到西门郑安平的家。范睢嘱咐家里人千万不许走漏风声，叫他们第二天在家里号丧穿孝。

第二天，魏齐果然疑心范睢没死，打发人上城外瞧瞧去。那个人回来说：“那张破苇席还在，尸首可早给野狗吃了。”魏齐又叫人去探听范睢家里的动静。他们正在那儿



范睢与魏齐

披麻带孝地哭着。他这才相信了。

郑安平给范睢上药调养。等到范睢能够活动了，就把他送到山里隐居起来。范睢更名改姓叫张禄。有一天，秦国的使臣王稽来到魏国，郑安平出面招待。王稽问：“魏国有没有想出来做官的头等人才？”郑安平遂推荐了张禄。郑安平带张禄秘密见到王稽，两个人谈了半宵。王稽叫他一同上秦国去。王稽带了张禄和郑安平到了咸阳。他向秦昭襄王报告之后，说：“魏国有位张禄先生，真称得起是天下少有的人才。他对我说，秦国是非常危险的；要是大王能够用他，他有法子能够转危为安。为这个，我把他带来了。”

秦昭襄王见到张禄，向他拱了拱手，说：“请先生指教！”张禄说：“哦，哦！”他可一句话也不说。秦王见他还不说话，就又说：“请先生指教！”张禄仍然不言语。秦王第三回挺真心实意地请求说：“难道先生



认为我是不值得教导的吗？”张禄说：“从前姜太公碰见了文王，给他出了主意，文王灭了商朝，得了天下。比干碰见了纣王，给他出了主意，倒给纣王杀了。这是什么缘故？还不是为了一个信服一个不信服吗？如今我跟大王还没有多深的交情，我要说的话可是非常深。我怕的是‘交浅言深’，也像比干那样自招杀身之祸，因此大王问了我三回，我都不敢张嘴。”秦昭襄王说：“我仰慕先生大才，才叫左右退出去，诚诚恳恳地请先生指教。不管是什么事，上自太后，下至大臣，请先生只管实实在在地说，我没有不愿意听的。”张禄说：“大王能给我这么个机会，我就是死了也甘心。”说着他拜了一拜，秦王也向他作了个揖。君臣俩就谈论起来了。

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些天然的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些兵车、这么些强壮的士兵？论起秦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遵守纪律、爱护国家的！除了秦国，哪个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呐？大王虽说是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秦国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根本没有一定的政策。听说新近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

秦王插嘴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张禄说：“齐国离秦国那么远，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要是出去的兵马少了，就许给齐国打败，让各国诸侯取笑；要是出去的兵马多了，国里头也许会出乱子。就算一帆风顺地把齐国打败，也不过叫韩国和魏国拣点便宜，大王又不能把齐国搬到秦国来。当初魏国越过赵国把中山打败了，后来中山倒给赵国并吞了去。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中山离赵国近、离魏国远吗？我替大王着想，最好是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去打韩国跟魏国。离着远的国家既然跟我们有了来往，就不会去管跟他们不相干的事情。把近的国家打下来，就能够扩张秦国的地盘，打下一寸土地就是一寸，一尺就是一尺。把韩国和魏国兼并之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种像蚕吃桑叶似地由近而远的法子叫‘远交近攻’，是个最妥当的法子。”秦昭襄王拍着手说：“秦国真要是能够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全在乎先生的‘远交近攻’了！”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做去，把攻打齐国的兵马都撤回来。打这儿起，秦国单把韩国和魏国当作进攻的

目标了。

秦昭襄王非常信任张禄，老在晚上单独和他谈论朝廷大事。只要张禄说出办法来，秦王没有不听的。这样过了几年，张禄知道秦王已经完全信服他了，就挺严肃地对他说：“大王这么信任我，我就是把我的命丢了，也报答不了大王的情义。可是我还不把我整个儿的意见献出来呐。”秦昭襄王央告他，说：“我把国家托付给先生，先生有什么意见，只管说吧！”

秦昭襄王听了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进攻韩国和魏国。魏安僖王（魏昭王的儿子）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刻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魏公子信陵君无忌说：“秦国无缘无故地来打咱们，这明明是欺负咱们。咱们应当守住城狠狠地跟他们打一下子。”相国魏齐说：“现在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呐？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他对‘父母之邦’总能有点情分。咱们不如先跟他交往，请他从中说情。”魏安僖王依了魏齐的办法，打发大夫须贾上秦国去求和。

须贾到了咸阳，住在宾馆里。张禄一听说须贾来了，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难受，说：“这可是我该报仇的时候了！”他换了一身破旧的衣裳去拜见须贾。须贾一见，吓了一跳，强挣扎着说：“范叔……你……你还活着呐？我以为你给魏齐打死了，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范雎说：“他把我扔在城外，第二天，我缓缓醒过来。正可巧有个做买卖的打那儿路过，发了善心，救了我一条命。我也不敢回家，就跟他上秦国来了。想不到在这儿还能够跟大夫见面。”须贾问他：“范叔到了秦国，见着秦王了吗？”范雎说：“当初我得罪了魏国，差点丧了命。如今跑到这儿来避难，哪儿还敢再多嘴？”须贾说：“那么，范叔在这儿靠什么活着呐？”范雎说：“给人家当使唤人，凑合着活着。”

须贾知道范雎的才干，当初怕魏齐重用他，对自己不利，因此巴不得魏齐把他治死。如今范雎既然到了秦国，须贾就想到“冤仇宜解不宜结”，倒不如好好地待他，免得他来报仇。他就叹了口气，说：“想不到范叔的命运这么不济，我真替您难受。”说着，就叫范雎跟他一同吃饭，挺殷勤地招待他。

那时候正是冬天。范雎穿的是破旧的衣裳，冻得直打哆嗦。须贾显出挺怜悯的样子，对他说：“范叔寒苦到这步田地，我真替老朋友难受。”他就拿出一件茧绸大袍子（古代叫终袍）来，送给范雎穿。范雎推辞着说：“大夫的衣裳，我哪儿敢穿？”须贾说：“别再



“大夫，大夫”的了！你我老朋友，何必这么客气？”范雎就把那件袍子穿上，再三向他道谢。接着问他：“大夫这次上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须贾说：“听说秦王十分重用丞相张禄，我想跟他交往交往，可就是没有人给我引见。你在这儿这么些年了，朋友之中总有认识张丞相的吧，给我引见引见成不成？”范雎说：“我的主人也是丞相的朋友。我跟他上相府里去过好几趟。丞相最喜欢谈论，有时候，我们主人一时答不上来，我凑合着替他回答。丞相见我口齿还好，时常赏给我一点吃食，还算瞧得起我。大夫要想见丞相，我就伺候着大夫一块儿去见他吧。”

须贾说：“您能陪我一块儿去，这是再好没有的了。可是我的车马出了毛病，车轴头也折了，马腿也伤了。您能不能借一套像样点的车马呢？”范雎说：“我们主人的车马倒可以暂且借用一下。”说着，他就出去了。

不大一会儿工夫，范雎赶着自己的车马来接须贾，须贾心里犹豫地怀着一肚子鬼胎，只好上了车，跟他一块儿去见丞相。到了相府门口，范雎先下了车，对须贾说：“大夫先在这儿等着，我去通报丞相一声。”范雎就先进去了。须贾在门外等着，正等得心烦意躁的时候，忽然听见里边“丞相升堂”的喊声，可不见范雎出来。须贾就问看门的说：“刚才同我一块儿来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那个看门的说：“哪儿来的范叔？刚才进去的是我们的丞相啊！”须贾一听，才知道范雎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地直响，自己剥下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对看门的说：“烦你通报丞相，就说，魏国的罪人须贾跪在门外等死。”

须贾跪在门外，里面传令出来叫他进去。他跪在地下不敢站起来，就用膝盖跪着走，一直跪到范雎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我须贾瞎了眼，得罪了大人，请把我治罪吧！”范雎坐在堂上，问他：“你犯了几件大罪？”须贾说：“我的罪跟我的头发一般多，数不过来了！”范雎说：“我是魏国人，祖坟都在魏国，才不愿意在齐国做官，你硬说我私通齐国，在魏齐跟前诬告我，这是头一件大罪。魏齐发怒，叫人打去了我的门牙，打折了我的肋骨，你连拦都不拦，这是第二件大罪。后来他把我裹在一领破草席里扔在厕所里，你喝醉了还在我身上撒了一泡尿，这是第三件大罪。我受了你这么大的侮辱，如今你碰在我手里，这是老天爷叫我报仇。你还想活命吗？”须贾又连着磕了几个响头，说：“是我该死！请大人治罪吧！”范雎说：“我本该把你砍头，至少也得把你的门牙打掉，把

你的肋骨打折，也拿一领破草席给你裹上。可是为了你这件绋袍，觉得你还有点人味儿。就为了这一点饶了你的命。你应当感激，打这儿起改恶为善！”须贾没想到范雎这么宽宏大量，流着眼泪，一个劲儿地磕头。范雎叫他第二天来谈公事。

第二天，范雎禀告秦昭襄王，说：“魏国打发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够收服魏国，这全都仗着大王的威德。”秦昭襄王挺高兴。突然范雎趴在地下，说：“我有件事瞒着大王，求大王饶了我！”秦王把他扶起来，说：“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只管说，我不怪你。”范雎说：“我并不叫张禄，我是魏国人范雎。”他就把当初齐襄王法章怎么送他金子要留他做官，他怎么一死儿地推辞，受了冤枉，魏齐怎么把他打死，又活了，怎么更名改姓逃到秦国——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如今须贾到这儿来，我的真姓名已经泄露了。求大王宽恕。”秦昭襄王说：“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如今须贾自投罗网，把他杀了，给你报仇！”范雎拦住说：“须贾是为了公事来的，哪儿能为难他呐？再说成心打死我的是魏齐，我不能把这件事完全搁在须贾身上。”秦昭襄王说：“你真是天下少有的君子！魏齐的仇我准得给你报。须贾的事，任凭你自个儿办吧。”

范雎出来，把须贾又叫到相府里来，对他说：“秦王虽是答应了讲和，魏齐的仇可不能不报。你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来，再把我家眷好好地送到秦国，两国就此和好；要不然，我就亲自领着大军打到大梁去。那时候，可别后悔！”

须贾谢过了范雎，连夜回去。他见到魏王，把范雎的话学说了一遍。魏王一听，当时脸就绷了，嘴唇也白了。没办法，只好派人把范雎的家眷送到秦国去，同时把魏齐逼得走投无路，最终自杀了事。



秦昭王五跪得范雎



芮



刘敏

芮国(ru ì),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望水而居曰芮,芮通于内。”在夏王朝时期,居于渭水河畔的部落建有芮荔国,其发源于甘肃的渭水支流芮河两岸水草丰美,所以就加上草字头,为芮氏的芮。后商汤的族人从山西起源,跨过黄河,灭掉了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的大禹后裔西侯国,建立了一个跨河而居的芮荔国,并在夏、商时期成为西方诸侯之一。

据《史记》记载到了殷商王朝末期,西伯侯姬昌崛起西岐,推行仁治,受到各诸侯的尊敬。当时芮荔国为了扩张,与禹国之间为了黄河岸边的一片地域而闹起了“外交”争端,芮侯与禹侯两个国君就一起去找西伯侯姬昌去评理。行至西岐境内,看到周族人都互相友爱,人们都把礼让作为一种国风。两个人感到很惭愧,于是就回到了各自的国家,相互礼让,彼此谦让那块土地,谁也不许占用,以至于那块土地逐渐变成了闲田。

周族在西伯侯后期,在姜太公的辅佐下迅速强大起来,后来周武王起兵灭掉了商纣,建立了西周王朝。由于禹国和芮荔国与殷商王朝血缘相承,因此在灭亡了殷商之后,在周武王元年(前1103年)也将芮荔国、禹国一并吞灭,周武王把卿士芮伯良夫封在芮邑,位置在山西省芮城县,另有说法在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南方。那时并不能算是诸侯国。周成王在位时正式建立芮国,国君被称为芮伯,曾在周王室担任司徒的职务。国君为姬姓,爵位伯爵。芮伯在周成王姬诵执政之时(前1103~前1081年待考)担任大司徒,其后裔嫡支子孙世袭周王朝的卿士,皆称芮伯。芮国传至周厉王姬胡执政时期(前878~前841年在位),芮伯姬良夫见周厉王和大夫荣夷公一起,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遂撰写了著名的《桑柔》一诗给予讽刺、劝阻,他严厉谴责周厉王用小人,行暴政,招外侮,祸人民的罪行,并直接指责荣夷公:“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在《桑柔》之中,姬良夫

还明确陈述了救国之道,堪称千古名篇。周厉王因此十分恼火,竟把姬良夫流放到彘邑(今山西霍县)。后来周厉王被王朝一群正直之臣逼得逃亡,凄惨死在彘邑,天道循报。

芮国,在春秋时期的周襄王姬郑十二年(公元前640年)被秦穆公嬴任好攻灭吞并,后世齐景公姜杵臼的宠妾芮姬,就是姬良夫的后裔。《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二十年(即前640年)灭芮国。而《路史》记录了秦穆公二年(即前658年)灭芮国的说法。

芮国被灭亡以后,芮国的子孙都改姓了芮氏和芮伯氏,在当时,周朝主管著作和简册,还有诸侯卿大夫爵位分封,这个官当时叫内使,内使的子孙,就以他祖先的官名为姓,叫内使,所以,内使氏、内氏还有芮伯氏,随着历史的演变,还有姓氏的简化,最后都改成了芮氏,所以芮氏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家族。

相比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些响当当的名号,芮国在史料中的记载单薄了许多。《吕氏春秋·观世》中所讲“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的众多小诸侯国,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只不过扮演了一些地位被动的角色。不过,芮国历史倒确有光耀的一笔:在一场战役中,秦败于芮。

更令人惊异的是领导这场战役的是一位女子,芮桓公的夫人芮姜。芮桓公过世后,其子芮伯姬万继位。《桓公三年》记载:“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大意是,芮国的国君是姬万,史称芮伯万。芮伯万由于姬妾众多、风流成性,被母亲芮姜所厌恶,因而被赶出芮国,客居在姬姓魏国。之后,芮国就在芮姜的主持下,另立国君。芮姜虽然政变成功,但这种行为遭到反对,尤其是“天下共主”周天子恒王的反对。于是,秦国就奉周王之命出兵干涉芮国内政,不料秦国恃强轻敌,结果芮姜领导芮国打赢了这场战役。同年冬天,在周王室的主持下由周王朝、秦国、虢国三股势力包围了姬万出奔所居的魏国(今山西芮城)。显然是为了扶立姬万和消灭芮的叛乱势力。周王室之所以热心于主持这次政治交涉,很可能是在桓王被郑庄公的军队射伤之后王室尊严扫地,想通过“征伐礼乐”的扶正来巩固周王朝威严和维护礼法秩序。

从“逐君”事件和秦国、芮国之战以芮国取胜可以看出,芮姜是一个果断强势并极具领导力的女子。再看她的墓葬,就更令人咂舌了。

2005年发掘的韩城梁带村的西周东周墓地,以其举世无双、等级尊贵的青铜、玉器发现而震惊了国



内外,发掘的26号墓墓主是女性,即一代国君芮公的夫人——芮姜。

一直以来,史学界公认芮国在山西省芮城县或陕西省大荔县。但在韩城梁带村发现了芮国墓葬群。

26号墓为“甲”字形大墓,墓室长7米、宽5.8米,墓穴南端有一条长约26米的墓道。在墓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精美随葬品,包括23件铜礼器、6件“弄器”和多组玉佩饰。值得重视的是,出土的铜礼器内侧铸有铭文,“中(仲)姜作为桓公尊簋”。墓中有大批珍贵的遗物,尤以玉器最为显著,共出土571件,而且几乎所有的玉器都保持在下葬时的位置上。包括象征身份等级的七璜联珠组佩,由一件圆形玉佩、七件玉璜和727颗西玛穿连而成,从墓主人的颈部一直延续到膝盖处。左右手腕部还佩戴着玉手镯及腕饰组佩,手中有玉握组佩。可以确定,下葬时墓主人的尸身上几乎覆满了玉器。芮姜的两只玉握非常复杂,每一只都串有两三百颗玉贝、玉蚕、玉龟、玉珠及玛瑙珠。上面的八条串饰品用的都是白玉,据考证好多都是新疆和田玉,说明这位夫人地位尊贵,享受的待遇非常高。特别是她那梯形牌玉长达97厘米,由玉牌、玉珠、玉龟及玛瑙珠管等500余部件构成11条串饰,呈放射状装饰于前身,极尽奢华之风。她有一条项链为煤精所制,上面回首龙状的青白玉饰和龟形珠显示了这位第一夫人的尊贵。

从选取的少量标本即可看到,随葬玉器年代跨度大,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商代的刻字玉瑗、西周的羽人、春秋的玉贝。玉猪龙,通常认为是红山文化的产物,四五千年前辽河流域的玉器如何流传到二千年前的黄河流域,这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除了整玉,还有碎玉,这些现象被认为证明了墓主人芮姜是一位玉器鉴赏和收藏者。

另外,从梁带村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包括周代芮国国君芮桓公墓中所出土的七鼎六簋、芮桓公

夫人墓所出土的五鼎四簋,以及鬲、甗、簋、尊、壶、角、盃、匜、盘、钟、钲、罍于等礼乐器,较全面地反映了周代贵族的器用制度,此外,还有一组器型小巧、铸造精美的弄器,生动展示了周代贵族的生活情趣。墓地中新出土的晋、蓼、虢等国铜器,则形象地揭示出芮国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情况。

与曾经发现的其他簋相比,芮国的簋别具特色,铭文在簋盖之上。一般铭文都在簋里面,或者底部。铭文在盖子上面的很少见,这或许是因为芮国改进了自己的生产制造方式,这样做模子会更方便。铭文内容有“芮太子作铸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芮公作为旅簋”,这些标注“芮”字铭文的青铜器,是墓主身份和墓地国别有力的证据。

中国的青铜文化得到国际认可,金器制造却逊色许多。业界一般认为中国金器是隋唐时期受中亚及西亚黄金工艺的影响,才有了较大的发展。20年前,宝鸡益门秦墓的金器出土将中国金器范铸工艺历史提早到春秋晚期,梁带村芮国墓葬出土的金器则又将其铸造史向前推进了两百年。

芮桓公之墓出土的金器达48件,品类多且工艺精。这是同时期考古发现前所未有的,甚至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少有比肩者。在这些金饰当中,芮桓公的一套整身金饰最令观者惊叹。月牙状的镂空龙纹金肩饰、腰带上一套六件的龙纹金环、腹部的兽面金饰、胸部金泡以及金丝缠绕的手镯,加之与夫人芮姜梯形牌玉配对的七璜联珠玉组佩,将这位君主披金戴玉的雍容华贵之风尽现于世人眼前。作为一国之君,芮桓公自然少不了享受舞乐的喜好。八件一套的编钟、十件一套的编磬让人不禁想象起他一边饮酒赏乐,一边观舞娱身姿摇曳的乐景。这套编钟编磬经测验有三个八度,是难得一见的完整的钟磬,只有身份显赫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种器乐。

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是我国第一次发掘芮国遗存。成系统青铜器的出土,特别是“芮公”“芮太子”带铭青铜器的发现,让有关芮国的文化内涵、世系、地望等重大问题迎刃而解。

在三重六翟的遮掩中,芮国历代君主得以厚葬,生前披金戴玉、富贵显赫的芮桓公离世时也必是如此。一代代君主离世,芮国也一步步迈向终点。秦穆公二十年,这个诸侯小国终于偃旗息鼓,败于国力强盛的秦国。根据考古发现,芮国约有400年的历史,其中在韩城存续了约200年。

如今,那些尘封千年的墓葬还将继续被发掘,而这个古国的影像也将随之清晰起来。 ㊟



芮桓公夫人仲姜墓出土的六套件弄器



# 文史知识

## 明 堂

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都在此举行。据《吕氏春秋通论》载,明堂中方外圆,通达四出,各有左右房……左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玄堂。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心想学古时候帝王的样子,做出一番事业,流芳百世。这天,他学着三皇五帝巡狩泰山的架势,浩浩荡荡来到东岳泰山。山上有古时明堂的一处遗址,他见了一时雄心大发,便要在这片遗址上造一座新的明堂,以显示自己的威风。但是,文武百官没有一个知道明堂是什么样儿,应该怎么造。一直到战国时期的《孟子》这本书里,才记录了齐宣王建明堂的事。当时,明堂的建造已很不流行,齐宣王建明堂就遭到许多人反对。

## 国子监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南京国子监始建于东吴永安元年(258年),规模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北京国子监始建于元朝大德十年(1306年),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但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的功能。

西周时期国家的最高学府称为“太学”,汉武帝设置“太学”也是承袭了传授儒家经典最高学府的功能。而西晋初立“国子学”旨在突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的功能,北齐称之为“国子寺”。隋、唐、

宋、元、明、清称之为“国子监”。清末改革学制,1905年12月6日设学部,国子监裁废,其教育行政功能并入学部。

## 社 学

社学是元、明、清三代的地方小学。创立于元二十三年。元制50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施引教化,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并以教劝农桑为主要任务。明承元制,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教育内容更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丧、祭等礼节,以及经史历算之类。清初令各直省的府、州、县置社学,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充补。凡近乡子弟,年12以上,20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肄业,入学者得免差役。社学是当时农村启蒙教育的一种形式,明清两代,社学成为乡村公众办学的形式,带有义学性质,多设于当地文庙。社学一直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地方文教机构,但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亦曾利用它作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组织。

## 锦衣卫

“明初,置拱卫司,秩正七品,管领校尉,属都督府。后改拱卫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寻又改为都尉司。洪武三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而设仪鸾司隶焉。四年,定仪鸾司为正五品,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出自《明史》)

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是明代专有军政特务机构,其前身为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锦衣卫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朱元璋设置锦衣卫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若干由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屠戮殆尽,《明史·刑法志》记载:“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



且四万。”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明成祖时,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有明一代,锦衣卫一直存在。明初军制为“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五千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四十八处。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的工作,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日军军情。延续至1661年南明永历帝的锦衣卫指挥使马吉翔与掌卫事任子信于咒水之难被杀才可说是正式结束长达290年的历史。

清朝入关以后,仿效明朝制度,仍然设立锦衣卫。顺治二年(1645年),改称銮仪卫。清朝的锦衣卫仅存在一年。

官职等级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僉事二人,正四品;镇抚使二人,从四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正六品;试百户,从六品;总旗,正七品;小旗,从七品。下属有将军、校尉、力士,对外有参某某事、校令,另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如宪宗朝张渺正)。

### 东厂 西厂 内行厂

六东厂,其全名为东缉事厂,厂卫之一,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中国明朝时期的特权监察、情治机构。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对官吏、士大夫甚至一般庶民制造了大量冤案,在当时颇受士人反感。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地点位于京师(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执行公务时,与锦衣卫相同,需持有“驾帖”以证明代天子行事,并且须由刑科给事中的“金签”才有效。东厂初期并没有自己的牢房与镇抚司,清朝后因政治需要被刻意夸大扭曲,甚至把西厂与内行厂的劣行算在东厂与锦衣卫身上。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西厂即明朝官署名。即西缉事厂。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西厂的成员是由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宪宗钦定西厂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人数要比东厂多一倍,又把东厂与锦衣卫的职权包揽起来,它的职权比东厂和锦衣卫更大。主要是伺察、监督东厂和锦衣卫。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后因遭反对,被迫撤销。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正德元年(1506年)复置,刘瑾被诛后,即废去。

内行(h á ng)厂,明朝官署名。即大内行厂,又叫内厂,内办事厂。中国明代内廷的侦察机构。与东厂、西厂、锦衣卫合称“厂卫”。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刘瑾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例,权势居东、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锦衣卫侦伺一切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套侦察特务体系。正德五年刘瑾倒台后,内行厂与西厂亦一同被裁撤。虽然内行厂仅存在五年,但亦残害了不少忠良。《明史·刑法志三》载:“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杀良”。

### 古代婚姻六礼

六礼,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彩是择配、提亲的意思。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说媒”。问名,即所谓的“讨八字”。在古代和今天的婚俗中,讨回姑娘的出生年、月、日、时,要请阴阳先生推算。只有男女八字相合、才可以定亲。古代的回名习俗,还含有问清姑娘是谁生的,即问清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是正室所生,还是继室所生。封建时代为求婚姻的门当户对,问清嫡庶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纳吉,指提亲。一般来说,男女双方的八字相合,得了吉兆之后,就认为婚姻可以成立。男方将这一事实告诉女家,谓之纳吉。纳征,即现在所说的“送彩礼”“送嫁妆”。“征”的意思是成功。送彩礼之后,婚姻就算成立了。未送彩礼时,婚姻未必成立。请期,指择定娶亲的日子,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通知女方家,就是俗语所说的“送日子”。娶亲日期要征得女方家同意,所以叫“请期”。亲迎,指娶亲。男家派人或亲自迎娶新娘。⑦



### 填漆工艺

填漆工艺在春秋时期又称“髹漆”。髹漆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很少,仅在楚国青铜器或属楚文化范围的地区出现,如浙川下寺楚墓出土的表面花纹中填黑漆的铜鼎,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的纹饰中填黑漆的青铜列鼎、青铜豆等。在铜器上髹漆,其工序与木胎漆器相同,分打底、上漆、彩绘等步骤,有时因铜器表面比较平整光滑,也有不打底直接髹漆的。髹漆使铜器变得亮丽多彩,如同彩绘一般。此外,髹漆实际上也是一种金属防锈涂料。如何加固青铜鼎纹饰间的填漆工艺,是此件青铜鼎的保护修复与其他青铜器的保护修复的不同之处。

### 名城应分级保护

陈肖静在《中国名城》2013年第6期发表文章《论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界定》一文,建议将名城分为历史名城、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以利于确定每座名城的保护重点。历史名城是指该城市有悠久的历史或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两者兼而有之。文化名城是指该城市人文荟萃,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三个层次中最高的,需要更高的标准。成为历史文化名城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悠久的历史著称的传统历史特色;二是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三是

鸟形盃



# 文物天地

历史上曾经长期发挥并且当代仍然持续发挥着政治、经济或文化影响力。

### 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人类设计建造的,具有明确规划的景观,包括像具有美学价值的这种花园广场这样的一种景观,这是一种类型。另外一个就是它逐渐发展而成的,可能不是人们一次设计出来的,逐步发展而成的,它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甚至是一种行政或者是宗教的要求,与环境相适应最后形成了一种景观,另外一类实际上是一种结合类,比如说它包括一些自然的风貌,同时又有一些人文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通过某些物质遗产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或者艺术、文化影响。

### 文化遗产

对文化遗产,概念上分为有

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

无形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遗产日。

### 保护文物古迹与保护利用 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议

未来的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时代的进步必然对文物古迹工作的科学保护和管理提出更高的要



求。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从长计议,有计划、有目的、有制度、有规范地做好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文化街区自身的特色价值,扩大文化旅游的思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遗产保护的事业中来,让民众在享受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也对充满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的历史环境有所眷顾。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文物古迹保护和利用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城乡发展建设规划要充分考虑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化的全方位需求,充分考虑体现地方多元文化特色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合理利用。

二、文物保护规划和旅游发展规划不能各自为政,要认真研究两个规划的科学结合。保护是基础、是底线,保护的目的是传承。科学、合理的利用同样是保护。

三、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要严格执行“两法一条例”,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充分利用媒体和社会监督的手段,提高我们执法的自觉性,尤其是领导干部、决策者的执法自觉性。文化文物专业人员要负责任地当好地方领导的行业参谋,努力避免地方领导决策的失误。

四、文物保护要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和尽可能少干预的原则。决不可为追求美观、华丽,追求恢复历史某一时代的盛况而进行违背原则的政绩工程。另外,文物保护还要注意保护文物自身的环境和与其相关联的景观环境以及文物遗

存的历史信息。不可盲目追求大拆、大建,打造历史、打造文物,违规进行文物复原建设等不良行为。文物保护和维修同时要考虑维修后的功能利用。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也同样存在维修后的利用问题。但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政策要求。

五、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开发和利用,要在相关规划的控制下,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提高旅游的文化品位。发展旅游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GDP,更大的潜效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文化素质,提高对文化资源的了解和情感。

六、城市文化建设,可以考虑对构成城市要素的项目建设,但要按照规划和相应的报批程序进行。要充分考虑项目的前瞻性和价值的增值空间。城市要素构成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的传承。城市的决策者应该了解和研究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载体建筑。复原建设有价值的历史景观,只要注意不影响文物建筑和环境,认真研究其选址、形制、材料、结构、工艺和历史尺度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文化城市开发建设的内容。

#### 如何赏析书法

赏析书法要把握作品的宏观特征,如气势、神采、布白,又要细微的观察,如用笔、用墨、结构、线条等等。欣赏线条质量,从中可以观察出作者创作时的用笔、用墨及其笔法。其次是由

线条点画组合的汉字结构,艺术造型的意趣和哲理。第三是布白,包括结字、行气、章法。第四是神采,就是指书法的精神气质、格调风韵。神采是作者精神境界的忠实记录,与作者的情感、性格、修养密切相关。优秀的书法作品必须是形美神足,形神兼备,欣赏者就是要领会体势,捕捉神采。在欣赏书法时,可欣赏书法用笔的美、用墨的美、线条的美、结字的美、章法的美、乃至升华到书法想像的美,从而使精神达到愉快的感觉。如颜真卿楷书是向相美,用包围的手法,显示出博大、气派,有“大度能忍,忍天下能忍之事”的胸怀,故有学书必学颜的说法。柳公权楷书是向背美,用放射的手法,显示出紧凑、精巧,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感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古人还是把它们联系到一块,故有“颜筋柳骨”之说,展示出完全相反的艺术风格。

#### 清代朝冠

古清代官帽与历代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官帽顶子分为三层,上为尖型宝石,中为球形宝珠,下为金属底座,用所饰的珍珠(东珠)的数目来加区别。🔍



马莲台

# 雨后探秘马莲台

◎ 楚春霞

“谷不在深，有仙则灵。”这条没有伟岸身姿的小峡谷，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古来就有“九月九、三月三，马莲台上出神仙”之说，这也许正是她的传奇和神秘之处。

沿309国道东行，越过淄河桥、太公湖，顺着通往临淄区齐陵街道齐家终村的一条柏油路径直往南，便是一处山丘环绕、台岭高耸、地势险要的深谷，这就是马莲台，一条曾有史料记载又充满神奇传说的沟壑。

马莲台，如同一部扑朔迷离的历史，有着众说纷纭的说法，以致后来人们在探寻她时如坠迷雾之中。马莲台是一条谷长10余里的深沟，呈南高北低地势，最宽处800米，两岸赭红色的土崖陡峭险峻，风雨沧桑，见证时光变迁。

当我们走近马莲台，揭开她的神秘面纱，就会发现，这条深谷竟然还蕴藏着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

## 峡谷深深马莲台

峡谷深深，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雨后的马莲台，谷深幽静，水雾缭绕，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

要登上马莲台，须先下一条约60米深的大谷，然后沿蜿蜒曲折的谷底羊肠小道慢慢攀行，沟壑两岸绿树成阴，幽谷曲径，需小心翼翼，只怕惊扰一方寂静。南行100米，有一处石海，是当地村民近年发掘整理而出，长约200余米，在黄土之地竟深藏一片石海，更添神秘之色。步行大约一里半的路程，迎面便看见一悬崖峭壁，拔地而起，状如马莲花开，秀气萦绕，恰似王母娘娘座下的莲花盘，故有马莲台一说。在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顶端，有一个小小的洞口，喷吐云雾，时隐时现，这就是传说中神仙出没的“马莲洞”。马莲台景区开发前很少有人攀崖入洞，古碑上云：“高陵峙立云梯所不能攻”，今天为了人们

比较安全地爬上险崖的神仙洞，专门修了一条75级的台阶，顺着石阶便到洞口，洞府是用条石砌成，高2.5米，宽2米多，深11米多，洞中纸灰、香灰成堆，四壁熏成了黑色。

沿着洞往里走，方现一丝亮光，洞底有直通崖顶的洞口，洞口只能容一人攀登而上，上去后犹如重见天日，这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进的马莲台。全台约300平方米，古有文昌殿、善隆庙、白衣殿，现在已是一片瓦砾。荆榆疯长，郁郁葱葱，周围是万丈深渊，难于走动，只能攀荆四望，这里好像是一个“人”字形的大谷，马莲台就在倒人字的中间，这个红土崖的周围还连着几个与其一样高的小台，目前只有西南角与其连接的一个小台能上得去，台与台连接的地方仅有2米宽，从马莲台跨到小台可谓一步天险。

雨后的峡谷路面湿滑，泥水交织，我们费力登上台来仰望四周，东南层峦起伏，松柏阴浓，西北高楼林立，铁桥飞架，在自然美与现代美交融之下，愈加映衬出马莲台的别致。临淄文物志载：“迄今登眺其上，虽不见昔日金碧殿宇，但巍峨险峻之势，仍使人惊魂失魄，现存清代石碑四方，记述台陵兴盛和重修阅历”。可见，此地自古寓奇又藏险，古老而神秘。

## 神话传说马莲台

与所有的名山秀水一样，马莲台也有着众多的美丽传说，尤其是马莲仙姑和钟居士的传说流传最甚。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青州有位马姓村姑，满脸麻子，但为人仁厚，因受人歧视，就来到荒无人烟的终村马莲台，立志修行学神，山下的人都叫“麻脸台”。后来她学神成半仙之体，四方亲友，谁家有灾难，就请麻脸仙姑看，一看准好。终村人有句顺口溜：麻脸到，灾除掉。周边村的人也深受其益，从此，终村人就叫她马莲台仙姑。同在明朝万历年间，临淄城内一钟姓官



吏,厌倦官场,归隐垄耕,自称稷山居士,也就是后人称之为的钟居士,他发现马莲台畔幽深寂静,便久居下来,与传说中的马莲仙姑一道积善成德,成为当地的大善人。

而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是,传说中的马莲台帮助了当地居民躲过数次劫难,免遭杀戮。朱元璋称帝后,军师刘伯温给他算着山东人将要谋反,中心就在青州(原临淄属于青州)一带。于是朱元璋派人坐杀山东12年,杀得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荒芜人迹。官兵进入山谷,看到森林茂密,雾气腾腾,上得台来却不见一人,反复数次,一无所获,官兵就不再来了,台上的人安然无恙。人们都认为这是马莲台险要的地势拯救了百姓性命。清康熙十四年碑记:“烽烟告警之时……惟登斯台如登社席,保全数百之生灵,安然无恙。”为什么逃进马莲台就能保全生命呢?因为“高陵峙立云梯所不能攻”。据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立石碑记载:马莲台处山谷之险,当道途之阻,东接苍险,西迎黄山,南对稷峰,北临淄水。其奇险之状,可见一斑。

1644年,随着清兵入关,明朝败落,京城失陷,清兵到处征伐,民不聊生。百姓四处逃生避难,山外的百姓扶老携幼,四处寻找安全之处。相传在关键时刻,人们扶老携幼来到马莲台,只见一位麻脸老妪和钟居士伫立在高台之上,不时挥动着双臂,呼唤着百姓们。于是,百姓不顾一切地逃到了马莲台。数日后,清兵退去,硝烟散尽,化险为夷,保住了民众的平安,马莲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后来,人们认为麻脸老妪和钟居士是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化身,为感悟佛门的好生之德,当地居民便集资为其修建了坛城佛刹,前为白衣殿,供奉观音菩萨;后为文昌殿,供奉文殊菩萨。康熙年间,当地居民在马莲台树碑

立传,修建庙宇,从此这里烟雾缭绕,香火不断。

可惜的是,上世纪中叶,一场“破四旧”运动,加之随之而来的“文革”浩劫,将两位延续300余年香火的菩萨,全身击毁,殿宇被拆除。如今,废墟荡然无存,只有那铭刻着新建殿宇及重修的四块石碑及新修的石洞,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些逝去的岁月……

### 史料考证马莲台

传说马莲台所在的峡谷是修筑二王冢、四王冢取土所为。筑台是春秋时期较普遍的习俗,齐国故城内外,有多处夯土台基,都是当年齐国的宫室建筑基址或离宫别墅遗址。据史料,齐国所筑之台见于记载的有《左传》提到的坛台、遄台;《管子·山至数》中涉及的栈台、鹿台;《晏子春秋》记载的路寝台等。筑台的用途,除供王侯登高玩赏之外,还用于观天象、各攻守、聚财富、会欢宴等。至于史书上提及的三归台,百姓传说的故城东淄河两岸对峙的晒台、钓鱼台,城内的听事台、玄武台等等已无从查考。

那么,马莲台这条沟壑是怎么形成的呢?据专家考证,马莲台并非修筑二王冢、四王冢取土所为,只是在称谓上沿用了齐国称台的习俗。马莲台的成因是古代山洪长年累月冲刷而成,是大自然的造化神工。至于后来乡民在上面修庙造神,从现存的四块清代石碑文上看,记载的内容大都表达了古人祈求安宁的朴素心理。

“谷不在深,有仙则灵。”这条没有伟岸身姿的小峡谷,竟蕴含着丰富的神话传说、仙道文化,古来就有“九月九、三月三,马莲台上出神仙”之说,这也许正是她的传奇和神秘之处。📖

## 一个人的壮烈

徐丽兰

一个人的壮烈  
至今还让后人不能忘怀  
他,就是王蠋  
闵王昏庸败国  
让屡次劝谏的王蠋伤心至极  
乐毅携五国之威攻城略地 所向披靡  
这时  
王蠋的贤良赢得了乐毅的欢心  
他备重金礼请  
那王蠋却一根筋拧着  
誓死不降

并曰:“与其屈从敌人,不如以死激励国人。”  
遂自奋绝脰而死  
其壮举令众士民大夫无不感动奋起  
如吹响复国的号角  
齐国军民齐上阵  
田单“火牛”显神威  
一举收复齐地  
还我山河  
他,也被一同载入了史册  
影响后人



# 一次难忘的比赛

刘洋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忘不掉的比赛经历，它植根在人们记忆深处，会促进人的心灵成长，让人学会以阳光般的心态面对生活，拥抱生活。

今年暑假，学校选拔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参加齐文化知识复赛。在老师的辅导和我们的努力下，我们三人以优异成绩参加了最后的口答决赛。在参加这项活动前，说心里话，我心里真的有点不愿意，认为浪费时间和精力。可是，在我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对齐文化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材料中有好多是历史教科

生命中每一次经历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恩赐，在亲历体验中获取经验会更好。开学初，通过参加区中学生齐文化知识竞赛，我深有感悟，受益匪浅。

最让人难忘的是在区电视台举行的决赛。比赛开始时，面对四五台摄像机，置身台上，自己真的感觉有些紧张，真正领会到了“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的含义，因为在赛前，通过老师辅导、彩排和程序练习，自己不仅熟悉了准备的齐文化知识，也适应了比赛规则和程序，树立了自信。在片刻紧张过后，自己很快镇定了下来。进入决赛的共有6支队伍，比赛共分3场，第一场是必答题，第二场是集体必答题，第三场是抢答题。在第一场和第二场的比赛中我们团队没有失分，六支队伍在前两场比赛中并没有拉开太大距离，那

书上所没有的。作为一名临淄的青少年，我应该了解家乡历史的辉煌，并为长大建设好自己的家乡而努力。

最难忘的是在电视台的决赛。比赛中，我们个个都

非常紧张，毕竟这是自己第一次上电视。由于紧张导致失误，我们队扣掉了20分，取得了团队第3名的成绩。如果没有失误，最后的冠军就属于我们了。我们三人真的很不甘心，真想再重新比赛一次。通过参加比赛，我感悟到：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只有一次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如果抓不住机会，就会成为永远的遗憾。我要把握好生活中的分分秒秒和每一次机会，努力锤炼自己，在以后的各种人生赛场上，争创优异的成绩！

# 一次难忘的赛事

## ——参加齐文化知识电视竞答有感

赵秋茹

么第三轮就是决胜的关键了。在主持人读题的时候，每个队都有一名队员将手紧紧地贴在抢答器上，随时准备按响。随着主持人说出“开始抢答”，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

比赛结束了，我们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三名的成绩。我觉得：名次并不重要，最可珍贵的是这次锻炼机会，它让自己明白：好成绩的取得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准备之上，要反复练习，要镇定，把自己的最高水平发挥出来，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而疏于准备。当然，作为团体比赛，更离不开每个队员的合作精神。

## 泲水

路永国

当年泲水平地出，故城墙外汇名川。  
“泲池衿带”刻门楣，“有酒如泲”故事传。  
泲水曾现“稷下”碑，丰厚文化此繁衍。  
滚滚流淌几千载，永载史册不平凡。

## 游晏婴公园

冯旭卫

晏婴公园景观美，桃红柳绿春满园。  
七段五园十六景，主题雕塑布其间。  
千古传颂一贤相，勤政爱民生活俭。  
多元设计理念新，民心工程人人赞。



老宅小泥湾,是曾祖父于民国二十一年花50块大洋买来的,面积有一亩多,里面种了很多树。

### 白杨

白杨这名字我用多年了。这名字叫得多,网上百度一下,哈:一大片!2004年1月2日,参加柳泉茶座组织的到沂源走访贫困孩子的活动,

朋友问我为啥叫白杨?我说,老家院内原来有两棵白杨树,房前一棵,房后一棵,都有一搂粗,树叶厚亮,夏秋季节风吹来,哗哗地响,引我回忆、思念,所以,叫白杨。那时,房前那棵白杨树杈上还有喜鹊窝,吱吱喳喳,那是喜鹊的家园。后来,几个姐姐结婚,要作嫁妆,树被锯倒,打家具用了。

我村西沟里有两棵大白杨,几个人搂不过来,树上也有两个喜鹊窝,喜鹊在树上欢跳着,孩子在树下欢跳着。落叶季节,孩子们玩的别出心裁:捡拾树叶用其柔韧叶柄互相比试谁的坚韧,两相用力,叭地一声,一方断了,另一方就赢了!这就是那时的游戏,简单、快乐。后来,通张边公路,沟底的白杨就被北傍的公路遮挡了,这些年每从公路上往下望,见枝疏叶少,白杨树也好像老了,汽车叫嚣,烟尘漫漫,喜鹊窝也疏冷了,不知道喜鹊还住不?

父亲喜欢白杨,七十岁那年又在院东崖栽上了四棵,如今树长大了,病中的父亲恍惚中还常好念叨,他家有四棵大白杨呢。

“骨实芒,骨实芒,三天不见大长长”。说的是毛白杨初春时的花絮。这花暗褐色,不显眼,从花开到花落只几天的功夫。童年、少年,我就是在这歌谣滋养下和白杨树一起成长。

### 榆树

榆树上能吃的东西多。人喜欢吃榆钱、榆叶,歉年还要吃榆树皮,我猜蜜虫也是这样想的:要不,芽上怎就有那么多蜜虫子?叶上怎就有那么些凸起的红的、绿的好看的虫包包?皮上怎就爬那么多金花虫?树心里怎就钻进了钻心虫呢?

榆树干上常附着红肚皮的鸟,“哒哒哒”地啄木,孩子们叫它攢打木子。那时,父亲炕头有本粗黑纸的厚厚的《十万个为什么》,书上画影图形说这是啄木鸟,是找钻心虫吃的,是树木的医生。小叔看到这鸟,却嫌闹得慌,拿石块把鸟打跑了,哎,多好看的鸟啊!你都是大人了,打它做甚?

春天,榆钱萌大的时候,母亲腰上拴个绳子,绳

# 小泥湾的树

边成江

子拴个筐子,上树捋榆钱,捋完榆钱,再用绳把筐子慢慢放下来,洗净、蒸榆钱窝头,烧榆钱小豆腐。榆钱落了,捋榆叶,烧粘粥,那叶也滑爽好吃。屋檐下还挂着一大把榆树皮,是预备歉年时候吃的,说是用碾压碎磨细蒸着吃。只是,后来分地了,这物件一直没吃着。

那晚,我去看望父母的路上,正好见路边有卖榆钱的,就买了些给父母烧的榆钱豆面水。母亲问,咱老家的榆钱也下来了把?

### 枣树

五月过后,枣树才慢吞吞的开花,花极小,黄黄的,不明显,却极香,缕缕的,沁人心脾,引得蜜蜂“嗡嗡”地围着飞。等喝到三姐夫家蜂子酿的红亮的枣花蜜,哎,那个甜啊!

绿绿的枣叶,是没人关注的。等到初秋风雨过后有一天,地上散落着黄白透红晕有虫眼的枣子,孩子们心里的虫眼也滋生起来了——不顾大人的告诫,偷偷上树,摘些半生不熟的枣下来,吃!略有些甜味,不好吃,也不难吃。直到有一天,我从树上失足掉下来,被西沟大白杨树那家的姐姐发现背到卫生室里涂上药水,缠上绷带,才长了些记性。

最初摘下的枣子,往往用来做酒枣。枣子黄红,甜酸适口大约八成熟的时候,母亲便把没有虫眼、伤痕的枣子拿到盛着老白干的酒碗里蘸一下,然后放到一个干净的大玻璃瓶里,枣子装满,盖好,三星期后,打开瓶盖,一股幽香扑来:软软的、红红的枣子咬一口,发酵的酒味、枣的香甜味,直抵心脾。酒枣可以保存到年,这对蘸酒多少、温度、消毒状况有很高要求,一般人家做不到。

生产队收获玉米的季节,正是枣子晕晕成熟的时候。独轮车推玉米的汉子从西大门大崖头弓上车来,用搭在光脊梁上的手巾擦着汗、喘着气歇脚。见我家门前那两棵红黄渐熟的枣子,早馋得不行,从车篓里拿出几个玉米打起枣来,枣子应声洒落,噼噼啪啪,玉米棒子落进我家院墙——我们已形成默契,在



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玉米、枣子算是扯平，还说啥。

### 楸树

提到老宅的楸树，就想起姥娘。

姥娘成分地主。土改时，姥爷已离世，舅舅在博山教学，母亲和四个姨母出嫁，她家人均土地多了，就被划成了地主。于是，被分宅子分地（边河公社社址当时就驻在姥娘家），公家给姥娘留了一间小南屋——她家原来的杂物间让她住。缠着小脚、孤苦伶仃的她便被母亲接到家里，顺便照看年幼的我和弟弟。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儿没处淘换啊！惹得母亲不高兴，呛她：闺女就有处淘换啊？！

有年，饭屋旁的那棵大楸树开花了，满院子飘着蜜甜的花香，我和几个小伙伴从西院墙外路上用土块打落花吮蜜吃，不少土块扔进院里，有一块恰落到时近八十岁的姥娘头上，她就哭喊：谁啊！都跑到闺女家来了，还跟着打石头啊！这待叫俺咋活啊……！

楸树是很好的家具用材，本村木匠张师傅在我家打家具时，曾指着院里的一棵楸树说：这树，木纹好，结实不走样，木匠见了它就像蚊子见了血一样啊！我不知他比喻合体否？楸树长得慢，我和弟弟离开老家后把老宅托付给侄子了。我又正好新买了房子，姐弟几个一商量说：你锯几棵楸树打家具吧！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一个挣工资的小公务员，刚买了房，再买家具哪有钱呢！

### 刺槐

每年五一节前后，小泥湾里的槐花开了。从一缕缕红萼、绿萼的白里透浅鹅黄的花里散发出的香气，让整个院子浸在花海里。忘记是哪位诗人的一句诗，大意是：嗅着一缕槐香，那是抚着情人的脸。我不懂诗，却觉得这句话清新、传神。

母亲也不懂诗，她会给我们烙槐花饼。用钩子把槐花掰下来，捋下，洗净，和上鸡蛋面用鏊子烙饼子，吱吱啦啦的油气弥漫，饭屋里飘出花香、油香、鸡蛋香的混合味儿，那个香啊！抑或家里缺油了，那就和上面撒上盐，蒸巴拉子吧！那凝聚着亲情的岁月的饭啊，怎么想都是香的呢！

### 樗树

前些年我写过一篇《樗树之幸》的文字，现在再说这树，我想起了这树上的一种小虫子——干狗戳。

干狗戳是金山人对它的称呼，它其实是一种象甲虫，硬硬的扁豆粒大的身子，长长的鼻子，人一戳它，它便佯死不动，像一块小干狗（土里的砂姜）。等它以为人远去了，再起来跑。这是一种保护性的逃生措施。故有童谣曰：“干狗戳，干狗戳，推佯死，推佯活”。

这干狗戳的本事，人也有。有年，村里有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和邻居闹纠纷，挑起肢体冲突。等人家报了警，她一听派出所警车进了村，之前还气势汹汹的她却突然倒地，成了“干狗戳”。医生告诉她，没查出异常啊！她却按她亲戚教她的脑震荡的症状描述给医生，住起院来。之后，这妇人就上访啊！堵门啊！谩骂啊！闹个不休。对方人家经不起这番闹腾，别人就劝道：好鞋不轧臭狗屎啊！给她点医疗费算了吧。

如今，樗树上的干狗戳少见了，但愿朴实的山村里也少有这样的“干狗戳”。

小泥湾故园的树还有几种：比如香椿、泡桐、黄杨、梨树、核桃、柿树、银杏……这些树，或食材，或用料，或兼而有之，都很普通，没有深宅大院的贵族气，却浸润了多年柴草、炭煤的烟火味。都是寻常百姓家的树，我没有忘记它们，在这不一一写了。📖

## 金秋牛山民俗庙会

魏乐明

时逢重阳菊似金，  
枝头柿红别样新。  
民俗庙会牛山沸，  
人如潮水车如云。  
山寺玉磬传祝福，  
管祠金钟祈泰运。  
几多群艺几多乐，  
万众欢娱万众春。

## 七律·姜太公

崔景舜

气吐虹霓称武圣，  
兴兵定鼎佐周邦。  
赏功简礼尊贤智，  
除弊宜桑社稷康。  
虎拜天威惊旷野，  
龙翔地表惠黎昌。  
先师文哲乾坤赤，  
燮理阴阳万古芳。

## 忆故城临淄

孙子科

久负盛名数临淄，  
“钜于长安”史称誉。  
春秋时期四万户，  
战国之时七万余。  
时至西汉有十万，  
“市租千金”最富庶。  
家家富足人殷实，  
击筑弹琴又吹竽。



## 绿地，城市生命的活力

刘善勇

与临淄区行政办公大楼一路之隔，西侧有一座月色渔歌公园，占地面积5500平米；这里原为一街头绿地，为了满足市民休闲活动需求，提供生态休闲场所，同时为城市打造充足的绿肺空间。2012年3月临淄区委，区政府对其重新进行布局改造。在保留原生树的基础之上，对原有凌乱的植物进行了简化梳理，留出了疏林草地空间，入口节点大面积增加地被花卉；园中增设船形铺装及坐凳应对主题，外侧做起伏地形围合，内侧敞开，空间处理简洁干净。而且将“渔歌唱晚，月色盈船归满载”之意，融入到公园中，寓意丰收喜庆。可见造园手法独具匠心。

每天清晨或傍晚，当我散步于此处公园中，仿佛来到了一个绿的世界、绿的海洋，这种绿色是柔和舒适的色彩，能给人以镇静、安宁、凉爽的感觉，能使一天紧张工作的劳累和精神情绪得到彻底改善。那重重叠叠、挺拔屹立的树木，伸展开的树枝似要拥抱蓝天和白云；脚下绿油油的青草，把裸露的土地遮掩得密密实实，在微风吹拂下掀起一片绿色波涛，散发出阵阵青草的清香味儿；以草地象征“水面”上，有几艘渔船轻轻划过，带起阵阵涟漪。想必这些小船应该是江南水乡的乌篷船，您可以坐在船底席上，蓬顶离您的头有两三寸，您的两手可以搁在左右的舷上，还可以将手伸向水里，与湖水来个亲密接触。在这种船里仿佛是在水面上坐着，靠近湖岸时泥土便和您的整个身子非常地接近，只要稍一伸手就会抓上一把泥土，使您有一种身临水乡的感觉。

这里是地道的城市森林，丝毫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就连林间小路都是人们日久天长踏出来的。当我沿着一条曲折土路，随延绵的土丘自然起伏，穿行于蜿蜒隐匿于其间的绿树之下，越往深处树木越是茂密。处处繁花压枝，绿柳拂面，时不时还会看到三五结伴的野生鸟雀，它们一点儿都不怕人，在离我最近的树枝和草坪上自由地嬉戏。每天清晨，这里总会看到些晨练的人们，有打太极的，有挥刀舞剑的，甭管老少脸上无不洋溢着青春活力；还有那悠闲舒适的老年人拎着鸟笼子，浴鸟、遛鸟、逗鸟的情景，聆听着鸣禽冠军画眉鸟的“吟唱”：“叮叮叮，早晨好……早晨好……”歌声婉转，让人心旷神怡；还有超

级歌星百灵鸟，它是歌手如林的鸟儿王国的最佳独唱演员，歌声悠扬动听，扣人心弦；只不过那悠扬的调子显得过于简单了点儿，像我儿时重复练习简谱一样。尽管如此，我却是一句都没听懂。而遛鸟人便在一旁相互交流着养鸟的经验。其中，有位老人肩上用两头略弯的短扁担挑着两个鸟笼子，两手还各提一个鸟笼子，不时地晃动着。听说，这样晃动，既锻炼了人的臂力，也锻炼了笼子里鸟儿的爪力，是人与自然界生物的和谐之举。正是由于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株株树木勃发的生命绿色，将人和人之间，人和环境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汇融合，才使她变得如此美丽！

傍晚的月色渔歌公园，分布在不同方向的草坪灯，犹如浮在“水面”上的月亮倒影，暗淡的光泽映照着整片绿地，显得分外漂亮，更加迷人，有种港湾的温馨氛围。那些戏迷们，大都是些年过半百的大叔大妈；他们当中拉弦子的、唱戏的站在船舱中央，听戏的却围坐在船舷上；待一切准备就绪，“戏班”的锣鼓便会响起来，他们所唱的大都是民歌，主要有：《大花鼓》《赛白娥》《拜年》等，对这些民歌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每提到一首，不论什么场合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多么熟悉的场景，这我不禁联想到古齐典雅的齐韶，使儒家圣人孔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优美的舞姿，使鲁君不顾礼的束缚，欲来齐观社。所以仅就临淄市民而言，他们“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齐人喜欢音乐，并为享有音乐而自豪。而这些迷人的乐舞，在穿越2000多年后，依然在当今临淄市民中传承着。

听说，有市民从唱戏和听戏中，不但找到了快乐，还把身上患有多年的病魔驱赶走了。两年前，退休在家的一位工人老师傅，因患脑血栓，导致左胳膊和腿不灵活，医生建议他多加锻炼。于是他在老伴的陪同下经常到这里散步，久而久之喜欢上了听戏，并买来音响等设备，每到傍晚就用三轮车拉来，为戏迷们播放伴奏音乐，如今走路不拐了，精神也好多了。很显然，这完全得益于临淄区委区政府实施的理念新、文化精、效果显著的“民心工程”。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园子里的花、草、树从春到秋,甚至到寒冬都会绿意浓浓,相连不断。如此四季如春的景观,这在北方的城市里尤为可贵。其实大家都知道,绿代表着冷色,是沉着,是冷静,是思考。

由此而言,这园子里的绿绝不是一般公园的柳浪闻莺,供情人掩身,供儿童嬉戏,她已超出物而有了理的含义。相对于火热,她表现为冷静,相对于喧闹,她表现为沉思。但是绿又代表着生命,是活力,是生机。每当春天来临,大地还没有苏醒自己冻僵的身子,园子里的迎春花,连翘,墨绿和橙黄的长长枝条上,没来得及发芽就先缀上一串黄黄的花瓣。还有白玉兰,干硬的枝干上还没有被春风吹软,便爆出了一个拳头大的花朵,让人想到那接力赛中跑第一棒的田径运动员,人还未到便急着将接力棒伸出,就抢这一刹那的春光,指示着理想,预告着生机,好一个春的使者;夏日,暑热蒸腾,沿行道路由冬青、金叶女贞、小龙柏筑起的一道厚实绿墙,如墨如黛,若您漫步在行道树下会感到十分沉稳坚实;待秋霜降临时节,挂满枝头黄灿灿的柿子,招徕一群群灰喜鹊前来啄食;那白色的玉兰花便用她那细嗅又无的寒香一收全年的色味。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松柏的绿了。当落叶乔木只剩下一片静劲的疏枝时,雪松、白皮松、龙柏、冷杉便一起收紧

它们的针叶,仿佛将这园子里四季的绿色都收在它们身上,在秋的萧疏与冬的料峭中显出一种刚毅的气质。如果说绿色是生命的结晶,那么这片苍松翠柏,无疑就是思维的凝聚。它们盘地而起,每一棵都如塔如钟,贮藏沉思,然后又渐渐收拢枝叶,束成一长矛似的尖顶,带着一种神圣的启示直向云天刺去。所以我一到树下便会做着天上之想。

当您漫步穿过由银杏、杜仲、黄山栎、柿子、海棠及彩叶树紫叶李和雪松、白皮松等常绿树,高低错落而不失规则组成的密林,踏上绿油油的草地时,顿时眼前便是一片绿海的波涛,翻腾着,一直溢到园子的外面。

当您驻足在“水面”上的小船上,回头遥望刚刚穿行而过的那些错落有致的灌木、绿树丛林,细细品味时,不得不神思其外,如今,梦想“诺亚方舟”这艘记载着中国梦的大船,踏上了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扬起风帆,确定了建设“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道路。

适逢盛世,喜奔小康。临淄区委,区政府以远见之举,在寸土寸金的城区保留下如此大面积的生态空间,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打造城景相融、田园相连、打造“生态之城,宜居之城”,确实是民生环保福祉下的百姓之福。 

## 齐国城垣遗址

◎ 罗伟

古色古香的拐角型砖房  
将人们的好奇心裹在了里面  
透过镂窗  
目光仿佛穿越几千年  
那明晰的夯层  
似乎让我看到了当年筑城时劳  
工的身影  
铿锵有力的号子声  
传入耳鼓  
震在心上  
晶莹的汗珠  
滴入泥土  
种出希望  
光辉灿烂的齐文化  
从此  
流淌在齐国大地上  
滋养了一代代中华儿女

## 水调歌头·齐桓公小白

◎ 张福信

英雄何时有?  
明月问青天。  
诸侯混战不止,  
霸主现何年?  
遇难小白东去,  
历练终成大器,  
高举齐王幡。  
任管仲为相,  
伟业立人间!

盐铁兴,  
国民富,  
诸侯安,  
匡扶周室,平顺

南北敬中原。  
九合诸侯豪饮,  
也曾一匡天下,  
骄纵筑悲年。  
尸肉虫吃尽,  
千古警官篇!



夏耘 篆刻